

目 录

文 献

-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 毛泽东 (1)
- 毛泽东给林克、高智、叶子龙、李银桥、
王敬先、封耀松、汪东兴的信…………… (8)
- 毛主席关怀身边工作人员的成长 …… 汪东兴 (9)

回 忆 录

- 新式整军运动的回顾 …………… 傅 钟 (16)
- 在晋察冀的日子里 …………… 胡开明 (63)

人 物 介 绍

- 南昌起义中的贺龙…………… 宋川 何善 (89)

周恩来与人民信访 刘春秀 (109)

专题资料

人民海关的创建 董志凯 (131)
“大树特树”的由来 陈虹 (148)
“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与发展 任涛 (159)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魏新生 (187)
国际友人在延安 袁武振 梁月兰 (210)

会议介绍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王秀鑫 (228)

史实考证

关于东南局、中原局合并扩大为
华中局时间考 谢辉 (255)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①

毛泽东

(1960年12月25日)

像今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一样，大家团结得很好，这就好。你们整风，检查一下，批评一下，大家还是团结在一块。这就叫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问题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

从前，有张仪和苏秦^②两个人，都是鬼谷先生^③的学生。鬼谷是个地方，出了一个先生，所以叫鬼谷先生。后来苏秦在赵国当了宰相，地方就在邯郸^④。邯郸这个地方，你们到过没有？张仪在楚国做个小官。楚相丢了一块宝玉，

①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67岁寿辰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的谈话。参加聚餐的有：李敏、李讷、毛远新、王博文、汪东兴、叶子龙、王敬先、吴旭君、张仙朋、林克、高智、李银桥、封耀松。

② 张仪，战国时魏国贵族后代。秦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8年）任秦相。苏秦，战国时东周洛阳人，字季子。曾任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相，赵国又封他为武安君。张仪和苏秦关系甚好，都曾是鬼谷先生的学生。张仪处于困境时，经苏秦策划到了秦国，后任秦国宰相。

③ 鬼谷先生，即鬼谷子。相传战国时楚人，隐于鬼谷，因以自号。长于养性持身和纵横捭阖之术。《风俗演义》说“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

④ 邯郸，即今河北省邯郸市。

怀疑是张仪偷的，把他狠狠打了一顿，满嘴的牙都被打掉了。那个时候，大概还不会安假牙吧！张仪回到家里，叫老婆看看他嘴里的舌子还在不在。他老婆说：舌子还在。他说：那就不要紧了。他跑到邯郸找苏秦，一去就住进“招待所”。大概是现在北京饭店之类的住所。好几天没有见到苏秦的面。后来，苏秦请他吃饭。张仪到了苏秦的衙门，看到摆了酒席，排场大得很，苏秦坐在当中高处，请了各国使节，也有契尔沃年科^①。席面当然比我们今天吃的丰盛得多。但是却把张仪安排坐在下面角上，盛了点仆人吃的饭食给他吃。这下子张仪的气可就大了，无非是破口大骂苏秦你这个王八蛋等等。回到“北京饭店”，满肚子的气。“北京饭店”的“经理”看他这个样子，就问他：张先生脸色不痛快，有什么生气的事吧？他说：当然有气！就把当年和苏秦是同学，今天苏秦如此这般对待他说了一番，并且骂苏秦此人简直是无情无义，是王八蛋。这位“经理”说：这样看来，你在赵国呆不住了。张仪说：当然呆不下去了，马上走。“经理”问他：你到哪里去呢？他说：这倒还没有想好，不管他，走了再说。“经理”说：看来只有到秦国去。张仪一想也对。就此动身。“经理”陪他走到秦国，一路花费大概相当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吧！到了秦国，他们为了见秦王，就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以后，张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北京

^① 当时任苏联驻华大使。毛泽东在这里是讲故事作比喻提到他。

饭店”的“经理”就向他告辞回国，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张仪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并说过了两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赵国。“经理”见他这样说，就告诉他，赵国宰相苏秦是个好人，当时苏秦所以要气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事。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赵国依靠苏秦，他也只是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的一切花销，都是苏秦主使的。张仪一听，这才恍然大悟。“经理”又说：苏秦只希望你当了秦国宰相，十五年内不要出兵打赵国。张仪听后表示：只要苏秦活着，我就决不出兵打赵国。

这是一个故事。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①。“被开除过党籍”，撤掉

^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内的错误路线，毛泽东曾先后三次受到大的处分。第一次是1927年11月，在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指责湖南省委和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会议通过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撤销毛泽东担任的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后讹传为毛泽东被“开除党籍”。第二次是1929年6月，中共红四军“七大”在龙岩举行，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若干原则问题作了结论，毛泽东的许多重要的正确意见未被肯定，他反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第三次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中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了错误的批评，会后他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①。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过话吧！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

^① 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1933年3月，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认为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的“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以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实际上是王明、博古左倾冒险主义者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的一场斗争。

兵法》，克劳塞维茨^①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书，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讲一次课，整整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作准备，而且其中还要有两个通宵不睡觉。准备了一个星期，讲上两个钟头的课，就卖完了。课不能照书本子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作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

你们整风，批评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又不给你戴路线错误的帽子，就是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嘛，总的说来是小事。我原说叫叶子龙同志参加一下你们的整风，受教育，可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银桥同志不赞成。这次不参加也没有关系，以后到西楼机要室参加整风也可以。总之，不杀头，就不要紧，批评一下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他们提出什么不让我下长江游泳，出去必须是三辆汽车，我说政治局决议都可以改变，就是他们的规定一点也变

^① 克劳塞维茨（1780—1831），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普鲁士将军。他的著作有《战争论》（共3卷）等。

不得，还规定什么只能在小游泳池游，只能在体育室活动。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听罗瑞卿说，这些批评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这样能使他谨慎小心一些。罗瑞卿说，就是因为受到过我的严厉批评，他就谨慎些嘛。他和汪东兴都是部长、副部长一级的干部，批评后没有什么嘛。而有的同志，我还没有那么批评他，只是稍微批评他一下，他就怀恨在心，大概他要恨我几十年、一辈子吧！

我这几个孩子，发烧回来，我见了就心软了，叫他们在我的灶上吃饭。李讷，你在学校发了烧，我们的医生、护士去看你，你还发脾气，用被子把头蒙起来，不愿意见他们。实际上你心里高兴，家里有人来看你，你还不高兴？！你们系里有七八百人，如果有一百来人生病，都有家里人来看吗？你们学校里的同学，有多少人有家在北京？百分之十、二十、百分之三十吧！那么至少还有百分之七十同学的家在外地。他们这些人病了怎么办？一有病统统都回家？不可能，还不是在学校的医院里住，在学校里看病，还不是都要医好的？这次学校里总支书记还去看了李讷，她就高兴得很嘛。你们病了回家来，还不是想吃两天好的？吃两天就吃两天吧。我听到发烧到三十八度，心就软下来了。

在我们毛家，我这一代以前还没有大学毕业的。我就没有上过大学。毛岸英、毛岸青他们在苏联上的是军事学校、东方大学，还不是正规大学。现在你们三个^①，你^②和我也有

① 指李敏、李讷、毛远新。

② 指王博文，江青的侄子。

关系，算四个，都要读成功。一下子就是四个大学毕业生了。

从前有个八岁的小孩子，到了阎王老爷那里。阎王要把他下油锅，油烧得滚滚的，一丢进去，结果没有什么动静。阎王到油锅跟前一看，那个小孩子在油锅里游过来游过去，看样子倒舒服得很。阎王就问他：你是哪里人呀？他说：我是汉口人。阎王一听，说：怪不得，你是汉口人噢，不怕油锅烫。原来汉口的夏天是很热的，汉口人是热惯了的，经受了锻炼。阎王拿他没有办法，只好说：算了吧，放他回去。看来人就是要锻炼，不要怕。

我的意见，林克、高智、小封^①等几位同志下放，到农村去锻炼。你们看怎么样？我看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还有你，王敬先同志也下去，好不好？我看到山东去，不要到你的江苏去了。你们都赞成吗？赞成，那好。我们做一个决议，看什么时候走，说走就走，过了阳历年，一月二日走怎么样？那就这样决定吧。

现在下去苦得很啊，一天只有很少几两粮食吃。你们受得了吗？不怕就去。下去以后，一个礼拜来个报告，直接写给我。三个月回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到你们真正活不下去了，不行了，快要死了，打一个电话来，我们来把你们接回来。好，就这样决定吧！

^① 小封，指封耀松。林克、高智、封耀松和下文中的王敬先，都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

毛泽东给林克、高智、叶子龙、李银桥、 王敬先、封耀松、汪东兴的信

(1960年12月26日)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

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毛主席关怀身边工作人员的成长

汪东兴

毛主席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很关心，很爱护，注意从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帮助成长；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也热情地帮助解决。但是，平时对大家要求也是很严格的，不允许身边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搞特殊化或者作出任何违纪的事。一旦发生这方面的问题，就进行整风，批评教育，杜绝这类问题的发生。

我谈谈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一次小整风的情况。

1958年3月，毛主席要我下到江西工作。走时订了一个“君子协定”，下去工作3年，然后回主席身边工作。

我到江西担任副省长、省委常委，并兼农垦厅厅长，协助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分管农林牧渔及农林垦殖场。对这项工作我是很有兴趣的。一年到头有2/3的时间在下面搞调查研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60年9月底，我正在九江地区参加农林垦殖座谈会，突然接到江西省委办公厅的电话。电话说：“北京中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同志来电话，要东兴同志回北京一趟。中央负责同志有事与他商谈。”

我接到电话后立即回到南昌，当天晚上去邵式平省长

家里问明情况。邵说：“我听说了，要你去北京一趟，什么事不清楚。既然是中央负责同志找你，你应立即去。”于是，我买了第二天（9月26日）的火车票，于9月28日清晨到达北京，在中直招待所住下。当天上午，我先与徐子荣同志通了电话。他告诉我：“你直接与毛主席处联系”。随后，我打电话给毛主席处值班室联系，他们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说：“通知他马上来中南海，我要见他。”

我由中直招待所派车送到中南海东门，下车步行到中南海宝光门中海室外游泳池，见毛主席正在看书，还未睡觉。我走近主席身边，轻声地说：“主席，还没有休息呀！”主席抬头看见是我，很高兴，说：“睡不着，出来晒晒太阳。你坐吧！”

我坐下后，主席问：“你什么时候到的呀？”

我说：“今天早晨6时左右。”

主席问：“住在什么地方？”

我答：“住在中直招待所。”

主席又问：“是谁通知你来的？”

我答：“公安部徐子荣同志。”

主席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君子协定，下放3年，现在多久了？”

我说：“我是1958年3月10日到达江西的，至今两年半，到1961年3月满3年。”

主席微笑地说：“还差半年时间，怎么办呀？！”

我回答：“听中央、主席的。”

主席听了我的回答，又点点头，表示满意，然后缓缓地说：“有的同志向我建议要你提前回来。”讲完后，眼睛看着我，像是听取我的意见。

我又明确回答：“工作上需要可以提前回来！”

主席见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就说了目前有三件事待我回来办。

第一件事，我们和北边的关系紧张，超级大国威胁我们，要准备打仗，还可能打原子弹。目前我们还没有原子弹，将来会有的。现在中央决定要搞国防工程，防原子弹工程。有关首脑机关的工程，你要过问和参加。

第二件事，有人揭发中央警卫团外围警卫部队中有一个反动组织，是真是假，你回来抓紧调查处理。

第三件事，我身边工作人员中有些作风不正，存在一些不健康的思想，需要进行教育，进行一次小整风，展开自我批评和批评，搞好团结，做好工作，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件事待你回来负责抓。

我听了以后对主席说：“我回江西交待一下工作就回来。”

主席问：“要多久时间交待完？”

我计算了一下，来回路上4天，交待工作时间大约1周，共10天左右时间就可以了。

主席站起身来，说：“好，你明天回江西。”

我向主席握手道别。刚走到勤政殿后面路上，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赶到我身边，说主席叫我回去，还有话要谈。

我又回到主席处。主席说他讲的那三件事要抓紧办，要我不必回去交待工作了，打个电话给江西省委杨尚奎（省委书记）或邵式平同志，要他们把我担负的工作指定别人管，以后再抽出时间回去交待工作。并说：你今天回中直招待所休息，过了国庆就搬回中南海来住。

事后我把主席交办的事，分别向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和周总理作了报告。

1960年10月2日，我搬进中南海南楼的一层房子住下。10月3日下午见了毛主席。我把如何办好三件事的想法和对主席身边工作人员进行小整风的安排，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我说：进行小整风，首先，学习主席《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等文件，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其次，坚持正面教育，采取漫谈的方法，互相谈心，互相启发；然后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和风细雨地进行自我批评和批评，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把思想作风整顿好。每天搞半天，照顾到工作。时间安排：50天（实际上25天），争取完成小整风任务。主席听后，对这样安排表示满意。说：这样做方向明确，办法对头。你召集他们开一个会，宣布做法。

1960年10月6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会上，我宣布了开展小整风的安排。要求同志们除了值班的人外，希望每次都能按时到会。在这次会上，我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说：“你们没有犯什么路线错误，只是生活作风、

思想意识上的缺点，只要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一下就完了嘛。如果有人对你批评尖锐一些，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让你不舒服几天、几十天，将来你会感觉到对自己有帮助。”毛主席还说：“我在井冈山时，被撤销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还传说开除了党籍，后来说我是狭隘经验论、右倾机会主义、指责枪杆里会出什么政权，不懂马列主义，等等。这对我很有教育，使我看了很多书，后来还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书。我感谢这些同志，他们逼我读了些马列主义的书。”大家听了毛主席亲切诚恳和富有深刻哲理的讲话，都积极地参加了小整风。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经过小整风，大家精神面貌有较大改观，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毛主席对我们这次小整风的成果是满意的。为了巩固这个成果，进一步提高大家的认识，1960年12月25日中午，他请身边工作人员聚餐。参加聚餐的除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讷、侄子毛远新和江青的侄子王博文外，还有叶子龙、王敬先、吴旭君、张仙朋、林克、高智、李银桥、封耀松和我。

大家兴高采烈地祝贺毛主席67岁寿辰。边吃饭，毛主席边谈话。他从我们小整风说起，要我们从高从严要求自己，正确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引经据典，联系他亲身的经历，说明“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鼓励我们认真改进思想作风，积极做好工作。许多同志放下筷子，用心

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毛主席边说，边催促：“你们吃，你们吃呀！”这顿聚餐吃了两个小时。毛主席感人肺腑的谈话使大家深受教育和感动。大家认为，毛主席席间的谈话，不仅是对我们小整风的高度总结，而且也是鞭策我们今后不断进步的动力。聚餐结束后，我们立即把毛主席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作为今后学习材料。

26日清晨，毛主席又给林克、高智、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和我7位同志写了一封信。他语重心长地写道：“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毛主席在这次聚餐会上谈话的纪录整理材料，一直保存在我身边。毛主席说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这句话，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为了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我建议发表毛主席这次谈话纪录。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虽然批评了我和其他一些同志，但原文发表我认为不会损害这些同志，反而会使我们感到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是如此坦诚相见，如此关怀，亲如手足。

毛主席这次谈话后，不久外出，由北京出发到浙江住10天。他要我回江西交代工作，只限5天完成，待主席专列路过江西南昌时上车。然后一同到广东开会讨论农业六十条。

这次小整风后，毛主席不仅要求大家吸取经验教训，而且要求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从他自己以身作则做起。他宣布，从1961年1月1日起，“我不吃猪肉和鸡了，因为

猪肉和鸡要出口换机器。我们欠人家的债要还给人家的，我看有米饭、有青菜和油、盐就可以了。”“买东西一定要给人家钱，一张纸、一支笔也如此，千万不能向地方要东西。”“过去向各省市要的东西，照价付款，钱由我稿费内开支。”

我们认真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做了。记得当时各种实物付款有1万多元人民币。

新式整军运动的回顾

傅 钟

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全军指战员在作战间隙中积极参与的，以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方法进行的大规模整训，被毛主席称作是“民主的群众性的新式的整军运动”^①。

毛主席的这句话是1948年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的。这个讲话公开发表之前，毛主席特意发给了远在河北省平山县农村的刘少奇、朱德同志领导的中央工委征求意见。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它要求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密切结合，做清醒的革命者，不只是记住党的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还要记住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有效地执行党中央规定的一切政策和策略。毛主席明确指示：“这种民主的群众性的新式的整军运动，今后必须继续进行。”^②重点主要是在中高层干部中进行提高政策和纪律的教育。这样，到1948年9月，全军便按1947年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12—1316页。

9月党中央关于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分两步进行整党的要求^①，圆满完成了整军任务。

1948年10月1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写道：“两年内^②，特别是最近一年内，在人民解放军中，实行了有秩序的、有领导的、由全体战斗员和指挥员一起参加的民主运动，开展了自我批评，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军队中的官僚主义，恢复了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期间曾经实行有效、而在后来被取消了的军队中的各级党委制和连队中的战士委员会制，这样就使军队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大为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两年内，从解放区动员了大约一百六十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③不言而喻，这是对新式整军运动作出的完整、科学的概括和最基本的总结。

那些年，我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负责常务工作，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刘少奇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了新式整军运动的全过程。1948年春，我写了《新式整军初步总结》。1949年1月初，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其中规定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之一，是在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391页。

② 指1946年10月至1948年9月的两年。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44页。

军委政治部领导下做出“新式整军运动”的总结^①。由于这项任务进城后没搞成，直到十年动乱被抄家之前，我一直保存着当时的大量文字材料。后来那些材料不知被搞到了哪里，但我一直认为那确实是一部内容无比丰富、生动的政治工作“教科书”，就是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我们也可从中汲取到智慧和力量。现在，我就这个运动的兴起及其几个重要侧面，作个简要回顾。

(一)

1946年7月，面对得到美国装备和支持的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毛主席指出：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我力量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②。

无疑，这个指示当中也包括了对军队政治工作的要求。其中心，就是要认真恢复和提高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政治工作的负责精神；坚持古田会议决议和谭政的政治工作报告^③阐明的方针，深入实际，发扬民主，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切为着夺取战争的胜利。正是在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326、330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287、288页。

^③ 即1944年4月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提出的政治工作报告。

这种情况下，部队积极开展有效的政治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

到1946年10月，战争打了3个月，我军歼敌25个旅。毛主席指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25个旅。这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①。他明确要求，“今后各区必须利用作战间隙，加强军事训练。一切军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②。这时，各区经过连续作战的部队，在政治工作上已经有了许多新鲜创造，党中央立即通过自己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从9月到12月接连加以报道，并发表社论、专论加以肯定和赞扬，以先进典型和正面经验，进一步推动了政治工作的蓬勃发展。

具体说来，得到推广和普及的是以下三项。

先是9月10日的社论《好好进行俘虏工作》，称赞“许多地方进行的‘反内战诉苦大会’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对教育被俘人员的4/5即10万蒋军士兵转到人民方面成为“解放战士”，起了重要作用。社论还指出：“组织这种诉苦运动，是一件重大的实际的教育工作，军队与地方应该协力进行，使其发挥最大的效果。另一教育工作，就是根据这种极其生动具体的材料，做出总结，向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指出他们受困难的总的原因和中国人民今后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9—121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8页。

出路。这个出路就是为独立和平民主奋斗到底，为反对卖国、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奋斗到底。”在此期间，许多部队也采用“诉苦”方法进行思想工作和战前动员，用以纯洁部队，巩固部队，密切军民关系，等等。

接着 11 月发表短评《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称赞华中野战军一师二团搞的“为人民立功运动”是“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号召全解放区进行革命英雄主义竞赛，普遍开展杀敌立功运动。曾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作过精辟论述的朱总司令说：“过去我们认为，共产党打仗，红军打仗，都是为人民服务，有什么必要表功呢？最近开展了立功运动，的的确确有很大的好处。部队中人人精神振奋，你也想立功，我也想立功，这样就会打胜仗。”立功运动在全军很快开展起来，一些领导机关立即制订了评功、记功、报功制度，有的颁布了立功条例，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后方广大军民的士气，促进了团结，使我军源远流长的英模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还有个以团结互助为主要内容的“王克勤运动”，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王克勤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队的一个班长，解放战士的榜样，“一级杀敌英雄”，共产党员。他当班长时，组织思想互助、生活互助、军事技术互助，使他们班成为“三大互助模范班”，也是野战军首长提倡的“战斗与训练、勇敢与技术结合”的一面旗帜。12 月的《解放日报》详细报道他的事迹后发表了《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号召部队都要按照自己的条件，选择

自己的典型，通过这种运动“进一步提高战斗力和瓦解敌军”。正是在这种运动中，各野战军都涌现出了自己的爱兵、带兵模范和团结互助模范，使毛主席在延安倡导的“尊干爱兵”传统在全军得到发扬光大，带动广大基层单位真正成为能打能走又会做群众工作的战斗集体。

与此同时，军委总政治部还按中央指示，电函各军区各纵队首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要带领部属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掌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炮兵中“展开赵章成运动”^①，大量培养神炮手、各种模范射击手和技术骨干；继续改进政治教育，“以诉苦大会方式，启发全体战士，自己教育自己，提高阶级觉悟”，为了农民阶级获得土地而英勇奋战；政治工作要贯彻群众路线，采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生动活泼的工作方法，紧紧依靠党支部，以民主方式选英模，大胆提拔新干部，经常注意拥政爱民教育，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完成再歼敌 25 个旅的任务，迫敌停止战略进攻而转为防御，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党中央、毛主席所以这样大力普及来自部队的新鲜经验，直接对高级将领电函政治工作要求，是因为这些新鲜经验显示了指战员的高昂士气和觉悟水平，领导的责任就在于要更多地和群众中发现并扶植这类新生事物，促进部

^① 赵章成同志系我军迫击炮专家，他专心致力研究迫击炮，能使迫击炮抵近射击，百发百中。

队战斗力的巩固与提高。这既是最有效地进行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也为大规模展开整军创造了良好的群众条件。

在此期间，党中央还有一个重要的部署，是指示部队恢复各级党的委员会。总政先是审查了“关于党的团委会（即团党委）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这个草案是1946年10月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报上来的。经过审查，认为很好，党中央立即颁发全军试行。接着，总政着手草拟军队中党委员会条例初稿，并向一些中央委员和部队首长征求意见。先是贺龙、罗荣桓同志，稍晚一点还有罗瑞卿同志等都予以肯定，并提出了修订意见。到1947年2月，党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军队中党的组织形式给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复示》，并转发了晋冀鲁豫军区有关实施党委制的经验和文件。自此，1932年以后被取消了的党委制很快在各部队恢复起来，取代了当时军分区以上的军政委员会和党务委员会。党委制的建立、健全，大大加强了党对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的一元化领导，保证了部队思想上组织上更加团结一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搞得更加生机勃勃，部队的民主生活空前活跃。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而且在军事方面出现的诸如战前的“诸葛亮会”，战后的评指挥、评战术、评技术的军事民主，也普遍有了发展，这就为整军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组织上有了完善的准备和保证。

(二)

确定整军，是中央工委在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的全国土地会议上，确定结合土改进行整党时提出来的。

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刘少奇、朱德同志主持会议。到会的有东北、山东、晋冀鲁豫、冀热辽、晋绥、晋察冀、陕甘宁等解放区的主要领导人，华北解放区各地委的负责同志，晋察冀野战军各旅的代表，共100多人^①。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土地会议开幕后，7月21日至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对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作了重要部署。周恩来同志说，经过一年作战，我军已由120万发展到190万，歼敌112万；敌军之建制、人员、武器都损失了约1/3，这就为我们夺取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毛主席在会上明确指出，由于战争迅猛发展，农民对土地有进一步的要求，需要制定比1946年的《五四指示》更进一步的政策^②。全国土地会议正是在这样的形势和方针下，纠正了解放区土改在政策上的不彻底性，为全国农民制定了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剥削、实

^① 《中国土地改革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347页。

^② 《中国共产党会议概要》，沈阳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258页。

现“耕者有其田”的伟大纲领。

在土地会议上，还反复讨论了整党问题。刘少奇同志在会议的结论中指出：“实行土地改革是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一环，有决定意义的一环”^①，“整顿党，整顿作风，直接目的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最长远的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只有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把党整纯洁，才能战胜蒋介石。”^②他还强调指出，军队必须参加土改工作，给翻身农民撑腰，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

会议在反复讨论结合土改开展整党、整军运动时，把具体内容和要求归纳为进行“三查”，即在地方是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随后进行“三整”，即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朱总司令对于整军问题极为重视。在会议期间，他深入各组，细心听取地方上的同志对部队的意见。许多同志反映，有的地主富农钻进了部队躲避群众斗争，有的甚至换上军装反对土改；有的干部干涉农民斗争，包庇地主富农等等。随后，他在9月7日的报告中专门讲了《整军问题》，提出部队需要“三查”。他说：“我们的军队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以整顿，需要一个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运动，使军队在思想上达到一致拥护土改，组织上纯洁严密。”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95页。

② 同上，第394页。

他直截了当地批评部队有些干部沾染了封建社会的不良习气。他说，过去我们没有作假报告的，现在有了，贪污腐化也有了；浪费民力、物力现象很严重，官兵关系，军政、军民关系发生了不少问题。他语重心长地指出，这些恶习的传染源，“是地主富农思想，容许这种思想侵入军队中，是很危险的，必须扫除。”^①到会的军队干部都认为朱老总的报告，切合部队情况，不仅使人看到整军的迫切性，还从他所讲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都要贯彻群众路线的指示中，明白了整军的方针、方法，这实际上是一次进行整军的有力动员。

土地会议结束后，中央又经过周密的准备工作，决定10月10日同时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和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为头条的67条解放军口号。发人深思的是，准备颁布《训令》之前，中央电示各野战军首长，对如何根据当前情况和我军新的使命修订原先八路军时代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9月底报来意见。对报来的意见，中央格外重视倾听出征到蒋管区的野战军的声音。这样，又经过中央前委、工委和叶剑英、杨尚昆同志领导的中央后委多次往返交换意见，最后由毛主席定稿颁布。回想1937年8月洛川会议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89、90页。

上，为八路军出征抗日前线，集体修订了红军时代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词句，这次我军出征夺取全国胜利，又一次修订它，表明党中央毛主席对于强调步调一致，统一全军行为准则，加强纪律保证，看得是何等重要！

就是这样，在人民革命涌现高潮，强大起来的我军肩负新的使命，解放战争开始全国性大反攻的形势下，兴起了新式整军运动。

(三)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太行山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参与了1939年、1940年的两次“政治整军”。但这次新式整军和那时的整军大不相同。其不同之点，就在于毛主席说的，“是完全有领导地和有秩序地采用民主方法进行的”^①。而实施领导、保持秩序、发挥民主效力的首要一环，则是紧密联系实际的学习和教育，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武装指战员的头脑。它是开启诉苦闸门的钥匙，进行三查的镜子，开展三大民主的指针，调动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智慧的先导，完成整军的保证。不论是由上而下的整顿过程，还是由下而上的整顿过程，都必须抓好这种同实践相一致的学习和教育，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领导，使运动沿着正确轨道前进。这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2页。

于我们这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近一年的整军过程中，这种学习、教育有3次。开始以学习《大纲》、《宣言》、《训令》为中心内容，解决阶级立场和投入土改的问题；第二次是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解决树立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和贯彻执行民主革命总路线、总政策的问题；最后是以中高级干部为对象，学习党中央的《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解决加强纪律性、反对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问题。自然，学习内容不只这些，各野战军都按不同情况有所增减，有适宜的选择。比如，中原野战军还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以及《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等新华社的重要社论。

自9月中旬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到1948年春，各军区、野战军普遍按土地会议精神进行了土改政策的学习和教育。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彻底平分土地，对于学习土地法大纲，兴趣极高，还想出许多办法宣传土地法大纲。许多刚刚下连的解放战士纷纷给家里写信，将土地法大纲寄回家乡，告诉家人，别再还债，打倒蒋介石回家分田翻身的日子快到了。

晋察冀中央局自10月3日到石家庄战役开始后的11月9日，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土地会议”。随后，中央局和

晋察冀军区作出决定：贯彻整党整军，各纵队抽出人员在自己的作战地域参加由当地党委领导的土改工作；领导干部下部队讲解土地法，普及平分土地的政策及知识，提高骨干向驻地群众作社会调查和宣传土地法的本领；号召并组织指战员给家里写信，鼓励亲人积极参加土改斗争。部队的行动，为边区广大农村形成“前边打老蒋，后边挖蒋根”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东北野战军11月9日结束秋季攻势后，立即传达全国土地会议文件，要求部队领导结合诉苦运动讲解《中国土地法大纲》及东北局的《告农民书》，深化土改教育。对于随后展开冬季攻势，是极好的政治动员；对于冬季攻势后转入整党整军，也是很好的思想准备。

在进行土改学习和教育中，除了以会议方式传达贯彻中央精神外，陈毅同志等华东军区首长，于12月15日下达了《华东军区关于全军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命令》^①。

命令昭告：伟大的爱国自卫战争也就是伟大的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目前的任务在于“积极赞助与支持农民正在进行的‘彻底平分土地’的正义行动，以达到消灭封建与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命令指明：全体人员立即加紧土改学习，不准有任何人站在这个学习之外；在实际行动上，必须站在群众方面，不准有任何一个机关采取袖手旁观与漠不关心的态度；出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167—168页。

身地主富农或家庭为地主富农的干部，应当坚决抛弃原来的阶级立场，不准写信回家或暗或明地支持地富家庭；工农干部则应坚决保持其阶级的纯洁性，随时随地不要忘本，不得有任何假公济私与包庇、袒护地富的行为。

命令最后号召全体指战员，普遍地贯彻三查三整以适应土地改革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遵守上述铁的纪律。

1948年初，华东野战军开始集中学习土改政策。许多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的老同志，也都以亲身经历告诫部下，必须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对农民要求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剥削，采取明确的政治态度。粟裕同志说得好：“土改学习，是人民解放军内部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一般的思想改造，工作检查，更重要的是阶级界限的明确划分，阶级成分的彻底检查，改造非工农出身同志，使之无产阶级化，肃清地主、富农、小资产阶级及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纯洁性。使解放军的每一个成员，都全心全意的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①

粟裕同志还说：我们的反攻，不同于拥有强大国防工业基础的苏联红军对德国法西斯的反攻，也不同于1925——1927年被蒋介石篡夺了领导权的“换汤不换药”的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今天我军还未取得对敌军绝对的优势。反攻是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斗争，尤其重要的是群众翻身实行土改的斗争。他要求部队完成土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277页。

改学习，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人人都随时随地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平分土地，建立民主政权，扩大和巩固新解放区^①。

陈老总把打到蒋管区，叫做“用蒋介石的骨头熬蒋介石的油”。的确是这样。而且蒋管区到处是干柴。受尽地主、国民党残酷剥削、压榨的蒋管区老百姓，天天盼我们，等我们去。我军到了新区一讲平分土地，群众热烈欢迎，纷纷起来分地主的粮食、浮财，青年竞相参军。往往我军在村子住一夜，第二天就有一二十个青年走进部队行列。

与此同时，随着老解放区平分土地的胜利，仅在1947年下半年几个月，就有60万翻身的青年农民入伍。他们政治觉悟高，斗志旺盛，一到部队就问：“离南京还有多远？”“什么时候去捉蒋介石？”尽管他们缺乏军事训练，但打起仗来十分勇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到来，给部队学习土改政策，进行诉苦、三查，增添了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

（四）

全国土地会议闭幕不久，中央军委批转了经毛主席亲自修改的辽东三纵队学习土改政策中开展“诉苦教育”的经验，极大地推动和提高了各野战军的诉苦运动。一个是诉苦内容集中以揭发封建压迫为主，把土改教育引向深入；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281页。

一个是扩大范围，号召团结。官兵和军民同诉旧社会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提高工农兵血肉相连，天下穷人是一家的认识；使工农分子的阶级觉悟提得更高，非工农分子彻底转变阶级立场，站在劳动大众一边，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许多部队还开展“一条心”运动，官兵、军民一条心，奔向一个目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中央军委批转辽东三纵队的诉苦教育经验之后，晋冀鲁豫军区、晋察冀军区都总结了各自部队久已开展的诉苦运动经验^①。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为进一步加强诉苦教育的领导，下达了《连队诉苦运动实施方案》的指示。12月，毛主席还对西北野战军一旅的“九天阶级教育”的总结报告批示：“此件很好”。表明全军上下都十分重视诉苦运动的深入发展。

各部队进行诉苦教育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内容极其丰富，很感动人，但诉苦教育的进行步骤和过程，大体一致。就是先倒苦水，后挖苦根，清除“宿命论”等糊涂观念，明白什么是剥削，什么是阶级，再通过归纳总结，认识到列宁所说的：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夺取全国政权。这样，有切合实际的政治引导，挖苦根自然就挖到蒋介石国民党所代表的旧社会“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那里，军民的共同心愿，自然就是推翻“三座

^① 参见《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任白戈：《部队诉苦运动经验》，尹肇之：《目前连队开展诉苦复仇运动中的几个问题》。

大山”，建立新中国，彻底挖掉苦根子。

的确，诉苦运动是集中群众意志和智慧的一个创造，是政治教育的一场革命，其效果之大，影响之深远，超出了想象和预料。

全军诉苦运动中有个共同特点，是解放战士苦水最多，效果也最显著。本来，在抗战末期，解放区农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中，贫苦农民向地主、高利贷主进行说理斗争时，先开“诉苦会”，既是思想动员，也是斗争演练。这种方法很快便在部队中开始运用。1945年9、10月，参加上党、平汉战役的晋冀鲁豫六纵队，开展诉苦复仇运动，有个班里被解放的蒋军士兵，控诉在家乡遭受豪绅地主保长甲长的种种盘剥、迫害，被抓壮丁到国民党军队里又遭反动军官种种残暴侮辱、虐待，他的苦教育了老解放区参军的新战士，增加了对国民党统治的仇恨，全班的团结加强了，各项工作任务也完成得很好。纵队党委将他们的经验普及到全纵队，用以改造被解放的蒋军士兵，使部队全体指战员更自觉地贯彻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他们的经验很快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得到推广。

这期间，彭德怀副总司令对解放战士成分，有个调查统计：一般的贫农约占70%，中农、雇工和其它贫民约占25%，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占5%。所以大多数解放战士经过诉苦有了阶级觉悟，作战十分英勇。1946年9月，《解放日报》在《好好进行俘虏工作》的社论里也说，俘虏的蒋军官兵，大多数是工人农民，一部分知识分

子。蒋介石强迫他们来打内战，来残害中华民族和他们自己。我们人民军队是一所大学校，我们的目的是要救中国，我们珍视中华民族的精华，要尽可能最好地教育他们，组织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正是这种基于无产阶级博大胸怀和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瓦解敌军的工作获得巨大成绩，越来越多的解放战士成为我军的组成成员。

朱老总在土地会议上讲整军问题时也说过，现在部队中出现了“三合一”班：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解放战士，老八路，土改后参军的新战士。三种人编在一个班里，开个诉苦会就都合拢了。解放区是怎样土改的知道了，蒋管区农民的苦处怎么样也知道了，八路军的好传统、好作风也知道了。“这种会开它一两天，一班人的阶级觉悟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野战军一定要进行这种教育，时间紧张也要想法抽出一点来搞。这也是政治教育中的群众路线问题。”^①

随着我军进攻作战的胜利发展，诉苦运动的影响日益扩大。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这成为毛主席所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1949年4月，周恩来副主席在北平对一些爱国人士和大学教授说，我们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400万人以上，“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

^① 《朱德选集》，第209页。

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对于俘虏，我们实行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就是说士兵一俘虏过来就补充到部队，经过诉苦教育，就参加作战。在打黄伯韬时，情形竟发展到上午的俘虏下午就参加作战。当时的解放战士现在有许多已经做了排长、连长。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少有的”^①。

同年7月，周恩来副主席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作政治报告，更精确地讲到：三年解放战争，我们伤亡143万人，消灭敌人569万人，其中被我们俘虏的人数达到70%，即415万，而俘虏中变成解放军的有280万。所以“最近三年来，人民解放军又经过了一次改造。我为什么要用改造这两个字呢？因为他的绝大部分战士，不久以前还是俘虏兵，不经过改造就不能遵守解放军的纪律。最有效的改造武器，就是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实行诉苦运动和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运动，评干部、评党员、评战功的三评运动，使他们感到大家的出身都是劳动人民，都曾受过反动派的压迫剥削，人民解放军是劳动人民的军队，大家应该团结一致，为自己的利益，向曾经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仇人作战。”^②

可以说，周副主席的上述论述，对诉苦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作了最确切的概括和总结。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15—316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6—347页。

很显然，这种诉苦运动，使群众根据自己的切身痛苦揭发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认识工农阶级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社会地位，每个人诉出来的苦，都是活生生的教材，最容易为群众所接受，所以也就最能从每个战士的心底召唤出要彻底埋葬旧社会的无穷力量，凝聚成一往无前的推翻蒋家王朝的战斗力。

诉苦运动的成功，大大克服了以往政治教育中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弊端。大批干部下到基层，同战士打成一片，深入了解战士疾苦和心理变化规律，精心掌握诉苦进程，从培养典型引路，布置肃穆的诉苦环境，启发战士剖析受苦事例，进行解放区、蒋管区新旧社会对比，到为战士给被害亲人祭灵，宣誓，订立苦情簿、报仇登记簿等等，带领战士认识自己，跟着党走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这种深入细致的阶级教育运动，实质上，就是军队的民主运动，或者说是民主运动的重要一步。

早在1928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说过：“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①毛主席还把红军比喻为象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其原因，“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②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年代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诉苦运动，不仅使土改翻身参军的战士和老战士认识到党的伟大，斗争成果之珍贵，从而倍增革命自豪感和责任心，更使解放战士认识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做人的权利与尊严，从而在练兵、作战中奋勇当先，创造出光荣业绩。这充分证明，军队中的民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之一。

1948年9月，总政为新华社起草了社论《军队中的民主运动》，总结了诉苦教育及新式整军运动在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方面取得的伟大成果，以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五）

大多数部队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是紧接着“诉苦”进行的，战士们的主动精神很强，肯自我批评，敢进行批评。查出的问题，证明朱德同志在土地会议上提出需要进行“三查”，是合乎实际的，是非常必要的。以西北野战军的几个纵队11月中下旬10天的检查为例，有的地主出身的干部对平分土地不满，在战斗中进行破坏，致使部队受损失；在战斗作风上，有些干部造假情况，打滑头仗，阳奉阴违，不负责任等。在深入检查中，战士们坚决反对这样的坏干部，对部队教育很大。

这种情况，在其他部队也有。问题之严重，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党内不纯的情况不改变，即便（土地）政策

彻底也不行，不只是不能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也不能进行战争，还会使党走向灭亡。”^①

到中央十二月会议，毛主席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说得更清楚：我们党已经发展到 270 万党员，成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毛主席指出，这种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彻底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规定了适当的步骤和方法……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②。全党全军积极进行三查三整，正是由于和党中央思想一致，认识到这是解决土地问题和进行长期战争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进入 1948 年，周恩来同志听了西北野战军领导同志的汇报，肯定了他们进行诉苦、三查的成绩，指出：放手发动群众，高度发扬民主的诉苦、三查运动，是整军与土改结合起来的一种群众性的政治工作。三查，查出特务、伪军官、异己分子及坏人，这是群众运动的火力，较高高在上的领导机关更能有成果的地方。自然这样就更能巩固部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8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3 页。

队，团结自己，加强对敌的战斗意志^①。

1948年1月30日，毛主席就《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发出指示前后，朱老总在我军解放石家庄之后，给毛主席写信说，攻城之前，上下级干部均先开（攻城战术）学习会，“打时又开会，打不进时又开会。在火线上，三五人仍是开会，特别是支部开会，起了领导作用。老兵带新兵，促进了学习。结果是群策群力，人自为战，取得了胜利。”^②后来，毛主席加上按语，向全党全军批转了朱老总这封信。按语中还提到：“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做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③

朱老总在信里还提到他到了冀中，主持整顿渤海军区的张云逸同志特来同他见面，谈了渤海那里的一些问题很严重。有个分区司令员，竟带部队镇压群众，杀害干部，捆打积极分子。因此，决定要扣押他。说明在那里，整军成了渤海地区土改的先行条件。全国土地会议后，他们进行三查、三整（整党、整军、整财），清查出许多坏干部、坏分子、坏党员。在部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当时以学习委员会相称），发动民主检查，揭发了严重的军阀主义，干部普遍克扣战士，个别的还毒打战士，连级干部有小厨房，每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227页。

② 《朱德选集》，第225-226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12页。

餐几个菜，而战士只喝盐水汤；新战士自家里带来的钱，要替班排长买好吃的，打仗时干部却躲在后面“督战”，有的地方武装一遇敌情严重即溃散、叛变。原因就是干部好多是地主富农、地痞流氓。有一个团，经战士审查提出需要撤换、调换的连排干部多达80余人。与此同时，由战士推选了可以信赖的干部80多个。由此，战士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士兵委员会”才名正言顺地成为经常性制度。1948年夏天，总政第一室主任黄镇带工作组到了渤海军区考察，认为士兵委员会制度，是加强部队团结，防止军阀主义，提高战斗力的好制度。

毛主席、党中央对于渤海地区的问题十分重视。1948年1月28日，毛主席对渤海的整党、整军、整财情况报告作了批示，指出：“在一切官兵关系恶劣，纪律不好，战斗力薄弱的部队，应采取渤海整军经验，组织士兵，放手发动士兵群众的民主运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①。

紧接着，1月30日，毛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指示，再次明确提出：“军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目前在我军部队中热烈进行的三查、三整，就是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达到前两项目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259页。

的。”^①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和《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还有任弼时同志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对于全军诉苦、三查运动克服和防止“左”的偏差，使之健康深入地发展，有重大指导意义。

华东野战军前委，1948年1月接连发出了《关于三查结合三整工作的原则指示》等文件，再次明确指出：成份不纯、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军队与地方处于同一状态。要使我们的军队真正成为土地革命的军队，必须认真的彻底的进行全军上下毫无例外的“三查”，不允许查下不查上，光查战士不查干部，要做到全军“没有一个空碗（指个人）”，“没有一口空锅（指伙食单位）”，全军人人要查，也只有人人都查才能整好全军。同时，强调掌握政策界限：要把原则性问题和生活上的缺点区别分开；对抗拒土改的严重军阀主义、严重违抗纪律的坏分子的处理，必须经过上级党委批准才能执行；严禁超出思想斗争以外的任何作法。我们的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是自由主义、尾巴主义的民主^②。

2月21日，坚持大别山斗争、转战中原的刘邓野战军前委，对三查工作发出的指示，进一步阐明“三查”是集中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及指挥员、工作人员的民主运动，也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5页。

^②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237、238、239页。

就是发动他们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一切干涉土改、包庇地主及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享受思想。指示还明确指出“三查”的基本方针，仍是治病救人，不能乱打一气，不能乱扣帽子，不要把一切不好都说成是地富思想，任何处分必须经上级批准。“三查”之后，达到全军政治上的高度团结。为此，《指示》还在工作步骤上作出规定：全军每个同志都要经过“三查”，从查作风、查思想着手，最后达到查阶级；连以下干部战士在支部领导的班、排或连大会上查；营团干部“三查”，在上一级党委领导下、有下级干部和本支部代表参加的会上进行，等等。

石家庄战役后，总政的同志主要为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军敌军工作会议进行准备工作及会务工作，也派人到附近部队了解整军情况。这时，晋察冀野战军即将向绥远和北宁线出击，前委举行的扩大会议提出，诉苦、“三查”已使部队有了新的气象，但不能估量过高，“三查”必须深入下去，各级党委、政治机关要加强对“三查”的领导，不要在部队中建立贫雇农的单独组织，不要搬用农村整党时“搬石头”的错误口号；属于“三查”内容的会议，只能说理，不能硬逼、硬压、硬追；组织结论不应轻易做，并允许本人上诉。同时，会议还就整顿纪律、制度、作风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要求在“三查”基础上形成广大群众自觉遵守、维护铁的纪律。

这期间，朱总司令对担任内线作战任务，已打下运城正准备打临汾的部队很关心，嘱托指挥这支部队的徐向前

同志，把部队培养成“专门的攻坚部队”。徐向前同志2月23日在前指营以上干部会上讲过朱总司令的要求后，专门就“三查”、“三整”和民主运动有个很长的讲话。

徐向前同志说，“一月底，毛主席来了一个电报，特意讲到军队中的民主问题。”他结合部队情况指出：我们部队凡是没发扬民主的，逃亡就多，就打不好仗，就不成其为铁的拳头，而是豆腐拳头；凡是接连打胜仗的，都是对内团结，对民团结，都在部队中发扬了高度的民主。现在各部队进行“三查”、“三整”，这就是民主。今天部队的三大民主，基本问题在连队上，在连队里开展民主运动，是今天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我们研究士兵逃亡，90%是逼跑的，你不爱他，不把他当兄弟看，而把他看成奴隶，所以他只有跑。好多同志认为讲民主不是涣散军心吗？难道下个命令也要讨论讨论？假若有人批评他，他就说影响他指挥的威信，于是就把民主否定了，这是不对的。须知军队里高度的集中，是以高度的民主为基础的，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能有高度的集中，二者是一个东西的两面，不能分开的。

徐向前同志还结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政治工作基本原则，阐述了毛主席的电报指示精神。指出：现在党内不纯，一些坏分子混进我们部队，带进来很多坏意识坏作风。有些老干部也学了很多坏东西，贪污腐化，打骂士兵，打骂群众，打仗叫苦，甚至违抗命令。要克服这些坏现象，军队就要发扬民主。讲民主，干部要勇于自我批

评，战士要勇于批评，干部与战士，互相教互相学，这样部队团结了，技术提高了，干部威信也提高了。三大民主要在连队中贯彻下去，不能打一点折扣^①。

东北野战军经过诉苦、土改教育后，士气很高，在历时3个月的冬季攻势中，变害怕寒冷的情绪为战胜寒冷的勇气，是胜利完成战役任务的一个重要原因。野战军前委根据绝大多数干部和骨干是由关内来的，很少干涉当地土改的事情，故整编党的队伍的基本内容是以在作战、建军中暴露的思想立场和作风纪律问题为主。通过运动提高部队官兵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更好地贯彻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所以确定运动是进行“五整一查”：即整思想、整作风、整纪律、整关系、整编制，一查是查阶级。运动的进行采用各级党委领导的党委扩大会议形式，先是纵队、师一级的，再是师、团一级的，后是团、营、连级的（连干部主要参加连队土改教育和民主运动）。这样按级检讨，按级解决问题。由于在批评问题上有领导作示范，会议进行顺利，效果好，偏差少。

在2月的东北野战军政治工作会上部署运动时，罗荣桓同志指出：“五整一查”要强调整思想，而且要着重整干部，先解决干部的同级关系与上下级关系问题，自上而下地展开自我批评；同时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尤其要学好十条军事原则，党中央的土地政策，整党指示，工商业政策。

^① 《在徐帅指挥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1—13页。

战士教育，诉苦运动没搞好的还要搞，搞好了的要提高。对于整顿作风，罗荣桓同志说，首先要发扬民主，一切工作、生活、制度都要有民主精神，这也要着重整干部。规定的制度，只要战士遵守，干部不遵守，首长不遵守，这叫什么民主呢？政治工作是群众工作，不能图简单。诉苦运动好的就是走了群众路线，没有搞好的就可能是犯了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干部不懂得群众路线，命令主义是反不掉的^①。

这次政工会后，于1947年冬开始的参军热潮中，又有大批翻身农民参军，到3月，有70个团补充到了前方，大大增强了东北野战军的战斗实力，部队呈现出一派新气象。野战部队的攻坚技术、战术水平有很大提高。从实战中总结出的“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为广大指战员所熟悉、掌握。在西北野战军，指战员新的技术创造是：过五关式瞄准检查法、反光的瞄准镜、不改装的迫击炮抵近平射、挖坑道不响而快的办法、多种多样的排雷办法等等，受到彭德怀同志的称赞。总之，经过诉苦、“三查”之后，全军指战员焕发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在全面展开的攻势作战中，大量歼灭了敌人，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326—331页。

(六)

3月初，西北野战军向南进攻作战，旗开得胜，攻克了宜川城，歼敌5个旅3万人。党中央致电祝贺，称赞宜川大捷，“证明诉苦及三查方法整训部队，政治、经济、军事各项民主，收效极为宏大”。

3月7日，新华社发表毛主席写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①，第一次将诉苦、“三查”概括为“新式整军运动”，并给予高度评价。紧接着，3月20日，毛主席在《关于情况的通报》^②里，评述了我军南线各部队在第一次大休整中，“采取群众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成分、查工作、查斗志）和群众性练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进行整军取得成果；4月1日，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新式整军运动作出完整概括的同时，指示要继续进行这种整军。在学过毛主席的上述三篇文章之后，我起草了总政治部的《新式整军初步总结》，论述“这种完全有领导有秩序地采用民主方法进行的整军，乃是人民解放军长期经验积累与发展的成果，为任何古典军事学说所没有，因而它是一种新式的整军方法。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具体体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1—12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7—1303页。

现。”^①

有些部队，开始三查三整和参加平分土地时，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偏向，但很快得到纠正。正如当时毛主席说的：“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的纠正，或正在纠正中，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②

西北野战军的夏季整训，就是在“健全发展的轨道”上进行的。前委鉴于某些领导干部中存在斗志不强，阶级责任心不高，自由主义严重等情况，不是再搞“三查”，而是决定进行“群众性的整党评斗志运动”。有的纵队搞“三评”，有的纵队搞“四评”：评斗志、评政策、评纪律、评工作。群众叫做是给干部“过秤”、“照镜子”、“看骨头”、“量水平”。彭总给毛主席的报告说，这基本的是在三查运动基础上新的发展，使干部对民主作风与群众路线，得到更进一步的认识。两者不同的是，“三查运动着重于暴露坏的，联系到表扬好的；四评运动是着重于表扬好的，联系到暴露坏的。”^③ 10月间，西北野战军政治部送来了夏季整训给军委总政的报告，周恩来同志让转给我，并批示“此报告甚好，可稍加改编后发表”。

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彭总一再讲，诉苦、“三查”，是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546—54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8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68页。

我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就是因为采取了放手的民主和群众路线的方针。对此他有许多精辟论述。他认为，“有些同志说民主不好，在哲学上讲，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管三查也好，四评也好，如谓西北野战军是新式整军运动的创造者，就会给自己背上包袱。从历史上发展来看，我们只是给新式整军运动充实和增加了内容。”^①但是西北野战军的整军成果和经验毕竟产生了广泛影响。1948年4月初，陈毅同志从陕北返回华东，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赞扬西北野战军的宜川战役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团以上干部会议造成了内部坚强的团结，在意志上与执行政策上的统一。陈毅说他到这个会上听了许多同志发言，“他们的自我批评精神都很好，特别有些同志严格地检讨了和平时期的许多缺点，过去打城市的不注意政策等。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鼓励了他们的自我批评精神，使这个会议取得更大的效果，保证部队一出马便取得很大的胜利。因此新华社发表一篇评论称之为新式整军，因为旧式整军只是整下面不整自己，认为自己是没有什么病的，新式整军主要是整顿领导，整顿干部，并与全军土改学习结合，这才是战斗力坚强的决定因素。”^②

刘伯承同志给一个纵队的干部作报告，讲到整党要与整军作战相结合，也高度评价了宜川大捷。他说：“西北野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2册，第174页。

②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428页。

战军此次练兵整训后，一出动就歼灭敌人五个整旅，这就是整党与群众路线的练兵和作战结合的最好的一个榜样。”就此他还指出，毛主席提出“整编党的队伍”，因为这是关乎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我们整党必须与土地改革一道进行，这样才是一个领导人民的革命政党，才是联系群众站在群众之中的政党，而不是孤立。”他深刻地论述了整党整军的基本目的，就是为着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他尖锐指出：“现在我们部队官僚主义的作风还很严重，主要表现在瞒上欺下，认为自己是干部，群众就必须无条件的听从我，尊重我，一点不顺心，就给难看，大家不敢说话，不敢大胆反映问题，使得上级的东西不能下达，下级的意见不能往上反映。”他热诚希望大家努力，“来把自己在政治上提高一步，推动全党向前进一步，争取胜利的早日到来。”^①

彭德怀、陈毅、刘伯承等同志的话，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新式整军运动的基本特征和意义，同时反映出全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丰富和完善着新式整军经验，使之在健全发展的轨道上，日益取得新的成果。

(七)

1948年5月，前委和工委、后委会合不几天，周恩来

^① 《军队政治工作学习文件》第三辑，战士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141-143页。

同志问我，去看主席了没有？我说怕干扰他，还没有去。周恩来同志告诉我，明天可以去，不要谈工作，说笑说笑，这一段太紧张了。

毛主席见到我还是那么亲热，说到刘筱圃（我爱人）撤出延安前给他的那些豆豉，在陕北是好菜，吃光了，要谢谢她。后来问我：“傅主任（这是毛主席对我的习惯称呼。1946年秋，我从重庆回到延安重新分到总政工作时，毛主席说，‘傅主任还是我们的副主任’），我们进关了吧，离‘咸阳’还有多远？”我想他是用刘邦打败项羽的故事，来比喻我们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已经临近了。毛主席大概听我回答的得体，笑了！我们就项羽、刘邦不同的为人和不同的结局说笑了一阵。毛主席又问我在重庆（1946年我曾在重庆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兼新华社代理社长）交了哪些朋友？说他们快来了；我们已邀请了关中父老、豪杰，下一步就看我们的“约法三章”抓得如何了！

毛主席说的重庆的朋友快来了，指的是党中央已给上海局发出指示，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事。

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那段时间，中央对党的政策和纪律问题，抓得非常紧，要求极为严格。正如中央对山东兵团领导人指示中说的：“我党已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正是基于这种形势和任务，1948年四五月以

后，党中央、毛主席对继续进行新式整军运动提出了新的更高更全面的要求。

实际上，毛主席早在3月7日的评论中就指明了整军运动要同正确进行的整党运动、土改运动相结合；同整党的缩小打击面、严禁乱打乱杀、团结90%以上的人民大众，亦即贯彻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爱国统一战线方针相结合；同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相结合。这三个“相结合”的要求，也就是要求整军运动要推动全军全面、无误地贯彻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几项基本政策。

《宣言》提出几项基本政策时就曾强调：“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①这种对于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要求，对于主要是农民成分的我军来说，越是到胜利的时候越是重要，不仅对基层指战员重要，对中高层尤其是高层干部极为重要。

邓小平同志1948年3月间给干部作报告时说：“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在全军中，人人能够办到的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毛主席在开始建立红军时就规定下来的。把军队的三大任务集中了一下，能够适合每个军人都能做到和必须做到。把打仗集中成为一切行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9页。

动听指挥，把群众工作集中为不拿人民一针一线，把经济集中为一切缴获都归公。把我们的任务和政策具体到八项注意中去，如说话要和气，是反对军阀主义，买卖公平是工商业政策，不搜俘虏腰包是俘虏政策等。”所以小平同志教育干部，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看成是上级简单的规定，只是群众纪律问题。应该知道，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才是一个革命军人够了格，只靠两个冲锋，是不够格的。由于大家都知道“士兵委员会”是毛主席首创的，小平同志说，以后要恢复“老章程”，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只要这件事办好了，力量就是无穷的。”^①

在进攻作战的胜利形势下，城市纪律成为部队非常突出的问题。1948年初，拿下高家堡的部队，有向商人捐款、没收敌军官家属财产等破坏纪律的行为。毛主席得知后，立即批示：“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②。

自然，反复地深入地进行这种教育是整军的重要课题。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罗荣桓等同志，在亲自对干部授教时，还都以李自成、洪秀全领导的农民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发人深省地说明，如果破坏党的政策，享乐腐化，得了天下还会失掉天下。罗荣桓同志还说：北洋军阀来个大翻把，辛亥革命夭折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个大翻把，第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415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3页。

一次大革命失败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还想再来个大翻把，发动全面内战，我们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没有被吓倒，才有即将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但是必须加强思想领导，提高指战员的政策水平。他一语中的地说：“贫雇农为骨干是指乡村来说的，在城市就不适用，就不能贫雇农说了算。姓穷的打姓富的，也只是打地主，而不打工商业”。他强调指出，部队进城的纪律不好，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①。

为此，党中央接连发出指示。3月11日，中央转发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批语指明：放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广大新区及城市工作的开展，都要懂得党在新区和城市中的正确政策，而不至重复过去的许多错误。20日，中央转发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既肯定经过多次教育，部队入城纪律已见进步，同时指出，“唯因本位主义思想作怪，争抓物资与强买强卖的现象仍未根除。”

3月21日，毛主席就各种政策的执行向全军发出指示，肯定西北野战军南进执行政策有进步，对征借粮草和偿还与买粮等问题，重申了规定，并由此而责成各旅委书记必须每半月向前委报告一次新解放区各项工作，各野战军前委各军区对部队执行党的政策与策略没有抓得很紧的事，必须从自己领导方面加以检讨。就是在这个指示中，毛主席强调指出：“须知党的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330—331页。

不注意政策与策略的教育，不使这种教育贯彻到底，使全体指挥员充分明了，不加检查，让单纯军事观点占了统治地位，不尖锐、全面、彻底的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向这种观点让步妥协，或者隐瞒这些现象不向前委或军区反映，而前委或军区不向或少向中央反映，只将战绩向上级及中央反映，那就是离开了或多少离开了党的路线，必须认为是极端严重的现象，应立即加以检讨。”^①

紧接着，党中央、毛主席对报告制度又补充规定，自4月起，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下发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的指示，包括下级向其作的政策与策略性报告并对之作的答复，均应同时发给中央一份。

由此可见，在迎接全国胜利的关头，毛主席、党中央对政策与策略问题是一抓到底的，非常周密，尤其对高层领导干部抓得紧而又紧。

自然，这方面的收效是巨大的，但由于胜利形势发展迅速，加上自身种种原因，要使党的政策和策略完全走上正轨，不可能一蹴而就。当时有件突出的事情是：山东兵团在对昌潍地区之敌宣布宽大政策时，把罪大恶极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大反革命分子、大恶霸，也和敌方其他人员一样，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将功折罪。党中央立即发出指示，指明这“是直接违反我党政策及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首恶者必办一项规定的”，并对其没有事先请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411页。

示，粗率地向敌方发出这项不正确声明，予以严肃批评。同时尖锐地指出了必须立即克服的五种恶劣作风，即“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险地规定及执行明显地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中央要求，对所有这些不良现象，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野战军前委包括在内）的负责同志，应严肃地加以改变，并指导所属中级及下级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同样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中央指出，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合乎中国革命形势的要求的。这种形势要求我们党缩小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而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各地各军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①。

1948年5月，陈毅、粟裕同志到中央来见毛主席，毛主席提了三条方针。一是重申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方针，强调内线、外线的分工，南线、北线的配合，纪律与政策的提高；二是老解放区生产长一寸；三是为保证前两项方针的实施，必须在全党全军反对无政府主义，中心是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101—103页。

杜绝无纪律，破坏政策。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毛主席特别恼火，他号召全党讲纪律，讲政策，服从统一领导，进行正规建设^①。后来，陈毅同志和华东野战军前委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使部队在山东、中原的作战与纪律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绩。

在此期间，邓小平同志模范地遵循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抓紧了党的政策策略教育的深入进行和贯彻到底。他以自己学习研究党的路线和政策策略的心得和亲身体会，给干部作过一次教育作用很大的报告。他说，夺取全国范围的胜利，形势与人民觉悟是具备了，但如果我们犯错误，革命还是要失败的。按毛主席指示，在战争、土改、整党、杀人、工商业5个问题上不犯错误，就能很快胜利；搞错了，或其中任何一个搞错了，都会使革命失败，或者延缓革命胜利的时间。因此中央号召我们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没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路线是空洞的。“这一点，每个党员，每个干部，负的责任越大就越有认识的必要，越是领导机关，就越不能粗心大意。”^②

小平同志联系部队情况说：在我们实际行动中，却往往忽视了党的生命——政策和策略。这是和胜利局面相连的。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我们用心钻研政策和策略，比如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现在已迫近胜利，又不认真讲究政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480—481页。

②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423页。

策和策略了，有的只记得中央路线的几个口号，不去好好体会路线下面的政策和策略，把新华社广播的东西当作是对国民党区宣传的，不当作是对我们的指示，认为自己还有一套，不懂得我们共产党是表里一致的，能做的就能说，能说的就能做。

在报告中，小平同志对右的“左”的偏向作了具体分析，并指明怎样才是正确的。他说：今天是胜利的局面，主要是“左”的错误。不讲政策、策略叫“左”，忘了党的路线叫右。“左”的偏向表现在多方面，如土改中侵犯中农；对地富无区别，对大中小地主一律扫地出门；斗争中乱打乱杀；在新区不估计到斗争环境，操之过急，打击面过大，工作步骤犯急性病等。但反对“左”的偏向不是把土改放在一边，另外搞一套政策、策略，而是正确执行土改这条路线下面的政策、策略，土改不但不能动摇，而且要加速把它完成。战争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有土改的老区。土改是取得胜利的保障。小平同志还对什么叫策略，按毛主席思想作了精辟阐述，并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家：“中央的政策是非常明确了，但为许多党委所忽视，以致许多行动都带有盲目性，使革命遭受损失。经过中央天天的喊，现在开始警觉到了，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必须警觉起来，加强对党的政策、策略的学习和掌握。”^①

后来，小平同志在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作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424页。

了长篇报告，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联系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与具体实践的结合上，透彻、全面地阐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策略思想，对部队政策和纪律的提高，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此期间，刘伯承等野战军领导同志，也亲临讲坛，对部队主要是中高层干部，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灌输。他们率领中原野战军顺利完成了整党和新式整军第二阶段的任务，进一步整顿了连队党支部，加强了士兵委员会的活动，普遍建立了营党委和纵队、旅直属党委，在大规模作战中贯彻执行了党的新区政策、城市政策，争取军政双胜利。到5月下半月，举行了旅以上干部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了各级党委建设、巩固与发展三大民主等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的经验。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传达了毛主席指示：“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存在于我们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文章指出：“坚持党的铁的纪律，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的思想原则与组织原则。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案，1937年‘反对自由主义’的提纲，便是他为这种原则而写作的”；从延安整风到“七大”，党中央、毛主席还有过多次这样的指示，要求维护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和集中领导。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我们党将成为统一的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政党，“集中的革命纪

律，便具有头等的决定的意义”。《前言》公开地重申了中央于4月对山东兵团领导指示中的原则和基本精神^①。

各野战军首长认真学习了《前言》，贯彻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并重读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彭总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还指名道姓催促一位高级干部补课，学习列宁的这篇著作。

中原军区及野战军前委，于7月底8月初在豫西宝丰，召开了全体团以上干部会议，系统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之后的党中央、毛主席有关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指示，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检查团以上领导作风，作为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的第三阶段。

刘伯承同志在会上提出，要达到上级、同级、下级“三层亮”，解决纵队、旅、团三级领导作风问题。会议按此三级顺序，从党委领导、作战、建军、执行新区政策和党内团结等方面，进行了认真检查。干部们发扬“脱裤子割尾巴”的整风精神和“闻过则喜”的传统美德，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给各级领导及部队中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经验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满和不团结等不良现象，以深刻的揭露和严肃批评，同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这就是在当年有典型意义的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435—439页。

著名的宝丰会议。它使到会领导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建军思想教育，认识到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提高政策与纪律性的重要，还看到了新式整军运动、三大民主的作用与深远影响，对进行大兵团作战、全歼中原敌军，是有力的政治动员。

会后，部队以新鲜、有效的多种方法，开展了思想工作和大练兵运动，并在攻坚组织与方法上有了许多发明和创造。刘伯承、陈毅同志亲临练兵场，观看并指导攻城演习，对指战员研制的“飞雷”即炸药抛掷筒，给予了很高评价。这时部队的战斗力，显然已全面得到提高。所以淮海战役后小平同志说，胜利的重要源泉是整党，是战斗意志坚强，是不叫苦。因为经过1948年8、9月整党，对各级干部教育很大，官僚主义大为减少，干部责任心大大增强，在战斗中从上到下都颇为坚强。各纵队虽经过3次到4次的火线编队，但没有叫苦的。

但是，党中央、毛主席抓全军纪律，越是取得重大胜利之后抓得越紧。6月指示之后不久，中央军委又对整顿全军纪律发出了《训令》，要求“全军各前委、各军区、分区、纵委、师委”，均须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及整顿纪律问题，均须作出关于此两项问题的简明扼要的决议，而且明确规定：“两项检讨应分别开会，不要混在一次会上检讨，须写出两个决议，不要将两项问题写在一个决议上”。直至指令，若有某一纵委、师委、军区、军分区没有开会检讨，没有作出决议，必须补开，补作，以此定为一项纪律。所以这

样严厉要求，三令五申，就在于我们要有“铁的纪律”，“达到全党的政策与纪律的完全统一，以便迎接全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我党我军能够更加成为人民的模范，早日完成革命任务”^①。

正是新式整军运动的继续进行，和整党相结合，才有了全军执行政策和纪律的提高，创造了许许多多动人的事迹，为1949年向全国胜利进军，模范地执行“约法八章”，打下了坚实基础。

(八)

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在西柏坡同中央工委、后委会合之后，中央书记处指定我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汇报会。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对有秩序、有领导的全军指战员参加的民主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之后，中央军委在解放战争《第三年战略方针、作战计划和军队建设的指示》中，提出“部队的整训，一年中应有一次较长的时间实行新式整军，确立诉苦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及部队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并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1949年1月，在毛主席起草的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中指出：“必须使人民解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2册，第316页。

放军的政治工作，在军委政治部领导下，做出关于‘新式整军运动’‘党委制’‘革命军人委员会’‘连队支部工作’等项的总结，并制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①

早在1947年，总政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之后，1948年2月5日发出了《关于建立士兵委员会的通知》，其中还规定“应将连队党的支部完全公开，便于与士兵委员会之民主生活结合起来，更加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以后支部开会应邀请士兵委员会的非党员参加，保证他们在会议上对党员有原则批评与建议之权……使支部不脱离群众，使党员接受群众监督。”同年10月，总政批准华东军区部队先试行《支部工作的条例草案》和《革命军人（即士兵）委员会条例草案》，到1949年底，正式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人委员会”“党委会”“连队支部工作”条例草案，颁发给全军实行。至此，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亲手创立的这些“老章程”，成为向全国胜利进军的人民解放军的新的定制，它是“民主的群众性的新式的整军运动”的伟大成果，对于我们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许多老同志说，解放战争中的新式整军运动，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一次真正的“复古”，即全面恢复了以毛泽东同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330页。

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全面落实和发展了古田会议决议案及其所确立的原则。新式整军所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将永载人民军队建设的史册。

在晋察冀的日子里

胡 开 明

一、开辟晋东北

1937年秋天，王维舟和我带领抗大白区学生队，跟随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由陕西到山西去创建抗日根据地。白区学生队就象个插秧机似的，一路走一路沿途安插分配，当抵达山西时，学生已分配得所剩无几了。

此时，在日军疯狂进攻下，割据山西的军阀头目阎锡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根据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把北平、绥远以南的晋东北地域，划为八路军的作战地区，他率部退守太原。一一五师就在晋东北战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阻挠日军向大同及同蒲铁路方向的进攻。

到了晋东北的五台县时，白区学生队已经分配完了。我完成任务后，本来应返回延安上党校的，可一到了抗日前线，我就不愿再返回延安了。这样，我就随抗大的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总部的民运部长傅钟一起工作。一次，我到窑头区下边的村子了解情况，布置扩军征兵工作，待返回

区里时，傅钟给我留下一张条，上面写到：“开明同志：其他学员我均带走，留下个年龄小的刘毅同学，跟你一起工作吧。”我见到字条，连夜骑马追到寨里镇，见到傅钟，原来组织上决定叫他去开辟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叫我留在窑头区工作。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想跟首长一道去，可傅钟一再说服我留在五台县。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服从组织安排。

我返回窑头区，便在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下，进行开辟晋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我们以阎锡山承认的“战地动员委员会”这一半政权性质的合法组织名义发动群众抗日。八路军总部抽调民运部和总政治部宣传队的部分同志成立了一个干部工作团，由王逸群负责领导。工作团的同志被分配到五台县的各区、村，利用各级“总动员委员会”这一合法组织，进行抗日宣传，发动各阶层群众起来保家卫国，很快便在五台山地区掀起了抵抗日军侵略的群众运动。

同时，八路军总部抽调出赵尔陆率领的特务团团部及两个连的红军老战士，来配合干部团开辟以五台为中心的晋东北抗日根据地。

山西五台县，是阎锡山的天下。阎锡山为了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他手下的高级将领都用五台县人，所以当地有个顺口溜：“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在五台县也搞个人崇拜，五台县的老百姓家家都挂锡阎山的像，象供奉灶王爷似的。

当日军侵入繁峙县城时，阎锡山慌忙在沙河南边一个

村庄布置全线撤退，他从小路星夜兼程逃回太原了。阎锡山的军队全部向南溃逃。特别是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迎着敌人北上，阎锡山部却南逃，而且沿途糟害百姓，这使八路军在老百姓乃至国民党军队中威望增高。

五台人把八路军形容成“天兵天将”，不仅老百姓对我这徒手八路格外敬重，就连逃兵见了，也点头致意。

这期间我和一个勤务兵住在一个村公所里。虽然国民党逃兵听从我们指挥，老百姓也拥护我们，可是，这个村的村长、绅士却看不起我们。他们见我身材矮小，穿着大头兵的服装，不像个“官”，便来给我出难题：“八路军领导抗日，光靠口头说不行，得发个布告安定天下，使民众信服！”我一听，这是要考察我识不识字，不由暗笑，心想：你玩这套花招，岂能难倒我？于是我满口赞同：“这个意见好，你们找来笔墨纸砚，咱们发个布告！”

绅士们叫人找来文房四宝，我一边磨墨，一边打腹稿。一会儿提笔便写，刷刷点点，一张布告写成，交给绅士们说：“看写得是否可用？”绅士们哪晓得我这土里土气的八路军，竟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哩！当时我二十三岁，正是文思敏捷之时，这张布告虽然从书法角度上看够不上精美，但从文章结构上讲，措词遣字却是严谨精当。绅士们看了，不由连连鼓掌叫好。接着便吩咐备酒，将我们两位八路推为上座。

山西五台的宴席最盛行的是吃火锅，而当地的习惯是先吃菜，菜吃完后，用火锅中的汤下些杂面，或以汤佐烧

饼下饭。我不喝酒，习惯吃大米饭，酒席上粒米无有，只好入乡随俗。

席间，我提出：发布告，书面文章，总不如口头讲说得清楚，最好召集个群众大会，向群众讲一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村长赞成，立即吩咐下去，鸣锣召集群众开会。

全村群众集合在一个大院，我登台演讲。我是浙江温州人，口音与五台土话相差甚远，讲统一战线，大家都听不懂。此时，有一个当过兵走南闯北的人，通晓浙江温州话，便自告奋勇替我翻成土话。我的讲话，说到群众的心坎上，会开得生动活泼，气氛热烈和谐，群众不时高呼：“八路军怎么说，就怎么办吧！反正是为了不当亡国奴！”

我在三区建立起了“晋东北战地动员委员会”这个半政权性质的抗日机构，为八路军筹粮派款，需要依靠当地人完成，需要使用当地的知识分子作抗日宣传。我在三区胡家庄发现一位曾在县教育科当过督学的在乡知识分子，他叫胡汉楠，此人有办事能力，在群众中也有威望，我便把他叫到区公所，给他个区助理员的职务，叫一位年岁大些的知识分子当区长。

我派胡汉楠到各村推行“合理负担”，他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了解乡情，列出名单，按合理负担的条件，谁家应摊粮款多少，公开催讨。一些富户村绅历来都是叫平民按地亩摊款，自己仗势少交；合理负担改变旧法，让富户多交，贫苦户免征。因此，一些绅士富户叫苦。胡汉楠则现身说法：“你们叫什么苦？谁家有我家交的多？”胡汉楠家

也是富户，他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合理负担政策，其他中农、富农无话可说，都顺顺当当地按合理负担交粮纳款。我见此人正派、能干，便把他由区助理员提升为区长了。

还有个叫李少轩的开明地主，他也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全县实行减租减息，被工作团推选为定襄县的县长。他当县长后，对抗日斗争表现十分坚决。

五台县三区的窑头，是一个煤矿区，日本侵略军进攻山西，窑头的煤矿工人也不下窑挖煤了。我组织矿工参加抗日自卫队，谁家有枪，就动员他拿出来，武装抗日自卫队。自卫队中，有一个当过兵的，我便口头任命他为连长，由他负责操练，只用四五天时间，就搞起了个100多人的抗日武装，成立起一个连。

我不晓得如何带兵，正巧十八集团军后勤部长赵尔陆带着两个排游击到窑头区，我便把这个连交给赵尔陆，叫他带走了。过了几天，窑头区又有大批青年要求参加抗日军，我又搞起了一个连，我不知怎么管理，只好又给赵尔陆打电话，叫他把这个连也带走了。

两个月后，晋东北特委成立，成立了第二军分区。特委（不久改为地委）书记王逸群，我任秘书长，从北平回到定襄县的地下党员、大学生张连奎任组织部长，工作团的洪水任宣传部长，赵尔陆任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王逸群革命经验丰富，遇事能沉住气，也有办法。洪水是越南人，曾在法国留学，后到广东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留在中国参加革命。他知识渊博，在这一地区发动抗

日工作比较得力。我当秘书长，不仅负责特委的文牍工作，还兼管财务。

晋东北特委的一般工作，就是由王逸群、洪水、张连奎和我这4个人决定，有重大问题，军分区司令员赵尔陆也参加，由我们5人研究决定。当时民主空气很浓厚，委员之间相处和谐，心情舒畅。

一天，赵尔陆风风火火地从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来到二地委，传达聂荣臻司令员一道命令：“撤销洪水的二地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并开除其党籍！”这一突如其来的命令使大家震惊了，为什么呢？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聂荣臻率部队到五台时，已进寒冬，但干部、战士尚穿着单衣、草鞋。聂荣臻来山西时，在火车上曾与周恩来相遇，他把战士越冬无衣无鞋的困难向周恩来提过，周恩来回答：“关键仍然是发动群众，有了群众支持，一切问题都好解决。”意思是要依靠群众，不要违犯群众纪律。而这时有人告发洪水违犯群众纪律，因为洪水在苏区搞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到了抗日前线，游击习气未改，生活随便，不拘小节，在推行“合理负担”中，有的地主捐出的皮鞋、皮大衣、皮帽子，他没有交公，自己穿戴了起来。所以，聂司令员非常生气，就下了如此严格的命令，竟将洪水撤了职开除了党籍。

洪水被撤职后，宣传部长由我兼任。不久，为此事又追究领导责任，认为二地委书记王逸群犯了“左”的错误，把王逸群调到冀中区工作，把我调到四地委，只留下张连

奎一人，组成了新地委。

二、调到四地委

1938年2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北方局称：决定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驻晋察冀边区，以北方局代表的名义协同聂荣臻指导晋察冀、平汉路东及平津等地党的工作。

我由晋东北调到四地委时，彭真正好由延安经晋东北抵达阜平。我任四地委宣传部长，是彭真直接同我谈的。他开门见山地说：“开明同志呀，领导决定叫你去四地委当宣传部长，你有意见吗？”我申述说：“我理论水平低，写不了文章，当宣传部长吃力。我和农民倒说得来，叫我当个农会主任吧！”彭真说：“当农会主任的人才多得很。你这个大学毕业生不去当宣传部长，难道叫那些没念过书的农民干部去当吗？”彭真一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就这样，我就去四地委任宣传部长了。

当时四地委所管辖的区域有1580个村庄，它包括阜平县、建屏县的全部，灵寿县、曲阳县、行唐县的大部，平山县一部，井陘县石太线以北部分，还有属于敌占区的正定县和获鹿县。

四地委书记原是李德仲，以后是栗再温和王昭。组织部长杨春茂，几乎是和我同时任职。地委书记李德仲1933年参加革命，1934年任河北省委特派员，来到藁城、无极、完县做恢复党组织工作。他先后以教员、小职员、医生、北

平晨报记者的身份公开活动，在这几个县发展了一批党员，大部分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1935年秋，完（县）无（极）藁（城）中心县委正式成立，他任县委书记。李德仲这位知识分子经过多种职业的熏陶，长期和农民群众结合，已经失去了学生时代的文人气质，成为职业革命家了。

栗再温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他积极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先后担任北平孔德学院党支部书记和北平市委秘书。1935 年 5 月调往山西工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不仅积累了发动群众的斗争经验，还积累了武装斗争经验；他不仅有读书人的雅气，还有农民那种朴实的作风；他不仅有高度的阶级觉悟，还具有较深的政治修养，对待一些事务，他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工农化了的人。

我任四地委宣传部长，与地委书记相比较，则还带有学校中那种知识分子味儿，说话直言不讳。我那时不管是对待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总是亲密相处。我在四地委工作了 7 年，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我在四地委工作的政绩是什么？概括地说：在百团大战中，四地委的宣传鼓动工作是搞得轰轰烈烈的。聂荣臻司令员率兵攻打井陘的战斗结束后，曾称赞我：“你的宣传工作搞得很好！”当晋察冀边区提倡搞好农业生产，支援抗日前线时，我写了《游击区也能开展生产运动》一文，转报中央，1945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

社论中引用，现已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但是，四地委人对我也有非议，说我思想麻痹，甚至加个“右”字。人们对我如此非议，也是事出有因的。

在1941年8月间，日军向晋察冀边区进行“铁壁合围”的大“扫荡”，同时向解放区派了大批特务。在山西省平定县（北）曾发生汉奸特务潜入抗日队伍向敌告密，使二区区委书记张建仁、三区区长邢炳元等惨遭敌人杀害的事件。中共北岳区党委为了使大家提高对敌斗争的警惕性，发出《为彻底粉碎敌寇秋季“扫荡”的指示信》，要求各地都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普遍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除奸反特，坚壁清野，以粉碎敌人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四地委也提高了革命警惕，在革命队伍内部开展了反特活动。当时四地委下属的边区第五中学发生了丢失地委主办的《先锋报》的事情。于是就怀疑有汉奸特务了。

边区第五中学，是个培养干部的学校，学员都是吃公粮的。我在二地委时，五台就建立了个民族革命中学，晋察冀晋东北专员宋劭文曾到会讲话，号召师生努力学习，完成打下抗战建国的基础、复兴民族、改造社会的重大使命。民族革命中学为抗日培养了大批干部。四地委的五中就是仿效二地委民族革命中学搞起来的。所以，学校由当地地委直接领导，地委组织部分管党支部工作，地委宣传部分管青年团的工作。一说五中党支部发生了“特嫌”，组织部就成立了专案班子，在党员学生中清查“特务”。一个参加了共产党的女学生在强逼追问之下承认自己参加了“特

务”活动。于是，专案人员进一步追问：“你的破坏任务是什么？”她违心地说：“准备投毒。”专案人员逼她把毒交出来，她拿不出毒药来，就用削铅笔刀削墙壁上的石灰，然后把削下的石灰面儿跟从药铺里买来的黄色药面混在一起，用纸包好，交了“罪证”。专案组将这“毒药”送到军分区化验室化验，化验证明，白色的是石灰，但其中有汞性。

我看了看这药和化验单，断定这不是毒药，便拿这“毒药”去找五中校长说：“你养鸡了没有？”她说：“养了”。我就把这种粉面拌在鸡食罐里，放进鸡笼让鸡吃。头一天晚上鸡吃了，第二天早上去看，鸡仍然欢蹦乱跳。我向组织部的专案组讲：“这根本不是毒药，喂了鸡，鸡都不死！”组织部的人警惕性高，说：“毒不死鸡，也许会毒死人哩！谁也不敢用生命来试一试。”他们仍继续追逼“特务”，逐步扩大怀疑对象，结果把一位教员逼得自杀了；把语文教师吴江（如今知名的理论家）也给关起来了。我想直接干预，但是不属于自己分工所管范围。于是我给专署专员程宏毅打电话，叫他过问此事，不能冤枉好人。之后我又向区党委书记刘澜涛反映，说五中搞反特扩大化，连吴江也被怀疑是“特务”了。刘澜涛很重视，对我说：“你赶快回去，告诉组织部长，立刻把吴江放出来，要知道，这是违反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是对人权的侵犯！”后来，把关起来的人放了，给受冤屈的人平反了。

在四地委，有人说我思想麻痹，“右”，我想就是因为

干预了这件事引起的。不仅如此，还有人给我戴个“好包袱知识分子”的帽子，取了个外号——“胡宣传”。凡是外号，都含有嘲讽之意，也是戏弄之言。“胡宣传”的外号，借我姓胡这个谐音开开玩笑，是平常的事。另外，我对一些小事马马虎虎，也是人们给取这种外号的一个因素。有人说是因为我敢于替“特务”说话、辩冤而赠的外号，这样推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我实事求是地证实一个问题，是不怕担什么嫌疑的。

三、文墨情谊

1945年5月，区党委把我调到晋察冀日报。6月，我到了报社，此时正是报社反“克里空”的时候。“克里空”是苏联话剧《前线》中一个记者的名子，他写新闻不是以事实为根据，而是靠空想，写出来的新闻报道都是假的。因此，新闻界就以“克里空”作假报道的代名词了。

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是依靠从平、津等城市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办报的。由于城市知识分子不熟悉农村生活，不十分了解农村群众的实际斗争，在处理稿子时，曾编发过不真实的报道或与农村政策相悖的文章。为了克服报社工作人员中的这一弱点，防止假报道出现，邓拓便在新闻队伍内部开展了反“克里空”活动。他为了使知识分子尽快熟悉工作实际，曾向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提出建议，给报社调进一些在地委、县委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干部来充

实新闻队伍，以弥补知识分子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之不足。当时胡锡奎是晋察冀分局的宣传部长，邓拓的这一建议很快兑现，从二分区调来了民运组长、群众联合会主任李希庚和韩劲草等同志，边区唯一的女县委书记宋汀也调到报社编辑部来了。然后又把我从四地委调进报社。

邓拓是个大手笔，凡是重要社论，都是他晚上动笔，连夜送聂荣臻审定，第二天早晨见报的。他的诗词、书法功力都很深，是少有的才子。我与邓拓相比，就有些自愧不如了。一次，我参加边区政府工作会议，邓拓叫我写一篇动员群众积极开展春耕生产的社论，我用了好几天才写出来。之后我对邓拓说：“你一个晚上写一篇社论，我一篇社论写了好几天，我不适合做编辑部的工作呀！”邓拓却说：“我一个晚上写一篇社论，可是新华社没给广播，你用几天写篇社论，新华社却给广播了，何优何劣？”我知道，这是邓拓在鼓励我，宽慰我。但是后来，我还是分管了行政工作。我负责管理报社的党总支和人事工作，兼管记者科和向新华总社的发稿工作，职务是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和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副社长。

我分管报社的人事工作，当时那些从农村调上来的工农干部老是闹情绪。邓拓调他们进报社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知识分子丰富实践经验，意在往知识分子中“掺沙子”。实际上，工农干部并帮不了知识分子多少忙。知识分子写了稿，给这些工农干部念，请他们审查、把关。可文化水平低的工农干部也提不出意见，倒觉得到报社来是“受

罪”，要求调回原来工作岗位。我体会到这一点，便答应把文化水平太低的同志调回原地去。在这种情况下，通讯科长李希庚也提出要回民运部工作，闹开了情绪。我说：“放谁走也不放你走！我发现你有才华。你现在虽然写不好稿子，但是你讲起话来很有逻辑性，写文章缺乏逻辑思维写不好，可你要加强写作锻炼，准能写出好文章来。我给你一个锻炼机会，我决定组织个前线记者团，专搞军事报道，由你当团长。”

李希庚在我的安排下，去前线记者团当团长了。他在前线工作得很出色，部队领导发现他的才干，叫他创办《子弟兵报》，任报社副社长。解放后，他曾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等职，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

我这个人很爱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齐越共同作实况转播的丁一岚，所以能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女播音员，也是与我爱才分不开的。

1945年日本投降后，晋察冀日报社迁入张家口市。收复张家口敌伪广播电台后，秘书长张庆泰要成立个共产党的广播电台。旧电台人员经过一番整顿，只留下一个男播音员，而女播音员、编辑人员很缺乏，便向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要人。邓拓对我说：“成立广播电台，要编辑人员好办，可找个女播音员，实在难。老胡，你去想办法吧，越快越好。”我说：“女播音员不是有个现成的吗，你老婆丁一岚就是个好材料。”邓拓进一步讲女播音员应具备的条

件：“当播音员的，一需要口齿伶俐，音色圆润甜美，二是要有北方人的普通话口音。丁一岚满口天津话，她怎么能行呢？”我说：“我有根据，只要你不反对，她当播音员准行！”

丁一岚是天津市人，1937年初中毕业，刚16岁，就参加了天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天津呆不下去，投奔到延安。1939年转战到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在平山县妇女救国会工作。1941年调到四分区妇女救国会做宣传工作。她写了宣传提纲，写了新闻报道，总要送给我这个地委宣传部长审阅，或请示宣传意图，所以我对丁一岚是早有了解的。我调到晋察冀日报社后，发现邓拓30多岁了还是个单身汉，就有意地向邓拓介绍了丁一岚的才华与容貌，要邓对丁一岚的写作多加指导和关照。后来，邓指导丁一岚写作，逐渐书信来往频繁，我便把丁一岚调到报社，加紧撮合，使他们成为郎才女貌的一对。

我说丁一岚能够当好播音员，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在1945年8月11日的晚上，晋察冀日报社接到一个最令人兴奋的电话：“日本投降了，新华社要发电讯，要尽快宣传。”人们得到这一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兴奋得奔走相告：“我们别睡觉了，到街上去宣传吧！号外还没印出来哩！”我是这支宣传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大家手拿着新华社发来的延安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的第一号、第二号直到第七号命令，把群众喊起来，给大家宣读。寂静的山区，顿时一片欢腾。在宣传队伍中，我被一个银铃般的、最悦耳的、

充满激情的读报声吸引住了。走去一看，是丁一岚，她改变了平时说话的腔调，抑扬顿挫，引人爱听。我一直跟着丁一岚宣传了一夜。在天明回来的路上，同志们以称赞的口吻对丁一岚开玩笑说：“你宣传得真好，等咱们进城市以后，你去当播音员吧！”同志们是对丁一岚开玩笑，可我却动了心，丁一岚读报的悦耳声音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所以，当邓拓叫我找女播音员时，我便脱口而出：“丁一岚就是个现成人才！”邓拓被我一将，便说：“那就把她交给你，去找内行人考试考试吧！”

经过考试，合格；又稍加技术训练，丁一岚便从1947年1月开始，正式上晋察冀广播电台播音了。新华社社转移到西柏坡后，她在陕北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音。解放战争胜利，中央进北平后，她又在北平广播电台播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一岚同齐越在天安门城楼上作实况转播，博得全国人民的称赞！

《人民日报》的特级记者、《报告文学》杂志主编田流对自己所以成为一名记者，也曾有一番动情的描述。田流是这样说的：“1945年以前，我在晋察冀四地委所属的灵寿县当抗日联合会宣传部长，我爱人徐兑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开明是地委宣传部长，我们是在他直接间接领导下工作的，彼此十分熟悉。我们在新闻、文学事业上取得成就，是由于我的老领导胡开明热情荐举，才干上这一行的。”田流在离休之前写了一篇《我的记者生涯是怎样开始的》文章。文章开头这样写道：“生活中，常常会出现意外的事。

我走上‘记者’这个工作岗位，就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决定的。1945年5月，我被调到晋察冀中央党校学习。日寇投降后，党校学习结束，组织分配我去东北工作，当时我们的孩子出生才二十几天。到达塞外山城张家口的第二天，我与爱人上街转转，没想到与我们的老上级胡开明同志邂逅相遇。胡开明同志简单地向我们介绍了当前东北的形势，并告诉我们，东北地区的干部已经够用了。他建议我们去报社工作。当时我们没有将它放在心上。翌日，中央局组织部分管干部工作的陈中守在与我们谈话中，正式分配我们到晋察冀日报社工作。我们去报社报到了。”田流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接待我们的恰巧是胡开明。他笑嘻嘻地说：‘我正等你们，走，到你们的住处再谈。’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已调任《晋察冀日报》副社长。所以，把我们的住处、工作都安排妥了，叫我爱人徐兑当编辑，叫我当记者。”就这样，我和田流建立了很深的友情。

使我感慨最深的还有作家葛文。1949年她进张家口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题目是《刨树根的人》。我见到这篇文章，就记住葛文这个名字了。那时，我当了察哈尔省委宣传部长，叫田间筹建省文联。在召开省文代会时，我去参加。一看作家名单上没有葛文的名字，便对田间说：“我发现一个叫葛文的小伙子，在《人民日报》上登过小说，满可以把他找来参加文代会嘛！”田间说：“葛文是我老婆，牛树才派她到天津参加华北工代会了。”身旁的人听了都笑了起来。我说：“那更好办了，她回来一定

安排个适合她搞创作的单位。”结果她被安排到张家口市图书馆任馆长。1962年困难时期，她在怀来县写长篇小说《喷泉记》，我当张家口地委书记，特来看她，因为当时她病着，见到我一激动，晕倒了。我一见就明白了，说：“你是饿的。”于是我用车把她接到赤城县温泉疗养院，从县里找个大师傅帮她做饭，叫她在那里静心写作。国庆节前，几十万字的《喷泉记》脱稿了。我与葛文、田间之间，也建立了极深的感情，过从甚密。

四、考 验

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及各解放区城市，晋察冀日报社随机关撤出张家口市，转移到原来驻过的农村根据地平山、阜平一带。1947年8月间，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黄敬同志找我谈话说：“冀热察区党委孙敬文曾推荐你去他那里作宣传工作，经中央局研究，决定任你为冀热察区党委宣传部长，你有什么意见啊？”当时，我想南下，黄敬对我这么一谈，我不便推辞，就勉强答应说：“去就去吧！”由于中央马上就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我没有到冀热察区报到，就以冀热察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了全国土地会议。代表团成员有冀热察区党委书记刘道生、副书记牛树才、宣传部长孙敬文、察东地委书记马天水等。会议讨论土地政策时意见分歧很大，一部分人主张土改中要动中农财产，在土地分配上要绝对平均；要依靠贫农团，踢开党支部搞土

改，“搬石头”，对原来的干部一律不用。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左”了。所以，我就更不想调到冀热察区了。

9月底，在全国土地会议将要结束时，中央决定要调一批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我也积极报了名。后中央又决定：凡是报名南下干部，都要在晋察冀参加一期土改，然后再南下。

此时，赵振声（即李葆华）是晋察冀区党委副书记，他是分管干部的。他对我说：“你先跟我下乡搞土改吧！任命你当土改工作团团长。”我说：“在报社工作时，虽然我下去搞过土改，但是经验不足，请您多作指示。”我急切地向赵振声请示工作，可赵振声只说一句：“这次叫你搞土改，对你是一次考验。”我弄不清这句话的意思，一连问了3次，回答仍然重复这一句，这更使我百思不解，心里暗想：考验我什么呢？是立场问题？还是观点问题？这两个问题自己已经解决了呀，还考验我什么呢？是不是指自己在1947年5月率工作团去王快区的那件事？

我在晋察冀日报社时，当过一次晋察冀中央局工作团团长，这个工作团共20多人，其成员大都是原来在石家庄市搞地下工作的党员。我这个工作团的任务是，到阜平最富的王快区统一领导那里的“土改复查”工作。我率团由阜平城向王快镇进发，下午6点到达目的地。当时天还不黑，我听说王快村外正开联村斗争会，便放下背包去会场。还没到会场，见人们已开始往回走，会已散了。可是，我

见参加会的人个个面带惧色，尤其是妇女，问话也垂头不语。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逆着散会的人流，到会场上看个究竟。只见会场是一片坟地，坟旁树上绑着一个人，鲜血淋漓，腹部被剖开，再看地下，躺着几具尸体。对此，我心中十分反感，土改复查这样搞，不搞成天下大乱了吗？我急忙回到王快镇，立即召集王快区委和各复查工作团干部开会。恰巧，晋察冀中央局派往冀中的复查工作团途经此地，我也请团长参加。在会上我讲：“我是中央局派的工作团，是为王快区的土改复查实行统一领导而来的。现在各村开斗争会，执行政策很乱，出现打死人的事情，这种局势要控制。今后，凡开斗争会、联村斗争会，必须请示工作团批准。明天，召集各村支部书记、村干部开会，我还要细讲。”我想控制一下秩序，所以先向区委和工作团打个招呼。赴冀中工作团团长了，认为我是在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便即席发言，大讲一番“要走群众路线”的问题，特别强调了“按群众意见办，要让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和我的讲话意思正好相悖。而且，他讲完之后，就给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吴德打电话。他打电话我不便去听、去问，但从只言片语中可以听出他是在反映我的问题。这就使我犯了难，原定明天开村干部会我要细讲，遇到了这个岔口，还讲不讲呢？用什么观点、立场讲呢？我一夜没睡。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还是按自己原来的看法讲，但讲话的语言要力求准确，要写成文字，并誊清一份，立即送请吴德审查，如有错误，请他及时指出。我在第二天的全区

村干部大会上，照自己的讲稿发布了工作团的规定和纪律。一周后，农村清算地主杀人的事制止了，农民随便到外村斗地主的情况也基本停了下来。我等待吴德的批复，一周过去，未见吴德对我的讲稿提出批评，我放心了。接着上级下达指示：“土改复查工作暂停，工作团撤回。”

土地改革运动，是土地制度的一场大变革。领导这次群众运动，谁也没有现成的经验。人们对这一新事物有不同的理解与认识。所以，在土改运动中，曾出现过右和“左”的错误。

第一次土改，是从1946年中央发出《五·四指示》开始的。这一指示，其内容共18条，头一条就是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实行“耕者有其田”。其它各条则规定要照顾一些人。此指示经晋察冀中央局、区党委讨论了，但是对第一条（满足贫雇农要求）未强调，对其它各条则强调了。因此，虽进行了土改，但并未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群众没有普遍发动起来，地主仍掌握多数土地。在政治上，有的地主富农仍掌握领导权，贫农没有政治地位。

1947年5月以后，朱德、刘少奇到边区，了解到边区土改很不彻底，决定进行一次土改复查运动，进行第二次土改。

在这次土改复查中，又犯了左倾错误，发生了乱杀人的现象。有的村庄，地主富农被杀；有的村在本村不肯杀人，便搞联村斗争，到外村斗地主，杀人。如我在王快所见到的那种恐怖场面。在这种“左”的偏差出现后，转移

了土地改革的大方向，广大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仍未彻底解决。所以，中央下达指示：“土改复查工作暂停，工作团撤回。”等候中央土地工作会议后，再作部署。

我率领的工作团从王快区撤回来后，有人议论：是胡开明犯了右倾错误吧？我也知道，有些干部，特别是分区农会的主要领导，曾要求区党委把王快胡开明工作团调回来，说我袒护了地主。土地会议后，刘澜涛在中央局的会上讲：“晋察冀区党委要求调回王快的胡开明工作团，说他袒护地主。这是毫无根据的错误意见。”

那么，这次我参加土改，还需要经受什么考验呢？我想了很多，还是没能理解赵振声那句话。于是，便带着接受考验的思想，随赵振声重回四地委。

此时的四地委领导已重新作了调整，选拔的都是贫雇农成份的干部。地委书记梁雨晴，是在中央土地会议上任命的，不识字，原在平山县当县委书记。专员崔民生，与梁雨晴是亲叔侄，当过长工，不识字。地委秘书长黄庆祺，文化水平也不很高。可以看出，地委班子是按偏重成份的指导思想配备的。起初，我被任命为工作团团长，在阜平县的木兰村搞平分土地试点，全团共10多人。赵振声一见地委领导成员是这种状况，便对我说：“你还是回四地委吧，你当副书记，做梁雨晴、崔民生的帮手，他们都不大识字，发下的《土地法大纲》，他们都不会念，怎么传达贯彻呀！”

四地委的书记、专员不识字，可是四地委所属的各县县委书记配备得却特别强。除了获鹿县委书记曹维屏因出

身成份好没调动外，其他各县都是新配备的地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曲阳是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阜平是中央局城工部长吴德峰，正定是中央局社会部长许建国，平山是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建屏是中央下来的钱俊瑞，行唐是当过地委书记的田平，井陘是原二地委组织部长李力安。平山、建屏两县，又是中央工委即刘少奇直接领导的。在这样的干部阵容之中，四地委驾驭政策是很难的。中央新的指示或政策文件发下来，地委书记梁雨晴、专员崔民生不识字，我只好给他们念，有时念着念着，崔民生便打起呼噜来。

四地委领导与各县委领导水平相差这么大，怎么能实现对下面的领导呢？我只好带着秘书长黄庆祺，研究室副主任封云亭办了个《土改通讯》，来指导四地委管辖区的平分土地运动。当时各县都是中央工委搞平分土地的试点，地委办公室主要是选登各县的办法和经验，加以推广。选登各县的经验，必然有个倾向性，地委的倾向性，又难免与县领导的看法不一致，这就发生了矛盾。

平分土地第一阶段是组织阶级队伍。我发现建屏县“搬石头”搞得太厉害。什么叫“搬石头”？就是把前期土改中涌现出来的干部、共产党员看成是“绊脚石”，凡当过党、政、团体委员以上的干部统统罢免，说只有把“石头”搬开，才能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以便搞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平分土地运动。结果，队伍还是建立不起来。我跟农村基层干部在一起活动多年，很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

土改复查时，农村干部中虽然有中农成份的党员干部，但也有贫农成份的骨干，有的有些毛病，但不是都不能用。建屏县起初把所有农村干部当“石头”搬掉，很多基层干部心不平。于是我就写了个调查材料反映到中央工委刘少奇那里，说建屏县把所有的基层干部当“石头”搬掉了，只剩一个哑叭；井陘县某村，因为一个青年妇女是寡妇，也不能参加贫农团，这样搞关门主义，把自己的队伍搞小了，所以阶级队伍组织不起来。

刘少奇见到我的报告，觉得是个问题，就在1947年12月的一天，把平山县的冯文彬、建屏县的钱俊瑞、井陘县的李力安、四地委梁雨晴、崔民生和我召集到西柏坡来，听取汇报。地委研究室的封云亭、王植庭、李钧等也参加了会议，中央工委廖鲁言作记录。与少奇同志一块听汇报的还有朱德同志。当我汇报建屏县问题时，钱俊瑞听说他搬“石头”搬得太厉害，便站起来反驳。刘少奇说：“老钱啊，你别急。你县发通知规定‘凡是当过委员以上的村干部都不能入贫农团’，我不同意这样做，你坚持要发，我又认可了。今天组织不起阶级队伍来，也有我的责任。效果不好，再改过来，这不影响你钱俊瑞的威信嘛！”刘少奇主动承担了责任，便解决了地委县委之间的矛盾。

在这次土改汇报会上，基本上肯定了我的看法。

在四地委地、县、区三级平分土地的整编队伍中，据建屏、获鹿、平山、井陘、正定、行唐、灵寿7个县统计，开除党籍的有：7名地主成份的干部，两名区干部，1名富

农成份的干部，1名中农，1名贫农。在处理干部时，往往给犯错误的干部较重的处分。刘少奇讲，一定要掌握教育改造的方针，处理从轻。但地委三级党员干部中有46名干部分别受到撤职、留党查看、停止党籍、开除党籍的处分。

在整编队伍中，开始有些阶级界限不清，特别有一度查三代，把一些已是贫农生活水平的也划到地主富农那里去了，弄得人心慌慌。

1948年，毛泽东从陕北发来电报，转发习仲勋《西北土改中的问题》一文，提出了怎样对待老区、半老区的土改政策问题。接着，又发来任弼时于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题目是《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他的讲话指出：“中央最近重新发出了1933年的两个文件：《怎样分析阶级》和《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其中关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中央所以发出这两个文件，是因为有些地方在定阶级成分时发生了错误，没有掌握定阶级成分的正确标准。把许多人的成分定错了，弄得敌我界限没分清楚。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划清界限，分清敌我，孤立敌人，分化敌人，不要孤立自己。如果把许多人定错了成分，那就搞乱了自己的阵营，这样做的危险是很大的。”他列举晋绥分局纠正兴县蔡家崖行政村定成分中的错误事例说：“蔡家崖村共520户，评定地主124户，占总户数的22.46%。据一般估计，在旧政权下，农村中平均地主占总户数约为3%，富农约为5%，合计地富共约占8%的户数，

人数约占 10%。老解放区内，很多地主及旧富农已经变化，变为其他成分，地富的户数应该少于 8%。后来分局按《怎样分析阶级》重新评定，原来是蔡家崖人为地把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 50 多户，300 多人，算到敌人阵营去了，把自己队伍里边的人，送到敌人方面去，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

中央新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四地委，我觉得与某些县领导认识上的不统一就有了解决办法了。我对地委研究室的几位同志说，咱们有了这个精神，就不要睡觉了，连夜把记录整理出来，立刻翻印下去。大家马上核对记录，整理出一份记录稿，由我修改后，立即刻成蜡纸，印成文件。天亮后，由我和梁雨晴、黄庆祺分头骑着骡马，跑到各区，使中央指示尽快与群众见面，纠正平分土地中“左”的错误。

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我抱着经受考验的思想进行工作，对一些问题都要反复思考之后再作。所以，在立场、观点上都经得住实践的考验。虽然我和一些同志发生过争论或意见不一致，甚至有人告我的状，说我袒护地主，但是群众还是赞成的，说我没架子，好商量事，不仅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团结得很好，同时对工农出身的干部团结得也很好。在四地委任副书记的工作当中，我没有受到群众的控告和上级领导的指责。

1948 年秋，平分土地工作结束后，有一天，晋察冀区党委副书记刘澜涛给我打电话讲：“现在全国形势已发生了新的变化，你要作好充分思想准备，不是往南，就是往北。具体时间另行通知你。”

在接刘澜涛的电话后不几天，组织上决定：北岳区党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同志南下，同时决定让我接任宣传部长职务。

1948年12月24日，华北野战军收复塞外军事要地张家口，一道命令下来，我即从阜平出发经涞源，赶赴张家口了。

南昌起义中的贺龙

宋川 何善

在北伐军向河南胜利进军的过程中，南京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反动派相互勾结，反共反人民的逆流正在发展。贺龙在河南的时候，就看到了反共活动日益猖狂，中国共产党处境日益艰难的趋势。许多北伐军的将领已经在他们管辖的部队和区域中“清共”，对曾经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或残酷屠杀，或撤职逮捕，或“礼送出境”。在这种情况下，贺龙诚恳地对周逸群说：“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周逸群激动地说：“我们之间真是患难与共，肝胆相照啊！”

1927年6月26日，贺龙回到武汉。此时汪精卫正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形势对共产党更加不利。28日，贺龙主动去拜访中共领导人林伯渠，请他介绍当前形势。7月初，贺龙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

贺龙握着周恩来的手，热情地说：“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呢。如今见面胜似闻名喽。”周恩来也热情地说：“湖南省委有几次报告写给中央，都对你很赞佩。疾风知劲草，我们对你也是很钦佩的。”贺龙说：

“钦佩不敢当，我一直追求能让中国工农大众过上好日子理想和能够实现这种理想的政党。最后，我认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最好的，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对我相信，我就别无所求了。”周恩来说：“贺龙同志，我们当然是相信你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呢？”贺龙说：“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帮人拼到底。”

贺龙与周恩来的这次会面，奠定了他们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友谊。

贺龙又很快会见了共产党员朱德。贺龙极其亲切地对朱德说：“你是我的前辈喽！当年讨袁战争，我派人去四川请蔡锷都督发兵到湘西，就晓得你是最能打仗的团长。你的大名早传到了湖南。”朱德笑着说：“初相识莫夸人么。北伐时，你率领部队攻打荆州、沙市、宜昌。我奉中央指示去川军作杨森的工作，希望他摆脱吴佩孚，拥护北伐。他出尔反尔，还是听命北洋军阀，和你们打了一仗。说起来，是我工作没做好啊！”贺龙说：“那怎么能怪你？看看如今，左派变右，右派更右，一个赛过一个，又把一片大好形势搞垮台了。这和民国5年反袁斗争之后的情况也差不多嘛。”朱德说：“比那个时候复杂得多了。其实，一句话就讲明白了，剥削人压迫人的阶级和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永远是搞不拢的，永远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贺龙说：“真讲得透彻，我是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站在受剥削、受压迫阶级一边的。”朱德说：“我和你一样，也是摸索着找到

了共产党的啊！”贺龙说：“不全一样，我摸索着找到了共产党，可如今还不是个共产党员呢。”

与此同时，蒋介石、汪精卫都分别派了他们的高级官吏，如集团军总指挥、省长之类人员来拜会贺龙，运用高官厚禄等各种手段进行拉拢，但是，全都被贺龙拒绝了。

进入7月，武汉的形势更趋复杂。汪精卫一方面想以武汉政府的武装同蒋介石争夺领导权，打出“东征讨蒋”的旗号，命令担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率所部，其中包括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部队，沿江而下，东征讨伐蒋介石；另一方面，又一步步地撕下了左派的假面具，日渐暴露出其背叛革命的反动嘴脸。

作为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刻，坚决地站在工农大众一边。他趁部队尚未离开武汉之际，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共产党人的措施：

7月8日，贺龙派第二十军的船只送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离开武汉。

7月10日，贺龙同意周逸群转达的中共中央军委建议，接纳正在遭受严重迫害的鄂城、大冶各地武装工人纠察队，并且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秘密编入了军教导团。贺龙高兴地说：“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人员，连军饷都是层层克扣，要么干脆不发，肥了大脑壳，苦了当兵的。现在不同了，共产党给我补充，工农同志很愿意编到我这里来。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有一点点子进步喽！”编来的工农士兵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贺

龙十分信任他们。军部特务营是最可靠的警卫部队，贺龙让共产党员唐天际当该营第一连副连长，共产党员吴溉之当第二排排长。贺龙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保护工农武装，而且有意通过他们来改善部队的政治素质。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开始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贺龙挺身而出，命令部队在武汉三镇许多共产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口挂上第二十军的旗帜，派兵站岗，阻止反动派搜捕；同时，又将因为在各地遭受迫害、处境危险而逃来武汉的共产党员300余人保护起来，其中许多人在第二十军担任了政治工作。

7月17日，贺龙在第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表示坚决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反复强调全体军官在革命紧急关头要站稳立场。贺龙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了，武汉国民政府终于撕掉了他们脸上的假面具，同共产党分裂了。他们实行‘宁汉合流’、‘反共灭共’的政策，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掉一个’的反革命口号下，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在这危急关头，两湖的工农群众都准备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蒋介石、汪精卫拼个死活……我们的队伍是工农大众的队伍，我们已经闹了多年革命，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有3条：第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二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干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

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我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你们愿意跟我搞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对我说，我送你盘缠钱，回到家乡替我向你娘老子问好。可是有一条讲清楚，不许拉走部队。”当天，贺龙又在第二十军教导团讲话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了革命，今后还会有人要叛变的。可是，你们不用怕他们，他们不是三头六臂，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头，两条手臂，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全力以赴，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7月19日，贺龙派船送朱德离开武汉去九江。

当时，在这一片反共反人民的白色恐怖中，作为北伐军的高级将领而且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有这样的革命坚定性，有这样的胆略和逆潮流而动的精神，不仅难能可贵，而且是绝无仅有的。在当时国民革命军里握着重兵的非共产党员高级将领中，能够率领部队坚定不移地服从共产党领导，跟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到底的只有贺龙。

汪精卫公开叛变后，贺、叶的部队并没有停止东调。7月23日，贺龙率部抵达九江。贺龙刚到九江，就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双方寒暄几句以后，谭平山就十分认真严肃地说：“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机密大事。”贺龙也严肃地说：“好，信任我贺龙，我当然唯命是听。”谭平山说：“汪精卫7月15日彻底叛变以后，中央派秘书长邓中夏和李立三来九江和叶挺研究办法。20

日，中夏、立三和我，还有叶挺、聂荣臻开会研究，我们认为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决定独立的军事行动，实行武装暴动。我们确定计划后，由中夏、立三去庐山和瞿秋白商量，秋白也完全同意，并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今天，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夏、立三和我们的多次电报，以及秋白的口头汇报，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派恩来主持大局，领导暴动。我们希望 you 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贺龙激动地站了起来说：“平山同志，我贺龙感激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样重大的机密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谭平山兴奋地说：“我更要谢谢你，有二十军参加，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贺龙说：“谁也莫谢谁，我们大家一条心，为中国工农做一点点子事情嘛！”

贺龙的坚决态度使在九江的几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进而决定贺龙率第二十军、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及其他部队于 28 日以前集中到南昌。28 日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急电请示在武汉的中共中央。

这时的九江，成了斗争的中心。

武汉政府领导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亲自拜会贺龙，拉交情，套友谊，动员贺龙靠拢汪精卫，参加反共行列。贺龙听后大笑一阵，说：“两位所讲，我贺龙承情心领。我从民国 3 年 18 岁参加中华革命党以来，汪先生的大名真是如雷灌耳喽！汪先生谋刺摄政王的大勇更是天下皆知，让我贺龙佩

服得五体投地。国共合作以来，汪先生扛着正牌继承先总理遗志的大旗，慷慨激昂地说：“一定要联俄联共，一定要平均地权……”汪先生的话，还在我耳朵边边上打转转，如今一变脸就大杀大砍起共产党员和工农大众来了。我在四川住过，川剧里的变脸把戏也没有汪主席来得那么快哟！我贺龙奉劝两兄一句，我们这些玩枪杆子的，斗不过那些善于变脸的政客，哪一天人头落地，恐怕还不晓得是怎样落的呢。何必不趁着手里有枪，为天下工农，为中国办些好事，也不枉生在世上一场嘛！”黄琪翔、朱培德没能说服贺龙，反被贺龙抢白了一通，悻悻地走了。

紧接着，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于7月24日从庐山发来电报，要归他指挥的贺龙、叶挺去庐山开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开会是假，剥夺贺龙、叶挺的兵权是真。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急忙找到叶挺，将汪精卫、张发奎等人的阴谋告诉了叶挺。他们商定邀贺龙和中共党员高语罕、廖乾吾到甘棠湖，以划船赏景为掩护，一起商量对策。

7月25日，贺龙、叶挺、叶剑英等乘小舟，荡漾在甘棠湖碧波之中，仿佛是在欣赏湖光山色，其实却是十分紧张地商量着关系革命前途和中国命运的大事。叶剑英说：“汪精卫、张发奎调贺龙、叶挺上庐山是企图把部队调往德安，相机扣押贺龙、叶挺，解除兵权。”贺龙朝叶挺笑笑说：“如何？我们所料不错吧？汪精卫靠不住，尽人都信了，张发奎靠不住，还有一些人不大相信呢。其实，在河南作战

时，我就领教过他的为人。照我看，庐山不去，德安不去，我们只去南昌。”叶挺说：“张发奎和我当年都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营长。北伐以来，共产党员为主的部队替他打冲锋，他才当了军长、总司令，怎么能想得到关键时刻他竟会这样干呢？”贺龙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嘛！再说，人也会变哪，在官场上这也不算怪事。我们不上他的当，坚决和他们拼！”他们议定：叶挺、贺龙不去庐山开会。决定把队伍立即开赴南昌。

当天，贺龙和叶挺到九江火车站，命令由第二十军控制的列车运载叶挺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全部于7月25日开赴南昌，贺龙和第二十军部队于7月26日开赴南昌^①。

7月27日，第二十军1万余人全部集中于南昌。贺龙刚刚进入军部驻地中华圣公会，就会见了领导和参加起义的共产党人李立三、谭平山、朱德、恽代英、刘伯承、吴玉章、徐特立、高语罕、方维夏、郭亮和朱蕴山等。他们都是志同道合的战友，谈话十分坦诚。当有人谈到举行南昌暴动，还要设法争取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来参加时，贺龙说：“我们若要拉张发奎就不必干，若要干，就不必拉张发奎。因为我们搞的是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武装暴动。这个事，张发奎是一定不愿意干的，他和汪精卫的关系深

^① 参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2--3页。

得很呢！”这时，贺龙并不知道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都主张拉张发奎参加暴动，然后和他一起回返广东占据出海口，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再重新北伐，而且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听从共产国际这项决策的。

可是张发奎的举动却使他们大失所望。就在贺龙谈了张发奎不会参加南昌暴动这一看法的第三天，即7月29日，张发奎与汪精卫、孙科、朱培德在庐山召开了针对南昌形势的反共会议。他们决定命令贺龙、叶挺限期率部撤回九江，并在第二方面军中“清共”，逮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等一批共产党员。廖乾吾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连夜从庐山奔到南昌，报告了周恩来。

7月28日，贺龙在第二十军军部热烈迎接了前来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周恩来紧紧地握住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来，来，立刻就谈行吗？”贺龙连连点头说：“好极了，我洗耳恭听！”周恩来大笑，指着贺龙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贺龙也笑了。

周逸群是陪着周恩来进屋的，看见他们要谈大事，就准备离开。贺龙却扬手叫着：“逸群，你去哪里？一起听听嘛。我都听得，你听不得？”周恩来说：“好，坐下听罢，你也要谈谈意见。”

接着，周恩来讲了南昌起义的基本计划。在他讲话的过程中，贺龙和周逸群既紧张又兴奋，时而凝神思索，时

而点头称是。周恩来讲完以后，说：“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点点头说：“那好，共产党对你下达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贺龙一怔，站了起来，有些讷讷地说：“这个、这个，我还没有入党……”周恩来说：“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贺龙说：“好，我服从。搞不掉南昌朱培德这一堆堆部队，砍我脑壳。”周恩来说：“南昌守军有1万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很有战斗力。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拟订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的军部，你看可以吗？”贺龙说：“很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这句话一说，连刚刚赶来的叶挺也大笑起来。叶挺性格内向，平日不苟言笑，周恩来懂得叶挺是由于敬佩贺龙革命坚定、义无反顾、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为人豪爽直率，才会这样大笑的。决定指挥作战的两位总指挥合作愉快，胜利就到手了一大半。

本来，周恩来7月27日到达南昌之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即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前委已经决定于7月30日起义。但是，在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从九江以中央代表名义给前委连续发来两封密电，坚持要等他来南

昌以后再决定是否起义。30日，张国焘来到南昌，在前委会上，张国焘传达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精神：一是我们的军事若无十分把握，便可将我们的同志从军队中撤出，去组织工农群众；二是起义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并且要一致行动。这个错误的意见遭到了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的反对和驳斥。周恩来十分激动地说：“你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武汉去吧！”他气得还拍了桌子。20多年之后，周恩来回忆此事时曾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恽代英更愤怒地说：“没有必要等你来讨论，因为事情已经决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一些错误决策已经害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你们的领导已经完全破产。现在，南昌暴动一切都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打倒你！”谭平山听说后也十分气愤，会后，他找到周恩来，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严厉地制止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在这种气氛下，张国焘只得表示服从多数意见，同意起义。但是，起义时间却不得不推迟了。

7月31日，贺龙列席了前委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的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4时起义，并以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的名义发出起义命令。但是，因第二十军一个副营长叛变，前委又迅速改变起义时间，提前在2时开始起义。

当日下午，贺龙召开第二十军营以上军官会议，在传达了前委决定以后说：“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我们大家在一块都很久了，我们今天要起义，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我们今后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接着，贺龙宣布了作战命令。

入夜，贺龙以总指挥的名义下令封锁道路。负责断绝交通的警戒部队进入战斗状态。他们颈上系着红布带，左臂上扎着白毛巾，马灯和电筒上贴着红十字。口令是：“山河统一”。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北伐军两万余人^①，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第一枪，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这一声枪响，震动苍莽大地，点起了烧毁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熊熊烈火。

贺龙和刘伯承在第二十军设置的总指挥部里指挥着作战。第二十军第一师的两个团围攻旧藩台衙门里的敌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守敌是警备团，它是朱培德从云南起家的精锐部队，事先获悉一个由起义军叛变的副营长的密告，作

^① 关于起义军人数，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中都写为两万余人。但有些书刊记载为3万余人。

了应战准备。战斗打响，敌人集中火力封锁鼓楼，切断了起义军攻击部队的必经之路。贺龙的指挥部和敌人隔街相望，距离不到 200 米。贺龙和刘伯承站在石阶上，直接观察，直接指挥，流弹不时在他们头上呼啸飞过，他们从容若定。

第二十军第一师是贺龙部的主力，师长贺锦斋、第一团团团长刘达五都是久经沙场的骁将。他们亲自带着队伍，利用民房，攀登上鼓楼楼顶，占领了制高点，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掩护进攻；又组织力量穿街入巷，翻墙越脊，向敌军背后包抄，迅速将敌人压进其总部大院，迫使他们全部缴械投降。在清理俘虏时，抓住了叛变的副营长，贺龙下令当场就地枪决。

第二十军教导团和第二师、第十一军第十师一部迅速包围了小营盘和大营盘的敌军两个团。大营盘守军第八十团慌慌张张抵抗一阵之后企图突围逃跑，被起义军堵住，只好放下武器。起义军冲入小营盘敌军营房宿舍，大部分敌人喊着：“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就缴了枪，敌第七十九团就这样很快被解决了。

在城北牛行火车站和敌军住在一起的第二十军第三团三营营长王炳南听到枪声后，令在敌人宿舍外的部队迅速展开进攻。敌人在睡得迷迷糊糊的情况下就被缴了枪。起义军立即上岗站哨，占领有利地形，向赣江上游布置了警戒。

叶挺、朱德所率起义军也迅速按计划消灭了敌人。起

义军只用了4个小时，便将敌军3000余人歼灭。起义军总指挥部的5层大楼上，鲜艳的红旗迎着朝霞飘扬。

8月1日上午9时，召开了有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党部委员、南昌市党部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举宋庆龄、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张国焘、林伯渠、吴玉章、叶挺、何香凝、邓演达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邓演达、贺龙等7人为主席团委员。在一些人的坚持下，把在庐山宣布“清共”的张发奎也选为委员。委员中有些人当时并不在南昌，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因为他们是坚决主张与共产党合作、有很高威望的国民党左派，所以也被选入委员会。事后，宋庆龄很快就发表了支持南昌起义的声明。

当天晚上7时，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参谋团会议。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和随第二十军行动的苏联军事顾问纪功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具体计划和政治纲领。贺龙在会上发表意见说：“我不主张到广东，我觉得湖南边境农民运动做得好，有群众基础，到那里不致在盛夏时节千里行军，而且兵员也容易补充。”但是，因为南下广东是在共产国际代表指示下，中共中央在南昌起义以前就决定了的方针，贺龙的意见没有被接受。

8月2日，聂荣臻和周士第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部队赶到南昌，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当天，革

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廖乾吾为党代表，周逸群为第三师师长。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聂荣臻为党代表，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任命吴玉章为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全部起义军共有3个军16个团又4个营2万余人。其中，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兵力接近整个起义军的一半。

8月3日，起义军发布了《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指出：“这次南昌举义，实在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是真正拥护总理的主义和政策的行动。因为我们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北伐变成了蒋介石个人的胜利。今年3月间的党权运动，又被唐生智利用，第二次北伐，也变成冯玉祥唐生智的胜利。南京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政府，是蒋介石个人的工具……所谓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原来还有三分人气，大家所公认的领袖汪精卫，初回国时，志气甚豪，劈头告诉我们道：‘中国不解决土地问题国民革命绝无成功希望’，他又起草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肥田50亩瘠田百亩以上一律没收’，但是他听见唐生智、何键那些野蛮的武人哼了一声，便吓得魂不附体，把他所起草的决议案，藏在荷包里，不敢发表。许克祥以一个团长，在长沙等处，杀了一万数千工农群众及各级党部服务同志，汪精卫所领导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竟以记过了之，不久，许克祥却又升了师长。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奖励军阀做反革命、反工农、叛党叛国的勾当吗？这样的

党，这样的政府，这样的领袖，要他何用！”“我们下级官长尤其是士兵同志十有八九都是贫苦的农民出身。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即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这个告全体官兵书，是第一个义正词严、大义凛然地声讨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反革命派的檄文。

南昌起义，举世震动。汪精卫发布了缉拿贺龙、叶挺的通令，又命令朱培德、张发奎调集军队进攻南昌起义军。敌人十万火急地动手了。8月4日，张发奎电令各部“进剿”叶挺、贺龙部。5日，钱大钧率部自南雄开到赣州布防，企图堵截并消灭起义军。

前委决定退出南昌，由江西进入广东，与东江地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夺取广东。8月3日，朱德率第九军（只有一个营），蔡廷锴率第十一军第十师首先开拔。其他部队相继出发。8月5日，贺龙率总指挥部离开南昌。至6日，起义军全部撤离南昌，先头部队抵达抚州。

8月4日，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在江西进贤地区叛离了起义军，投向蒋介石方面，使起义军损失了1/4兵力，并且对军心的稳定产生了不良影响。本来，在起义前，蔡廷锴及所部一些军官对革命不坚定的态度已有所暴露，“贺龙等主张一并扣留制裁，终未实行，以致演成叛变的事来，为后来失败的一种原因。”^①

8月18日，第十一军到达广昌。8月19日，第二十军

^① 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见《刘伯承军事文选》第5页。

亦到达广昌。由于长途行军，天气炎热，道路难走，给养困难，部队非战斗减员很多。从南昌带出来的辎重、重武器，甚至大批枪支弹药也无法继续携带，遗弃了不少。敌人追堵大军日益逼近，敌方对起义军的恶毒攻击中伤也甚嚣尘上。为此，革命委员会在广昌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作进一步动员。贺龙在会议上讲话，痛斥了反动派的污蔑，说明南昌起义，南下广东，完全是为了革命。

8月22日，贺龙率第二十军为左纵队由广昌出发，计划与右纵队第十一军在壬田会合后占领瑞金。此时，钱大钧指挥的两个师一部分已到达壬田准备阻击起义军。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黄绍竑率领另两个师也从赣州兼程赶来。

壬田是起义军进入广东的必经之地。8月26日下午，贺龙以第二十军全部5600多人，乘钱大钧部立足未稳，率先猛攻其新编第二十师，激战至次日晨，敌向会昌退却。朱德率第二十军教导团一部追击敌人至瑞金以南50公里的谢坊，使敌人遭到很大损失，起义军占领了瑞金。

8月28日，在瑞金的一所学校里，贺龙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

^① 关于贺龙入党时间，贺龙自传及1939年填写的党员登记表写的是攻克瑞金后入党。占领瑞金的时间是8月27日，而8月30日，第二十军一部即赴会昌，31日，贺龙率主力离开瑞金赴会昌。所以，入党时间当在8月28日至29日。另外，《周恩来年谱》写为9月。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写的是“贺龙于攻克会昌后在瑞金加入本党”，时间应是9月1日或2日。我们采用了贺龙自传及党员登记表填写的时间。

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上讲了话。他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也相继讲了话。他们回顾了大革命以来，贺龙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支持工农运动的一贯表现，赞扬了贺龙在革命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率军参加南昌起义的革命精神，也叙述了党对贺龙的考察经过。贺龙入党后，编入了中央特别小组，同组中有周恩来、张国焘、廖乾吾、刘伯承、周逸群等。

8月30日，起义军由叶挺率领第十一军两个师担任主攻，朱德率领第二十军第三师及教导团、第六团助攻，贺龙率第二十军主力为总预备队，进攻钱大钧部扼守的会昌城。钱部坚守，企图等待其他部队赶到以后内外夹击歼灭起义军。晨6时，朱德率部向会昌攻击，伤亡很大，第二十军第三师参谋长袁仲贤、第六团第一营营长陈赓、教导团团长侯镜如负伤，但攻势并未减弱。7时半，叶挺率两个师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4时，攻占会昌，俘敌约1000人，毙伤敌甚多，残敌3000余人狼狈逃窜。黄绍竑所部第四师不知会昌失守，星夜赶来，也被第十一军击溃。

起义军两次恶战，击溃了阻拦的敌人，由江西进入福建。9月5日到达长汀，接近了广东。前委对进入广东的作战计划又进行了讨论。贺龙同意以一部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以主力取潮州、汕头，再经揭阳，出兴宁、五

华取惠州的意见。

9月3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第八路军总指挥兼广东省主席李济深为阻止起义军进入广东，令黄绍竑、陈济棠、钱大钧和何辑五等率部“合剿”起义军。8日，李济深又令陈济棠任东路军总指挥，率第十一师及薛岳部第三十三师两个团开赴河源，准备在潮梅地区围剿起义军，并令飞鹰军舰由水路进攻与其配合；任命黄旭初为北路军总指挥，率第七军及范石生、钱大钧部由赣南追击起义军。敌人以比起义军多数倍的兵力压了过来。

9月19日，起义军占领粤东三河坝地区。此时，起义军仍按在长汀时前委决定的：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率领夺取潮汕，朱德率领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一部在三河坝掩护。主力经过激战占领了潮汕，迎击从河源方向赶来的敌军。由于起义军征战千里，实力大减，又未能集中兵力，对敌情了解也不准确，行至汤坑，遭3倍于己的敌军猛烈阻击。贺龙、叶挺亲自组织部队轮番猛攻，打了两天两夜，相持不下，起义军伤亡了2000多人。

这时，潮州已被黄绍竑部袭占，起义军主力与在三河坝的部队也失去了联系，处于被敌夹击的境地，被迫向海陆丰撤退。敌军尾追不舍。前委认为已不宜按原定行军路线转移，乃于10月3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步行动计划。

对贺龙来说，不论起义成功还是失败，他都是铁了心跟着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干到底的。他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起义失败的可能。他曾和徐特立说：“张发奎无用，他怕

失败。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在起义军从汤坑撤退时他也曾说：“这10年是我垮了又来，再垮再干，越干越大，为什么？就因为我干的是革命，不怕失败。干革命，人民就拥护。我们可能被杀头，人民却永远杀不绝。现在情况很严重，我只有两句话：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第二，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此刻，在这万分紧急危难的关头，贺龙再次表示，他不甘心，要干到底，要卷土重来。前委紧急会议最后决定：部队在五华一带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继续开展武装斗争。主要领导人贺龙、叶挺、刘伯承、林伯渠、吴玉章等离开部队经香港转赴上海。但是，这时第二十军的第一、第二两个师已按原计划开走，总指挥部、革命委员会和少数部队又遭到了敌军的袭击，战斗失败，一部分队伍转到了海陆丰，另一部分潜回了湖南等地，周恩来、贺龙等分别经香港去了上海。在三河坝的起义军与强敌作战，也遭到很大损失，余部1000余人在朱德等率领下，转至粤湘边境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成为后来井冈山工农红军的一支骨干力量。

虽然占领广东准备再次北伐的计划失败了，起义军也损失惨重，但是，南昌起义的意义却是伟大的。从此，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军队，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和许多官兵后来成为几个大的苏维埃区域和工农红军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结出了丰硕之果。

周恩来与人民信访

刘 春 秀

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十分关心、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把它当成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方法与桥梁。他一丝不苟地阅处人民来信，满腔热情地接待来访者，为办公部门和秘书人员努力做好信访工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早在建国初期的1950年1月，他在政务院党组全体会议上作报告，当谈到党组作为领导机构，要勇于反映群众的意见时，指出：“对于下面的意见要善于分析，辨别是非，好的意见要发扬，坏的要批评，严重的给以打击”。1957年11月19日，周恩来谈到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时，进一步指出：“群众控告国家机关不良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应认真处理，需要转交时，一般要交给被控告者的上级领导机关或者监察部门处理，并应及时查问结果。对于假借人民来信、来访名义进行无理取闹的坏分子、诈骗犯，应根据情节轻重，分别进行批评教育或联系有关部门作适当的处理。”

周恩来一生中，函复人民来信多达七八百件。从内容上看，这些书信的内容或言志述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探

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或平反冤假错案，关心某个人的成长、起居，乃至迁葬问题，虽然所谈问题不同，内容各异，但无不体现出他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负责和关怀。

秉公办信 铁面无私

秉公办信，铁面无私，是周恩来办理人民来信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周恩来立党为公，毫无私心，有口皆碑。1946年5月，身负斡旋国共和谈重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后，亦率中共代表团抵临南京。消息很快传到了他的故乡江苏省淮安。周恩来六伯父家的四哥嫂周恩夔、陆淑珍夫妇得知这一讯息后，异常高兴，想借探访之机，通过周恩来谋个职业，养家糊口。

当时国共和谈濒临崩溃，局势瞬息万变。百忙中的周恩来，无暇接待四哥嫂，于是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书信，规劝兄嫂体察形势，宜即返回，作生产之计。并赠款5万元（旧币）作兄嫂归途费用。为了打消兄嫂依恋旧家族中那种封建阔绰生活的念头，信一开头即点明：“旧社会日趋没落，吾家亦同此命运，理有固然，宁庸回恋。”接着委婉地指出：“兄嫂此来，弟处他人檐下，实无可助，倘在苏北，或可引兄嫂入生产之途。”但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以和谈为幌子，严密封锁解放区，伺机策动内战，去苏北是不可能的。于

是周恩来笔锋一转，挥毫写出几个铿锵有力的大字：“惟人生赖奋斗而存。”这言简意赅的话语，不仅激发了四哥嫂在水深火热的蒋管区生活下去的勇气，而且至今仍是人们正直作人、自立自强的真谛。

全国解放后，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职务高了，权力大了，但在对待有关亲属来信的问题上，仍然一如既往，严格要求。

1956年，周恩来的婶母病重。淮安县人委把她送到县人民医院治疗。县人民医院据实将其婶母的病况写信告诉了周恩来。收到来信后，他立即复信表示感谢，并指出：“我婶母的病我们知道是无法治疗”，“如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贰百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

不久，周恩来的婶母去世。收到消息时，恰逢周恩来因公外出。尽管邓颖超已致信淮安县人委：前寄费用，如有不足，请告之，当再寄。淮安县人委考虑到超支不多，只有25元，就没再告。可是，周恩来对此事很认真，他先让办公室写信给淮安县人委，要求将其婶母去世后的费用单据寄去，尔后，又亲笔致信淮安县人委负责同志，感谢几年来尤其是其婶母患病、住院期间对她的照顾与关怀，并寄去为安葬其婶母善后费用所尾欠垫款25元。

周恩来在处理亲属求职、看病、善后等问题的书信，为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树立了榜样，堪称楷模。

心系人民 严禁拖沓

心系人民，严禁拖沓，是周恩来处理人民来信的又一特点。与周恩来共过事的同志，都晓得他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尤其忌讳拖沓、推诿、不负责任、草率从事。在他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中，也时时体现着这种思想和作风。

满腔热情慰林彬 1944年，担任陕西省米脂县印斗区区长的林彬同志，通过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共陕西米脂县委书记的冯文彬同志，给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带信，要他帮助查寻4年前即跟随周恩来外出工作的妹妹杨莉萍的下落。

当时，杨莉萍是中共南方局派往昆明的地下电台报务员。懂得秘密工作常识的人都知道，秘密工作人员纪律十分严格，是不能随便与他人通信的，稍有不慎，就会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由于林彬不晓得其妹的工作性质，几年音讯全无，深为其妹担忧。

周恩来接到林彬来信后，深深理解她思念妹妹的焦灼心情，尽管当时工作非常繁忙，他还是立即写了复信。信中说：“林彬同志：冯文彬同志带来你的信收到了。杨莉萍同志既是你的妹妹，当然要悬念她，而且早就应该来信问我的。”接着周恩来详细谈了自1940年杨莉萍随他外出后9年间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最后委婉地告诉林彬，杨莉萍

“现在该处有职业，情形亦好，惟因属于大后方工作，我不能将通讯地址告诉你。”

接到周恩来这封感情炽热、语气诚恳的信后，林彬激动异常，视为珍宝，不论在艰苦卓绝的转战陕北之时，还是在十年动乱中，一直珍藏在身，至今仍镶嵌在她家客厅的镜框中。

反对官僚主义 “文革”期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一个知识青年给国务院来信，批评兵团领导在接待一个外宾时，有铺张浪费现象，同时反映在兵团听不到中央的广播。并讲了他自己负了伤，现在在北京的家中养病，但因经济困难，治病亦有困难等问题。

国务院有关部门将信转送到某部。该部有关方面办理得很草率，看了信就说，我们已经交待过兵团不要浪费，他们不听，就把信退国务院了。

一来一去，这封信空转了19天，却未丝毫解决问题。周恩来知道后很生气，说：“官僚主义害死人”。他指示该部的同志去找那个青年谈话，详细了解情况后，再报告他。关于治病问题，周恩来要该部和北京市委联系，要对那个青年给予照顾。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此事得到了妥善解决。

对官僚主义和“不教而诛”的粗暴作风，周恩来向来深恶痛绝。1973年7月24日，他对公安部关于伊里亚斯来京上访的调查报告作了批示：“我们各级机关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习气甚深。对上访者确有困难事情，应予负责解决，一杆子到底。必须追究基层落实情况，务使受害者或有问

题不得解决者来信证明得到解决为止。”

处理问题有始有终 1960年3月29日，周恩来接到有关部门转送的安徽省一位政协委员呈报周恩来总理的来信。信中称“安徽省和县铜城闸与无为县曾经发生饿死人的事件。”信中还反映，“该地区田地荒芜”，“农民纷纷逃亡在外”，“干部作风恶劣，人民不敢反映”，万望“派员密查”。

看着这封人民来信，周恩来久久不能平静。对于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广大劳动人民的困苦和承受力，作为一国总理是了如指掌的。对于连年的盲目冒进和由此而滋生的浮夸等不正之风也有所闻。就在前几天，毛泽东在批阅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时，看到文件反映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期间，农民缺粮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曾写了这样的批示：“此件请各同志看看。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要脱离群众。”但是如此严重的农民背井离乡逃亡和如此恶劣的干部作风，却是首次所闻。想到这里，周恩来提笔致信当时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请他立即派人查明真相，然后视情解决。信中说：“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明后复我一信。”

接到周恩来信后，曾希圣立即安排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核实，并向周恩来汇报了调查结果。

经过详查，确实有些问题，但并不象来信反映得那么严重。但是从周恩来对一个不具名的政协委员来信的重视程度，不难看出，周恩来确实把人民疾苦放在了心上。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对于各地发生的水旱灾害，向来强调“重点放在生产自救上”，应“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重建家园”。对于来信中反映的社队干部中存在的专横作风，在他主持制定并于1960年11月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给予了郑重、坚决的纠正。

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

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强烈震撼了已在空气动力学和火箭理论方面颇有造诣并对美国第一批导弹研制工作起过关键作用的钱学森博士，他萌发了急迫回国的愿望。

但当他正式递交回国的郑重声明后，立即在美国五角大楼引起骚动。他们叫嚷“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因为在他们看来，“钱学森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到哪里，他都值五个师”。因此，他们想方设法束缚、限制甚至恐吓钱学森。他的权力被剥夺，人身遭幽禁。但这些都未能禁锢住钱学森赤诚的爱国之心。他作好了随时回国的准备：将要带回的珍贵资料储存在手提箱内，日

夜携带在身旁；住房一年搬一次，从不签一年以上的合同。

钱学森为了让祖国人民了解他如饥似渴盼望回国的愿望，于1955年6月在一封家书中夹带了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亲笔信，请求党和人民政府帮他早日归国。

周恩来非常重视钱学森的来信，祖国需要象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四化大业需要钱博士早日归来。于是周恩来立即通过外交信使将钱学森的来信转送给正在日内瓦参加中美会谈的王炳南大使，并嘱王大使通知美国：中国政府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的同时，要求美方尽快取消对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中国侨民的扣留。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1955年8月4日，被西方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终于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离境的通知。事后，周恩来不止一次地说：中美会谈^①多年，尽管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

从这个事例中，不难看出周恩来处处事事急人民所急，思人民所需的崇高品德和精明干练的工作作风。

^① 自1955年8月1日起，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后又改在华沙，断断续续延续15个年头，会谈134次。但因台湾问题，会谈一直毫无结果。

平等相待 一视同仁

平等相待，一视同仁，是周恩来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又一特点。平易近人，待人以诚，是周恩来的一大美德，这种作风时时反映在他处理人民来信中。

暖风热同胞 1937年芦沟桥事变的炮声，激发了众多热血中华儿女奋起抗日，也引起旅居国外众多侨胞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和关注。

当时，在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工作的侨民杜英先生，常和他的同事中的30多位华籍员工谈论抗日救亡问题。但由于他们远离故土，对国内情况了解甚少，加之一些汉奸和日本间谍四处散播汉奸亡国论调，致使他们对抗战前途问题很迷惘。

他们急切地想得到国内消息。一天，杜英从报上看到周恩来主持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报道。在同工友们商量后，便以“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华籍洋务工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向周恩来请教如何看待抗战前途问题。随信还寄上筹捐的泰币4000铢。

信发出后，杜英等工友想，周恩来工作那么忙，彼此又不相识，不会复信的。然而出乎他们意料，周恩来不久即亲笔写来一封回信。信写得很长，有8页之多。其内容除了赞扬海外侨胞关心祖国命运，支援祖国人民抗战的爱国热忱外，着重谈了抗日的形势问题。周恩来在详细分析

形势、精辟论述了战争发展趋向后，坚定地指出：“抗日战争必将是以中国人民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

看着周恩来那清秀流畅的笔迹，工友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周恩来的信，象暖风迅即吹遍跑马场内外。为了让更多的侨胞看到周恩来的信，杜英设法将信的主要内容以《周恩来论抗日形势》为题，登在《曼谷时报》上。这一来信在整个曼谷华侨社会引起轰动。周恩来亲切的话语，不仅温暖了旅居泰国侨胞的心，也打消了他们对抗日前途的疑虑和担忧。

细雨润遗孤 1938年，安徽寿县的曹云屏让人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述说自父亲曹渊牺牲后，母子二人贫苦无依、度日艰难、求学无望的情况。

接到曹云屏的信，周恩来心潮起伏，他眼前又闪现出曹渊的身影。曹渊1924年入党，在北伐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师独立团第一营营长。1926年9月5日在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不幸英勇牺牲。烈士已长眠地下，自己有责任培养烈士遗孤，于是他提笔给曹云屏写了复信：

“来函收阅。令尊曹渊同志为谋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解放而英勇地牺牲了。这是非常光荣的。我全党同志对曹渊同志这种英勇牺牲精神，表示无限的敬意。此次接读来函，知云屏弟在家中以家境贫苦无法升学，而求深造之心甚切，足证曹渊同志有其子也。如弟能离开家庭则望来汉口，以

便转往陕北延安抗大或陕公受训，并付来洋贰拾元，籍作来汉路费。”

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帮助下，曹云屏于1938年5月辗转来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同来的还有其堂兄曹云青。

周恩来对云屏、云青关怀备至，经常询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1939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同学们对抗战前途有种种议论。云青、云屏也想请周恩来给他们谈谈有关抗战和国共合作的前途问题，于是致信周恩来进行询问。当时，恰逢周恩来7月10日骑马到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马惊坠地受伤，右臂骨折。在伤势严重、即将赴苏治疗前，周恩来忍痛函复云青、云屏：

“你们的信都收到。得悉你们学习紧张，生产努力，欣慰非常。我因坠马伤臂，不便作书，你们提的问题恕我不能答复了。现在我要出外就医，日内就动身。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学习，并祝你们进步。”

得知周恩来是在工作极其繁忙、右臂受伤的情况下写的这封信，云青、云屏兄弟非常感动。为了帮助云青、云屏认清革命形势和抗战前途，周恩来还特地给他们订购了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让他们从中受到启迪。在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云青、云屏逐渐成长起来。

满腔热情 以理服人

满腔热情，以理服人，是周恩来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

访的又一突出特点。如果说上述内容只反映了周恩来在函复人民来信中的优良品德，那么在十年动乱中，他以惊人的气魄和胆略，舌敝唇焦地做红卫兵和人民群众的工作，则处处闪现着其爱民、益民的光彩。

据不完全的文字记载，从1966年7月26日到1967年1月31日，周恩来或躬亲接待红卫兵、或起草有关红卫兵的文件、或处理由红卫兵引发的突然事件达230次之多。当红卫兵受林彪、“四人帮”一伙抛出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蛊惑，不分青红皂白，将斗争锋芒对准培育自己成长的师长时，周恩来在接见北京中等学校红卫兵的会上及时指出：“不能说全中国的大学、中学所有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领导，不是在这方面也落空了吗？”“某些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也不能划等号就是黑帮。所以，不是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打’，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如果这样看问题，那么，毛主席的领导就落空了嘛！即使不是一切，绝大多数的话，也不合适，也不合乎事实嘛。”

当茫然于历史知识的红卫兵企图将天安门前的华表和石狮搬走，以毛泽东铜像和英雄人物像取代时，周恩来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是国家大事，国际观瞻所系，他们可以关心，可以倡议，但不能由他们决定、命名，否则命名无

效，岂不损失信誉。”

当1967年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江青一伙指使的造反派迫害至死后，周恩来非常痛心地说：“这些同志，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待啊！”他在接见群众代表时说：“我很难过，对干部不能这样斗，对老干部不能用敌对的眼光看待，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啊！”

对于那些目无法纪的红卫兵所提出的一条又一条无理要求，周恩来都异常严厉地给以回绝，并且言明利害。

令人敬佩的是，白天周恩来要倾全部身心苦撑局面，维系国家机器的运转，因此接见群众往往安排在深夜。不管他白天工作多么辛苦，工作中遇到多少不快，当他出现在群众面前时，总是那样精神抖擞，神采奕奕。接见谈话时，他总是首先热情地把被接见的同志一个一个叫起来认识一下，问清姓名和工作单位。就在和来访群众熟识的这一刹那，他已将对方深深印在脑海中。群众反映问题时，他总是认真听取，从不打断别人的发言。对发言者讲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数字，他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每次接见，他都谆谆教导人们要事事处处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对一些同志的一些错误想法和做法，他一方面十分中肯地予以指出，另一方面又循循善诱，加以教育开导，绝不姑息苟和。

但是，在那不寻常的岁月中，象浙江大学的学生那样，能够听取周总理的指示，奋力保护价值连城的灵隐寺的瑰宝，及在周总理的严令下，北师大造反派头头放弃捣毁闻名遐迩的“三孔”（孔庙、孔府、孔林）建筑的事例，毕竟

是为数不多的。众多的红卫兵，受极“左”思潮的毒害，目无法纪，胆大妄为。

有一次，已是深夜1点多了，西北某大学名为“叶挺排”的学生战斗队30多人，置警卫战士和工作人员的耐心劝阻于不顾，竟然强行冲进中南海，一直冲到了国务院的小会议室，在场的工作人员非常气愤。这时，周恩来仍然心平气和地接见了他们。他严肃地指出：中南海是毛主席、党中央工作的地方，冲中南海的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他耐心地告诉大家：“文革”开始后，为了不干扰毛主席的工作和休息，中海和南海之间特加了一个大的标语牌，把二者分开，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靠大家自觉地维护中南海的秩序。接着周恩来对大家说，你们战斗队虽以叶挺同志的名字命名，但你们并不了解叶挺。叶挺的部队是一支铁军，百战百胜，所向无敌，除了他的方向对头外，主要是因为它是—支有着铁的纪律的部队。接着周恩来花了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讲述有关叶挺部队的革命故事，就连每一次行军、战斗，乃至每一个时间、地点都讲得非常细致、准确。同学们被周恩来的风采、魅力、口才吸引住了，整个接见厅鸦雀无声，不知不觉已是深夜3点多钟了。最后，周恩来又详细询问每个同学在大学里所学的专业，语重心长地鼓励他们，要做有益于人民的事，而不做任何损害国家革命的事。

尽瘁国事，以民为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周恩来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宗旨。

仗义执言 慰藉人民

仗义执言，慰藉人民，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处理人民来信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周恩来关心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各级干部的一种特殊方法和手段。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党政干部、文化教育界人士受到批斗、殴打和迫害，就连多年来与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归国侨胞，也未能幸免。

“文革”中，许多封控诉“四人帮”、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信呈送到周恩来手中。尽管逐步升级的全国大动乱和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使本来就超负荷工作的周总理更加忙碌了，但他对骤然增多的人民来信仍十分重视，对于需要他当机立断处理的人民来信更是一丝不苟。如他函复章士钊的关于“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的信，他从造反派批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邓初民先生而引发的“不许批斗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信，他就刘建章之妻刘淑清要求释放刘建章一事写给李震、杨杰、吴庆彤的“必须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信，使得许多干部和民主人士得到了保护。他对“应给华罗庚以保护”的批复和复张文裕、朱光亚等18名科学家的关于“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要把理论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的信，为科技事业在“文革”中仍能向前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文革”中，周恩来不仅以处理人民来信的方式保护了一批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民主人士和科技精英，而且对爱国民主人士的亲属和一些社会名流也加以关怀和爱护。从下面几封周恩来处理这方面事宜的书信中，即可看到他为人民申张正义、保护无辜的崇高品德。

照顾覃理鸣家属 1966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以要函上书周恩来总理，要求保护原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覃振的女儿覃瑞。

阅过章士钊先生的信，周恩来立即作了如下批示：

先以电话告吴大胜同志，然后再将此信转去请吴酌办。

一、覃理鸣（即覃振）确在抗日时期与我党有抗战关系，覃当时为反蒋人士；

二、照顾覃之家属，确为主席嘱办，……1945年主席去重庆时与覃联络过；

三、章士钊先生函中证明一段，确属实情；

四、如覃瑞不适宜在南京二十三中教书，可调开，免与群众对立，如本人有严重罪行，当另处。

周恩来

八月廿七日

信发出刚两天，章士钊家中亦遭厄运。考虑到章老的安全，周恩来将章老等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元老送到三〇

一医院保护了起来。

可许康国雄回京治病 章士钊虽住在医院，但并未停止工作。1968年，他为康国雄和马宗霍之事，又上书周恩来。信中提到四川康心如“奄奄一息，辗转床褥，加以其子国雄横遭蒋贼义儿之诬构，禁不起老牛舐犊之忧虑，病上加病……不胜恐惧，致函于钊，求为转达”。

章士钊所提的康国雄，是四川银行家、企业家康心如（字宝恕）之子。康心如解放前曾为四川的工矿、交通、公用等企事业的创立和发展起过一定作用。抗战初期，他还和其他人联合发起组织成立中国西南实业协会，共同募集资金20万元，协助西南各地实业的发展。他还拨款捐助复旦中学和几个私立学校的助学金，捐修南开中学图书馆，并以他和兄长的名字（长兄康心孚，字宝忠）命名为“忠恕图书馆”。由于康心如在四川银行界、企业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蒋介石为拉拢康，确实曾称其子为义子。

中国共产党对康心如一直是很关怀的。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工作期间，对团结、争取康心如作过大量工作。解放初期，党和人民政府即安排他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其后又安排他为四川省和重庆市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市民建和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1957年3月，周恩来出访时，曾取道成都，在市工商联会见了康心如。亲切的会见使康心如极为振奋。他曾提出筹集资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建议，并被任命为重庆市公私合营投资公司经理。可惜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错

划为右派。

其子康国雄，自50年代起即在北京市机械学校任教，1969年随该校迁到陕西汉中。由于受其父的影响和广传其是蒋介石的义子，因此“文革”中受株连，病倒后也不许其回北京的家中治疗，因此委托章士钊先生上书周总理。

不久，周恩来又收到章士钊为马宗霍教授鸣冤的信件。马宗霍早年曾在苏州章太炎主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任特约讲师，并在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院校任教授。1960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研究馆员。1962年调至中华书局工作。“文革”中被批斗，曾多次致函章士钊要求仍回中央文史馆。

接到这两封信后，周恩来虽然国事繁忙，还是派人进行了调查，并于1970年5月叮嘱国务院军代表丁江负责办理。他在给丁江的信中说：

丁江同志：

附上章行老一信。请阅。

马宗霍先生可仍返文史馆，任原职支原薪。康国雄事，可告陕西派人至汉中工业管理学校一查。如确实因群众茫然于历史知识而对康国雄实行专政，虽病不许治，病倒亦不许与家属通音信，未免过分。可许其回京至康妻陈泽琴处，病愈再另作下乡安置。

两事办好后再告章老。

周恩来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康国雄于1971年回京治疗，1977年正式调回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任教。1986年，笔者曾拜访过康国雄，谈到“文革”中周恩来保护他一事，康不无激动地说：可以说周恩来是我们康家两代人的恩人。在周恩来干预下，马宗霍教授也于1970年6月调回中央文史馆。

不要强使于右任前妻高仲林疏散下乡 1970年6月，章士钊又向周恩来上书反映：在西安的原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元配高仲林，年登90旁无近亲，久病卧床，孤苦伶仃。而组织上又以疏散人口为由，迫她移住他处。而她原籍三原亦无近亲，唯一的一个女儿不久前不幸病逝，甚觉走投无路。章士钊向周总理提出：“此一孤零的90老妇人，计其残存余年，屈指可数，不妨在一般迁居令外，稍示宽大。”

接到章士钊的来信，周恩来不禁回想起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战时期和建国前夕的一些交往。也想到1961年于老先生曾通过友人透露他身居台湾思念亲人的心情。当时正逢高仲林80寿辰，周恩来特意安排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专程赴西安为于夫人祝寿，并将祝寿照片连同给于先生的礼物辗转送给他。于老先生得知周恩来对他及家人的关怀后，十分感动，托人带来回函，感谢周恩来。

捧着章士钊的信，周恩来觉得它的份量很重。此事处

理得好与坏，不仅关系到对于右任前妻的安置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尚在台湾及海外的知交故旧的关系问题。想到这里，周恩来在章士钊来函件上做了如下批示：

即送丁江同志。请以电话告西安李瑞山或胡伟，转告西安市革委，不要强使于右任前妻高仲林疏散下乡。高年九十，存日无多，女死亲散，可委托街道委员会轮流派人照管，并由政府给以粮票和救济费，一直到死为之骨化为止。于右任虽为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但早年与章行老、邵力子同办民立报，在辛亥革命后，颇有声誉。……现于已死，如我政府对其前妻，加以照顾，当能影响旧社会许多孤单无靠而又非极端反动分子。这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社会养老政策的体现。

办后，请告章行老放心。

周恩来

1970年6月8日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于右任原配高仲林的问题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

请议定徐悲鸿纪念馆恢复方案 1965年，徐悲鸿纪念馆因修地铁被拆除后，还没来得及选点重建，“文革”即发生了。目无法纪的造反派不仅多次查抄徐悲鸿家，还捣毁了他的墓碑。身处逆境中的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夫人廖静文，目睹丈夫辛劳一生所绘制和收藏的作品、美术文献和1万多件美术图片分散各处，甚为焦虑。为使这些

国宝不致流落，1973年7月6日，廖静文诚恳上书毛泽东，要求恢复徐悲鸿纪念馆。

毛泽东批示“请周总理办理。”周总理仔细审阅了从毛泽东处转来的廖静文的来信，当徐悲鸿3个字跳入他眼帘时，和徐悲鸿相知相交的往事也一幕幕闪现在他眼前。

周恩来与徐悲鸿结识于20年代的法国。他清楚地记得，抗战时期，徐悲鸿不惧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威逼利诱，以耿耿正气勤奋作画，用愚公移山的精神，鼓励人民同心协力，驱除日寇。解放战争时期，徐悲鸿不避艰险，毅然北上任北平艺专校长，为新中国培育出众多美术界精英。建国前夕，徐悲鸿断然拒绝国民党政府胁迫其南迁之令，为新中国的诞生做了不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以极大的创作热忱，抱病深入生活，收集素材，热情讴歌工农兵。只可惜这样一个“真正有一点硬工夫而又有正义感”的艺术大师，不幸英年早逝。

徐悲鸿的死已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难道还能让其遗作散失飘零吗？想到这里，周恩来迅速提笔给国务院办公厅主要负责人吴庆彤、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写了如下的信：

庆彤同志阅转吴德同志：

现将廖静文同志来信和主席批示送请阅办。

廖所提的不是悲鸿故居，而是徐悲鸿纪念馆。

在一九六五年夏，因修地下铁道就将纪念馆拆除。

它所收藏的悲鸿作品、美术文献和一万多件美术

图片多分散各处，而悲鸿墓碑也被坏人捣毁。请你们分别查清，并与王冶秋同志或文化组议定恢复方案。

所查情况，望告。

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六日

另附廖一信，请吴庆彤同志持往洽商（地点在信封面上）。又及。

周恩来复廖静文的信是这样写的：

廖静文同志：

你给毛主席的信，主席于七月十五日已批交我，要我派人查明恢复。先此奉告，并烦国务院办公厅吴庆彤同志与你洽商。

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六日

翘首企盼回音的廖静文，见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派人来看望她，又看到周总理写给他的商洽恢复徐悲鸿纪念馆的书信，感动得热泪盈眶。

经过9年的艰苦努力，1982年，气势宏伟的徐悲鸿纪念馆终于在新街口大街建成。徐悲鸿墓碑也得到重新修复。

从以上周恩来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事例中，我们即可看到周恩来那魂系中华、心系人民的崇高品德，他事事处处急人民所急、思人民所需的优良作风，永远是世人学习的楷模。

人民海关的创建

董志凯

海关是国家进行进出口贸易的大门，是依法执行进出口监督管理的国家行政机关。它对进出口的货物、货币、金银、证券、行李物品、邮递物品、运输工具等实施监督管理，包括征税、查禁走私、临时保管通关货物和统计进出口商品等等；它有权对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进出口货品不予放行、罚款，直至没收或销毁。任何国家都十分重视海关的自主权，以保障本国经济不受外国的骚扰，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外贸事业的正常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要贯彻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和平等互利的通商原则，迅速建立人民的海关，管理好国家的门户是重要的前提条件。

一、旧中国海关的半殖民地特点

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已有“关”的设置，春秋战国时期，典籍中已有“关”的记载。“关”本是在交通险要或边境出入的地方设置的守卫处所。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的海关却成了帝国主义鸦片走私、贪官污吏引狼入室的直接通道。帝国主义的鸦片趸船将鸦片运上陆地，进入广州及内地各省，直至北京。尽管沿途海关、卡口、户关和厘金卡口密如蛛网，鸦片却能一路闯关越卡，如入无人之境。原

因在于清朝朝廷上下腐败，走私商人得以贿赂开道。各道关卡只要按约定数额收足贿款，就放鸦片通行无阻。鸦片走私使清政府白银大量外流，财政陷入危机，被迫展开禁烟斗争。英国精心策划了鸦片战争，中国在战争中失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正是由于海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利害如此重要，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在中国得逞后，首先攫取了中国海关的管理权和关税权。旧中国的半殖民地特点，在海关部门反映得尤为突出。

1、管理权掌握在帝国主义者手中

1853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者夺取了中国海关的管理权。

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海关的管理特权首先来自武装侵略之后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如1858年天津条约载明中国海关必须邀请外国人帮办税务、查私及助航设备；1896年及1898年两次英德借款合同规定，在借款未清偿前，海关制度（包括邀请外人办理）不得变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英换文确定总税务司一职应继续由英国人充任等等。根据这些条约，从1859年起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在整整90年间，中国海关最高管理机关的负责人“总税务司”一职，始终为英国人或美国人担任。他们完全以其本国利益为宗旨，对中国的规章法令，如不经其驻华外交使团的同意，就拒绝执行或置之不理。海关的主要雇员亦由外国人担任，中国雇员必须听命于外国雇员，没有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利。

在洋总税务司的掌管下，全国关税收入用于偿还和保证偿还中国的内外债和赔款，支持濒临崩溃的清政府。辛亥革命后，总税务司和公使团为了阻止关税落入革命派之手，将各关税收入以税务司名义存入外国银行总税务司所开的帐户中，用于保证支付到期的债务和赔款，剩余部分须经总税务司开出拨付关余的支票才能向银行提取，总税务司成了“太上”财政部长。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总税务司直属于财政部关务署，海关所收税款按旧税则所征部分指定用于支付赔款，先存入中央银行，待债款到期前才拨付给汇丰银行，其它税款先由总税务司提取海关开支后才送交中央银行。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实行国库法，海关费用凭其预算由国库拨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国各大海关均改由资深华员任税务司，但总税务司一职仍由美籍人员担任。种种情况表明，总税务司的实际任务是监督中国财政收入，忠实执行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义务”。

2、章程法令有利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总税务司控制下的海关，不是按照中国立法机关制定的海关法和税则，依法执行海关职权，而是凭总税务司自行签发的通令指导全国海关业务。海关税则是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制订的。帝国主义者根据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以极低的关税或免除关税向我国大量输入商品。长期以来，我国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税率远较值百抽五（每100元抽5元关税）为低，使外商获得非法利益，中国财产受

到不应有的损失。

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下，旧中国缉私工作长期不力。特别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商品由各地大规模走私进口，加上所谓“剩余物资”、“救济物资”的倾销，使本来基础脆弱的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摧残。据1948年8月统计，仅广州一地，织布、橡胶、卷烟、火柴、电池、五金被迫停闭的行业工厂即达70—80%。解放前夕，上海机器制造业停闭的工厂占该业原有工厂的80%。

3、利用扩大海关权利损害我国主权

帝国主义者利用其掌握的海关管理大权，将与海关无关的职务揽入海关管理范围之内。如将保证航运的安全和巡卫国境海岸等国防保卫工作也由海关掌握，以便于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损害我国主权。

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反对帝国主义控制海关是重要内容之一。为了收回海关管理权和关税自主权，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关税自主”与“海关革命”的口号，曾被各方面提出来。但是这些斗争长期没有达到目的。因为不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赢得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任何关税自主都是不可能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夺取了政权，中国人民才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收回了关税和海关管理的主权，把百年来被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变为独立自主的人民的海关。中国人民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掌握了中国大门的钥匙。

二、人民海关的创建

新中国建立时，我国共有 27 处独立海关，19 处分关，127 处支关（所、站），共有海关工作人员 11271 名。当时 27 处独立的海关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老解放区的海关。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前，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批解放区，山东、东北等地的一部分海关早就是解放区人民民主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这类海关共有 9 个：满州里、绥芬河、图门、辑安、安东、旅大、营口、瓦房店及烟台。其特点为组织制度较为简陋，缺乏正规的海关工作经验。另一类是在 1949—1950 年全国解放期间先后由各地人民政府或军管会分别接管的。这类海关共计 18 个：天津、青岛、上海、福州、厦门、汕头、广州、九龙、拱北、江门、北海、湛江、琼州、迪化、汉口、昆明、腾冲、龙州等。当时其实行的是帝国主义者制定的海关制度。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日益发展，海关工作需要加以统一管理。1949 年 10 月 25 日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成立，规定了各项组织条例办事细则，为领导全国海关建立新的组织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础。之后，海关总署逐步接管了天津、上海、青岛、烟台等各地海关，并派员到华南等地视察。到 1950 年 5 月，全国各海关已均与总署建立联系，由总署直接领导。华南、东北两个地区的海关在受总署直接领导的同时，暂时保留华南海关处、东北海关管理局，作为总署的代表机关加强领导，并就近解决若干地方性的特殊问题。

海关总署成立以后，迅速颁布了建立人民海关的一系列法规政策。其中有：1949年12月30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海关总署试行组织条例》，1950年1月27日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同年12月14日发布的《关于设立海关原则和调整全国海关机构的指示》。这些文件阐明了新中国海关与旧海关的根本区别。1951年，海关总署遵照政务院决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草案和新的海关税则草案，更具体地阐明了新中国的关税政策，指明了海关工作的方向，并决定对接管的海关进行认真的改造。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对于改造旧的海关制度做了明确指示，他指出：对于旧的海关制度，“应采取分析的态度，应分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它是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机构。对待旧海关不能象企业工厂那样整套接收过来。如旧海关的人事制度和待遇问题就是很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的待遇和人事制度应该反对。但在另一方面，有许多业务行政技术方法是有用的，如海关的统计就是比较可靠的，有些资料和业务经验也是比较有用的，应该接收过来并加以改造。”^①周恩来的指示使我国对海关的改造具有了科学的精神和扬弃的态度。经过这种改造，新中国的海关与旧海关比较，发生了如下变化：

^① 周恩来：《在政务院第53次政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10月6日。

1、海关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政务院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海关的基本原则，“必须一反过去反动统治为服从帝国主义大量倾销外货并廉价吸取原料的经济侵略措施”，使海关成为统一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机关。它的工作任务不是单纯地征收关税，更重要的是通过贯彻新的海关税则，配合国家对外贸易的管制，保护民族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具体来说有三项主要任务：首先是国家的监督机关，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管制的政策法令，对一切公私进出口货物实施监管，以保证对外贸易许可制度的有效实施和进出口外汇全部由国家金融机关所掌握。其次是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所公布的税则征收关税，这不仅巩固了财政平衡，增强了国防建设和稳定金融物价，更具有配合国家对外贸易管制，保护民族工业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三是和走私做斗争。这项工作是为保卫国家政治经济权益的重要任务。

2、适当调整了设关地点

根据政务院规定的设立海关原则，全国的海关设置有所变化。在1950年，海关总署撤消了重庆、金陵、瓦房店、龙州4个独立关和分关支所。全国海关及其分支机构由原有的173处缩减为70处。凡未设有海关、分关、支关的地方不准货物出进国境，违者以走私论。为了照顾国界边境少数民族及居民交换自用生活必需品，允许边境居民小额货物进出。从而改变了海关过去对外门户洞开，对内关卡林立的现象，使海关成为保护人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机构。

3、改革了组织制度和人事制度

首先废除了洋税务司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不合理作法。如，取消了不合理的职级划分、密报考绩制度和以年资为主的升级制度；改造了员工中的“超政治”思想、“大海关主义”、雇佣观点、贪污等旧的思想作风；废除了不合理的特殊高薪待遇制度（洋总税务司的正式薪资超过解放后海关署长薪资的100倍；抗战前海关职工平均薪资为4000斤小米，解放后为500斤）。其次，在人员编制财务支出方面力求精简节约。解放前旧海关支出占其税收的20%，1950年全国海关支出仅占税收数的5%^①。1937年海关总署务司年度支出235万银元（约合人民币470万元），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的支出为人民币39万元，仅为1937年的8.3%，节省了91.7%。第三，改进了海关的业务规章和办事手续，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接管海关、争取改造留用人员过程中，中共中央要求在海关工作的中共党员，特别是负责的党员必须加强业务学习，努力克服闹名誉、闹地位、不安心工作的思想和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对于改造留用人员起了很大作用。海关总署副署长丁贵堂叙述自己思想变化的三个阶段很有代表性：最初是意见不被采纳就发生

^① 见孔原《新中国海关的第一年》（1951年1月1日）一文。在1951年3月23日孔原的《一年来海关工作总结和今年方针任务》一文中，5%一数改为2.5%。在1951年5月1日孔原的《海关制度的历史变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一文中也是5%。

反感，“既不重视我，要我来干嘛？”经过一个时期以后，当意见不被采纳时，也思索一下自己意见可能不对，但态度仍是消极的，以为“不同意就拉倒，错了与我无干”。“现在已能发现自己许多不对，并接受旁人意见，当自己认为还对的时候，也敢于坚持了。”^① 人民海关建立后不久，海关工作人员的思想作风就发生了变化。过去接受商人请客送礼是常事，这时上船不吃人家一顿饭，不抽一支烟，树立了廉洁的工作作风。

4、解除了与海关无关的职务

旧中国海关在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操纵下，承担了海务、江务、巡卫国境等与海关任务不适当的过多职务，形成“大海关主义”。新中国建立以后，海关总署于1950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将全国海务、江务及港务大部分工作移交其它有关部门，并移交了相关工作人员1883人；与公安部拟定了关于巡卫国境及设关地点以外的查私职务移交的交通过则及实施方案，于1951年6月底交接完毕。周恩来总理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海关组织的历史变革”^②。

5、统一了全国海关财务

1950年5月至10月底全国海关进行了仓库物资清理工作，清出总值317.89万元的物资。自1951年前，全国海关统一了财务管理。除东北外，其它各关经费一律由总

① 《中财委关于全国关务会议情况报告》，1950年9月6日。

② 周恩来：《在政务院第53次政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10月6日。

署统筹汇拨；各区关税除东北外均解缴中央，并做到按时上缴国库，定期汇报税收数字。

6、建立与统一了业务制度

旧中国海关在近百年间从未有过海关法，一切按照海关总税务司的旨意行事。海关总署成立以后，海关法规的草拟工作随即上马。为了顺利起草海关法规，1950年4月初，“海关法则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海关总署署长孔原担任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成立后用1个多月的时间，起草了《海关法草案》。1950年6月19日，海关总署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关务会议。全国各海关的84名代表专门讨论了《海关法草案》。1951年3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4月18日公布，5月1日正式实施。

这个法则系统地规定了新海关的组织、任务、职权和统一的工作方法，规定了进行对外贸易和运输业务的公私企业机关、社会团体和私人对于海关规章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海关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暂行海关法》是建设新中国海关制度的法律基础和具体纲领，它体现了独立自主保护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则，是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建设工业化经济体系，加强国防的有力武器。

1951年5月，政务院公布并开始实施海关进出口税则。同年，海关总署还颁布了许多重要的暂行办法。其中包括：《海关处理滞报滞纳及过期未税进口货物暂行办法》，《海关审理税则分类估价申诉案件暂行办法》，《归国华侨携

带行李物品免税优待办法》，《海关查私提奖准备金暂行办法》等。在正式海关法和新税则颁布之前，这些办法的实施已初步解决了一些业务方面的问题。

经过上述接管和改造，新中国海关遵照全国统一的法律和法令，在新的轨道上运行起来。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门的钥匙，海关对于恢复和发展我国经济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对进出口的监督管理

为了贯彻国家对外贸易管制的原则，新中国海关总署自建立之日起即对以下各方面执行实际的监督管理：(1)公私经营的各种进出口货物；(2)经过国境的外国转运货物；(3)国际邮包；(4)出入国境的各项交通运输工具及其服务人员与旅客所带货币、金银、私人物品；(5)装卸存放载运进出口货物的码头、仓库、驳船和场所。

海关的监督管理工作通过贯彻进出口许可制度、征税、缉私三个方面实施。

1、保证进出口许可制度的贯彻实施

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的实际查验，是贯彻对外贸易许可制度、保证货证相符及正确执行关税政策的重要步骤，也是海关实行货运监督、验证征税、查禁走私三大业务的中心环节。

进出口许可证是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监管验放的依据。1950年12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精神，通过了《对外贸易管理暂行

条例》；1950年12月28日，贸易部颁布了《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在《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进出口厂商输入或输出任何货品，均须向所在地对外贸易管理局申请领取进口或出口许可证，经核发后，方得凭此办理其他进出口手续。这个条例将进出口商品划分为四类管理：（1）准许进出口类；（2）统购（销）进出口类（国家专营商品）；（3）禁止进出口类（非经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不准进出口）；（4）特殊进出口类（须经贸易部批准才准进出口）。发证机关在核发进出口许可证时，对进出口商品的品种、数量、价格进行审查。海关依据进出口许可证对进出口货物监管验放。这就改变了旧海关的单纯报单制度，从而贯彻了对外贸易管制与保护贸易的政策，以达到保护发展民族工业的目的。

建国初期，针对经济困难，存在私营外贸企业的情况（1949年天津有私营进出口商400多家，1950年上海有私营进出口商1200多家），国家实行全面进出口许可制度。美国对我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之后，部分进出口商有时未能按照手续事先领证。1950年12月和1951年4月贸易部曾会同海关总署一度制定无证到埠货物临时处理办法，规定准许进出口类货物一律可补证进口。这对于临时抢运物资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也造成了进口贸易上的混乱。1952年贸易部对查验许可证的变通办法作了具体规定，加强了海关的查验工作。

人民海关根据中央管制对外贸易的法令，结合各地具

体情况，从 1950 年起对货运监管工作进行了若干改进。包括废除旧的常年保结制度，建立新的责任制度；加强实际监管，改变以往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下依赖轮船公司向海关保证纳税的办法；逐步撤消对国内货运的监管，除珠江三角洲地区外，各地内河及国内航空货运，先后停止检查；停止对国内邮运物品的检查，并准备撤消一般地区沿海船舶的货运监管，以集中力量于进出国境货运监管工作；废止旧海关不合理的繁复手续和不必要的单据，缩短货物验放时间；将旧海关的 49 种 101 项规费和 33 个费率减为 4 种 18 项 15 个费率等。但是新的监管办法在建制初期不够严密。如许多口岸缺乏为进出口货物专设的码头仓库，铁路承运进出口及过境货物尚未能实行负责运输制，对于货物装卸驳运存储的监管尚有许多漏洞，某些单位不遵守海关监管，单纯求快等，从而产生了一些混乱现象，造成运力浪费，妨碍了物资调配，并影响了海关税收和统计。这些问题随着制度的完善和管理的加强逐步得到了解决。

2、征税

关税是海关按照本国政府制定的税则和税法，对进出国境的货物和物品统一征课的税种。海关征收关税既为国家财政提供了重要的财源，又是保护本国主权、经济建设、民族利益的重要手段。

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化处于起步阶段，在对外经济贸易交流中遭受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封锁，只能选择保护贸易的政策。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海关总署署长孔原主持起

草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1951年1月27日由政务院颁布实施。其中宣布海关税则必须保护国家生产，在与外国商品的竞争中必须保护本国产品。为此，制定税则必须遵循6条原则：（1）国内能大量生产的，或暂时还不能大量生产但将来有发展可能的工业品及半制成品，在进口同样的商品时，海关税率应高于该项商品的成本与我国同样货品的成本之间的差额，以保护本国的产业；（2）对于一切奢侈品和非必需品，要实施高额税率；（3）国内不能生产或产量不足的商品，如：生产设备、器材、工业原料、农业机械、粮食籽种和肥料等，免征关税或实施低税率；（4）一切必需的科技图书，国内不能生产、或国内药品不能代替的药物的输入，免征或减征关税；（5）对于同我国有贸易条约或协定的国家实行一般正常的税率；对于同我国没有条约或协定关系的国家，实行较一般税率为高的税率；（6）对于经由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奖励出口的半成品和加工原料的输出，实施低税率或免税输出的政策。

根据这些原则，在新的统一的关税税则尚未公布之前，海关总署于1950年对旧的税则暂作了部分修正。如为扶助生产，保证原料供应，降低生产成本，在国产棉花不足的情况下，对进口外棉准予免税；其它农业用杀虫剂、实验器械、科学仪器等也专门作出决定予以免税；抽纱工业用的细洋纱、软洋纱等进口原材料的进口税率予以酌减。反之，对国内生产能够保证市场供应的铁钉、风灯则调高了税率。

1951年5月10日，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这是一个独立自主制定的进出口合一的税则，设进口税的最低税率、普通税率和出口税3个栏目，关税一律从价计征，没有最惠国待遇。为制订税则专设的税则委员会根据上述6项原则规定，出口货物只有一种税率。进口货物按需要程度和我国生产情况分为必需品、需用品、非必需品和奢侈品等4类，共20级：必需品的税率为免税、5%、7.5%、10%、12.5%、15%、17.5%、20%8级；需用品的税率为25%、30%、35%、40%4级；非必需品的税率为50%、60%、70%、80%、100%5级；奢侈品的税率为120%、150%、200%3级。这均是最低税率。普通税率中除奢侈品照最低税率酌加50—200%外，其余的均按税级加高1级至2级。另外制定了《税则暂行实施条例》，对税则中两种税率的具体实施作了规定，对不同国家的进口货物给予不同的关税待遇，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原则。这个税则从1951年到1984年共实施了34年，其间对税则中的货品和税率作了24次修改。

由于进口贸易的增加和海关业务水准的提高，我国1950年度海关的税收已大约达到抗日战争以前的平均水准，1951年税收总额约为1950年度的1.95倍，大大超出了抗日战争以前的平均水准。此后受“封锁”、“禁运”的影响，关税一度陡降，经过我国反对“封锁”“禁运”的斗争，多方扩大对外贸易额，关税税额又呈上升趋势。

3、查禁走私

走私是一种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督，私运货物出入国境的违法行为。它破坏社会经济秩序，损害国家利益。历史上鸦片走私所留下的深刻教训长期铭刻在中国人民心头。新中国诞生以后，人民海关严格履行了查禁走私、保护国家税收的职责。

1951年3月，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明确规定了走私行为和重大走私行为的范围，以及海关对于走私案件的处理权和处罚规则。

建国初期海关查禁走私的特点是反对走私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海关总署署长孔原曾提到这一特点的背景：“在所有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口岸及国境孔道，都不断发现经济走私与反动特务间谍的政治破坏活动相互勾结的事实”^①。当时帝国主义者一面策动对我国“禁运”、“封锁”，一面策动走私。他们在香港高价收买钨砂，勾结不法资本家走私出口。其它走私出口的主要物资是黄金、外币、珠宝、钻石、古玩、猪鬃、桐油等；走私进口的主要是手表、钢笔、西药、照相器材、化妆品以及假人民币和反动宣传品等。据海关调查材料，1949年至1952年3年走私进口手表达100多万只。走私活动以华南临近香港、澳门一带最为严重，私货多以广州为主要集散地，天津、武汉、上海等口岸也都有走私情况。为了严格有效地查禁走私，人民海关与边防部队、公安税务机关、工

^① 孔原：《为反对走私而斗争》，载《人民海关》1951年第10期。

会、铁路、邮电等部门密切配合，统一步调，发动群众积极协助破获走私案件，并按照政策予以严厉处罚，保卫了国家的利益。1950年至1952年一共查获走私案件79000余起，私货总值达2800多万元。

人民海关的建立及其对进出口监督管理的有效实施，保证了国家对外贸的管制，为我国独立自主地跻身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础。

“大树特树”的由来

陈 虹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登载了由新华社播发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长篇理论文章。这篇文章当时在全国是很有影响的，文章的署名是杨成武。笔者就此事采访了杨成武。他说：“当时就我的水平而言，是写不出这样的大块理论文章来的。文章中引经据典，点名批判，上纲上线。尽管当时是奉命行事，后来在向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书面检讨中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检查。然而，今天回顾起来，心里仍感到内疚，因为那时自己没有顶住，做了一件蠢事，教训是深刻的。”

这篇文章是怎么搞起来的呢？杨成武叙述了事情的由来。

1967年7月，毛泽东要去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视察，指定让杨成武随他同行，并任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联络员。他们离京后，林彪借口杨成武随毛主席外出，管不了军委的事，于是背着毛主席，指定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军委4人小组，又叫军委办事组，并指定吴法宪任组长。

这个小组给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下达写作任务，要他们写出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批判文章。总参谋部政治部也领受了任务，并组织几个同志撰写了一篇歌颂毛主席，谈领袖权威的文章。

文章草拟后，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李天佑、王新亭先后召开会议，讨论、修改了3次，定稿后打印，由代总长办公室秘书送到上海，交杨成武审阅。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文章标题开始也没有“大树特树”。

杨成武接到稿子翻看后想：布置各单位写文章的事，我不清楚，又不是我要写的，文章中既然谈到领袖权威的问题，这不是个小事，毛主席就在身边，为什么不送给毛主席看一看呢？应该呈毛主席阅示。于是他就在该文标题的空白处，写了几句话：

主席：

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并给指示。

杨成武

文章送给了毛主席，因为并不是什么要急于处理的事，所以杨成武也就没有再去追问。过了三四天，在毛泽东身边做保健工作的护士长吴旭君，急匆匆的将一卷纸送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杨接过一看，是毛主席将文章退回来了，上面并有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这时吴旭君又跟杨悄悄地说了一句，主席随便翻

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遵照毛主席的批示，文章送回北京，交给陈伯达和姚文元，由他们去“酌处”。

9月23日，杨成武陪毛主席从南方回到北京。没过几天，陈伯达给杨打来电话说：“总参写的那篇文章我已看过，也修改过了，我认为应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成武思想上对此毫无准备，也不知道陈伯达这么提出问题是什么意思，于是明确回答说：“不行，文章不是我写的，我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呢？”陈伯达又说：“用领导同志署名发表文章，比用‘无产阶级革命派’有力量得多。”

杨成武对陈伯达说的这个“理由”不敢苟同，于是就推托说：“你是理论权威，又修改过这篇文章，用你的名义发表不是更有力量吗！”双方各不相让。陈伯达只好改口说：“那就再研究研究吧。”事情就这样放下了。其实这时文章的标题已改成《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了，但究竟是怎样改的，为什么这么改，杨成武并不清楚。

没过多久，叶群给杨成武来电话，她先寒暄了一阵，然后说：“‘101’（叶群对林彪的习惯称呼）让我给你打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事报告林彪，而林彪又马上叫叶群打来电话。叶群继续说：“你们总参写的那篇文章，陈伯达同志给‘101’打来电话，说稿子他看了并作了修改，现在送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的意

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叶群并告诉杨成武，这是“101”的意见。叶群说得很肯定，让人感到没有商量的余地。

杨成武觉得很难办。因为陈伯达虽然是中央常委，但毕竟不直接管军队的事，对陈的意见，杨成武可以借故推辞。现在陈伯达将林彪抬出来，不执行是很难办的。于是杨成武换了一个方式，强调自己对政治理论方面不在行，要叶群报告林彪不要用他的名义。

过了一会儿，叶群又来电话，说：“请示了‘101’，‘101’说就这么定了，以你的名义发表。你是代总长，身份合适。”杨成武问叶群：“文章林总看了没有？”叶群对杨成武提出的问题，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101’讲了，党组织有权以一个党员名义发表文章。”叶群又说：“‘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没有问题，‘101’在‘八九’讲话中讲了，《红旗》7月第13期社论提了，8月2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用的标题就是‘大树特树……’，10月1日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也论述过。”

杨成武听叶群这么一讲，感到很难推辞了，但还是表示：“文章不是我写的，我也没有时间仔细研究，而用我的名义发表这总不大合适吧！”叶群又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讲，在延安时，1944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是经毛主席亲自修改定稿的，并不是谭政写的，不是用他的名字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

吗！还有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讲话，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杨成武还想继续说明，但还没有等杨把话说完，叶群就以命令似的口气说：“定了。‘101’讲，就这样定了。”咔嚓一声，把电话挂了。

接完电话，杨成武定了定神，心想：党章规定，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既然中央有权决定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毛主席的接班人，他决定的事，作为党员、军人，自己能不服从吗？只好照办。

然而要发表这样大块的理论文章，杨成武觉得实在没有把握。于是他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同志和总参政治部的负责人一起来开会，研究这个问题。

会议是在三座门开的。起草小组的同志到齐后，杨成武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文章不是我写的，我本来不同意用我的名义发表。但林副主席一定要以我的名义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文章里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不能搞错了。引文一定要搞准确。”

经起草小组的同志又一次仔细推敲，认真核对了引文后，将文章送给了陈伯达、姚文元，由他们最后审定，然后直接送新华社、《人民日报》。11月3日，文章发表了。

文章见报后，过了3天，即11月5日，毛泽东找康生和杨成武在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首次提到这篇文章。毛泽东说：“成武，用你的名字发表的大树特树的文章，我只

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从标题看，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毛泽东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文章毕竟是署了他的名，而他竟连标题有错误都没有觉察出来，心里顿时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惭愧。

康生和杨成武将毛泽东的指示向出席中央小碰头会的人作了传达。会上，杨成武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说不是我写的，但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甚至连标题就有错误也没有发现。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主要负责人，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而我对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了解太少，应该作自我批评。”

散会时，陈伯达连连拱手向杨成武表示歉意，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给你做错了一件事。”

事情到此本以为就结束了，谁知由于毛泽东的指示没有向下传达，因此，“大树特树”的提法在全国报刊和各省市的文件报告中很是流行，呈现着一种有增无减的趋势。到了12月中旬，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准备在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就铁路通车到达韶山和毛泽东塑像落成两件事，搞一个盛大庆典。为此，湖南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文字不长，却多次提到“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看到湖南的报告，引起了他的深思和忧虑。因为这和他视察大江南北时讲的“不要宣传个人，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否则将来要犯大错误，吃大亏”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

随后，12月1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请示报告上，再次提出批评，作了六点批示，其中前两点是：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毛泽东将他的批示写给“林（彪）、周（恩来）、中央及文革诸同志”，提出，“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看得多么重要！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又一次就“大树特树”的文章，当面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毛泽东说：“书越读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吗！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你（指陈伯达）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的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杀人的绝对权威。我

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听到毛泽东当众对他的严肃批评，坐在那动都不动，连头也不敢抬。

过了3天，12月21日下午6时，在怀仁堂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天天读”会上，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第四次对“大树特树”文章的有关指示：

“不怪湖南嘛，湖南是个引子，也不是成武同志的问题。特别不是成武同志的事。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党学习问题。”

“要学习嘛，全党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现在看30本书。不要专吃清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

12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转发毛泽东对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报告的批示，要求各省市“认真学习，坚决照办”。

杨成武看到中央通知和毛泽东的文字批示后，越发感到那篇文章错误的严重性，心情很沉重。因此，他向周恩来总理建议，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避免再提这类错误口号，犯同样的错误，是否可以将住在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的主要负责同志，召集起来开个会，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对文章批评和对湖南报告的批示，以刹住这股风。周恩来听后说：“好！就由你去传达。”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12月22日晚10时半，杨成武赶到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集在京的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以及《解放军报》的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大树特树”问题的几次批示和讲话精神，作了自我批评。

从此以后，中央各大报刊再也没人使用这种提法了，全国高级干部开始学习毛泽东提倡的30本书了。

过了7个年头，到1974年5月23日，杨成武被解除关押，回到北京，住在广安门总参第三招待所。汪东兴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来看他时，说：“大树特树文章已经查清楚了，不是你的事，是林彪、陈伯达搞的阴谋。”

早在杨成武署名文章发表前，在1967年5月至11月的7个月时间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文章标题和内容中就不断出现“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字样，突出宣传毛泽东个人。对此，毛泽东是很不满的。他曾经批评：“谁封我四个‘官’啊！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是不高兴。我只是一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就是到处搞。”毛泽东还亲自删去过“伟大”一词。但是陈伯达马上向群众说：“去掉伟大就显得更伟大。”

当时，陈伯达是主管宣传工作的，毛泽东对“大树特树”的批评，前几次主要是针对他的。最后毛泽东才指出，这个问题“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毛泽东要全党学习马列

主义，读 30 本书。

但是，在毛泽东批评以前，大多数人们根本没想到“大树特树”的提法会有错误。除了当时报刊、广播经常使用外，就提法本身杨成武并没有认识到不对，只是想到这类提法和永远忠于、无限热爱差不多，是表达对毛主席的崇敬感情。那时他的思想认识状态就是这样的。

陈伯达、姚文元当初批发这篇文章，对毛泽东后来的批评是始料不及的。当时的领导人，包括林彪本人也如此。但是在毛泽东批评后，特别是在“杨、余、傅事件”发生后，他们歪曲事实，隐瞒真相，把一切罪过全部转嫁到了杨成武一个人头上。

1968 年 3 月 24 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驻京部队师、团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林彪、陈伯达等人就“杨、余、傅事件”讲话时，将这篇文章列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

陈伯达说：“这篇文章，我根本没看，搁在我的床底下，压了 1 个多月。这样的文章，居然能发表？……这篇文章其实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权威，在军事单位中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领导。”

康生说：“什么大树特树，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嘛！杨成武懂什么，……此人似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所知。”

江青信口开河：“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不用多看，看个标题就是错误的嘛！”她还说杨成武“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想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

林彪讲得玄而又玄：“……还有那个大树特树绝对权威

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二版上，他还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还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这里，林彪又一次重演了他善于摆弄的“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的故技。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在我们党已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但愿今后我们能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也不要重演历史的悲剧了。

“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与发展

任 涛

“一国两制”的涵义

“一国两制”构想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集中全党的智慧，首先提出并反复阐述的一项为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的构想。这个构想经过了党中央政治局的同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问题，恢复行使对香港和澳门主权，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决策。

“一国两制”，概括起来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和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台湾、香港和澳门这三个不同制度的地区设立特别行政区。具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两种制度并存。首先，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即国务院。在这个前提下，存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一国两制不是一国一制，更不是两国两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不存在也不允许有“两个中国”，也不能有变相的“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统一后，两种制度并存。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保留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台湾、香港和澳门建立特别行政区，可以享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的某些权利，台湾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特别行政区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不具备行使国家主权的权力。“一国两制”的核心是国家的统一，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前提下，在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宪法和法律赋予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中央政府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事务。

实行“一国两制”方针，并没有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性质。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国家决定在恢复行使对香港、澳门主权和台湾与大陆统一后，这些地区仍保持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而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在统一的国家范围内，只限于在台、港、澳地区保持资本主义，国家主体还是实行社会主义。这种在统一国上上两种不同制度并存的现实，并不影响国家的社会主义主体特征。在“一国两制”下，不同社会制度地区行使的权力和地位是不平等的，并且有主体与非主体之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是以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行使国家权力。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是根据宪法规定设立的特别行政区，行使地方的权力。它们所实行的制

度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权力，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加以规定。特别行政区的地方政体只是一个特殊的部分，它并不影响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邓小平指出：“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①

第二，“一国两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既不是联邦，也不是邦联。所谓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的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的组成关系，其基本形式有复合制和单一制两种。联邦和邦联属复合制国家形式，是由若干国家（或邦、州、省等）组成的联邦国家制度。单一制是由若干行政区域构成的单一主权国家的制度。而“一国两制”则是容纳了复合制国家某些特点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是在统一的国家主权范围内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并存。按照“一国两制”精神，在港、澳回归祖国、台湾和大陆统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对外主体，在国际上代表中国行使一切对外权。但台、港、澳地区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享有国内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所没有的某些权力，享有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在不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前提下，特别行政区还享有可以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单独同各国、各地区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3页。

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的权力，并可与其签订有关协定，在台湾还允许保留军队。

第三，以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作保证，保持“一国两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台、港、澳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国家对这些地区采取的特殊政策，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作了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根据宪法的这项规定，中国政府已分别同英国政府、葡萄牙政府通过谈判就中国收回香港、澳门主权问题达成协议。依照宪法精神和体现“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已提交1990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同年4月4日正式颁布。这将成为1997年后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保持香港现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法律保障。《基本法》中对实施“一国两制”后香港地区享有的各种权利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这也将成为1997年后香港居民社会、经济、文化等生活的行为准则和法律依据。同样，中国对恢复行使澳门主权后实施的制度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予以规定。也就是说，在“一国两制”下，不同制度的地区发生争执，双方均应通过和平谈判的方法和法律途径来解决。

“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国两制”构想是根据世界的现实、历史的状况和中国的实际提出来的，形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政策是逐渐完备起来的。它从解决台湾问题开始提出，而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首先得到成功的运用。它的形成和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萌芽、酝酿、提出阶段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到了台湾，人为地使两岸分开几十年，这是违背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统一愿望的。早日结束这种分裂局面，无论对于台湾和整个祖国的繁荣富强，对于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都是极为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就开始制定祖国统一的方针。从1950年到1978年上半年，对台湾的方针是以武力解放为主，但也争取和平解决。1955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包括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在内的浙江省沿海全部岛屿，并准备渡海解放台湾。由于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阻碍了我解放台湾的进程。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要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同年4月，毛泽东主席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和“来去自由”的政

策。同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政府表示：“我国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①1958年，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的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②此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还在多种场合提出，希望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凡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以礼相待。可见，对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过去也是抱着很现实的态度。

香港、澳门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英帝国主义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关于香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320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365—366页。

港地区的三个不平等条约（1842年《南京条约》，1960年《北京条约》，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占香港。澳门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1849年，葡萄牙占领澳门半岛，1851年占凼仔岛，1864年占路环岛。1887年，葡萄牙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葡会议条约》和《北京条约》，塞进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来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并声明将在适当时机收回香港、澳门主权，未收回前维持现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是抱着很现实的态度。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4月28日曾表示过：“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①以上中共领导人关于台湾、香港问题的讲话中，已经有了“一国两制”构想的某些萌芽。70年代中期，葡萄牙政府曾提出愿意把澳门归还给中国，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中国并没有急于解决这个问题。

从1950年至1978年上半年的这个阶段，我们统一祖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353、354页。

国的目标是要实现一国一制。1978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实事求是的精神得到了发扬光大，用“一国两制”构想来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提到日程上来了。

1978年下半年，邓小平开始考虑“一国两制”的问题。当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与日方签订中日友好条约。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日本记者提出关于钓鱼岛的领土争端问题。那段时间正是邓小平酝酿“一国两制”构想时期。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就联想到，解决钓鱼岛这类争端问题，能不能也象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一样，用和平的方式，不用战争的方式。从那以后，邓小平反复地思考着这个问题，逐渐形成用“一国两制”或“共同开发”这类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一整套战略设想。在邓小平看来，当今世界上存在着的一些争端，一是因制度不同一分为二的国家，如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二是殖民地问题，如中英之间的香港问题，中葡之间的澳门问题，英阿之间的马岛问题；三是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如中日的钓鱼岛问题，中、越、菲、马之间的南沙群岛问题，英西之间的直布罗陀问题。这类争端，过去被认为是争执双方尖锐对立的矛盾，似乎非用武力不能解决。这些矛盾的存在，不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邓小平指出，中国为保证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他十分关心世界和平问题。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既是为了和平解决台湾和香港、澳门问题，也着眼于维护世界和平，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战争

热点寻找一个有效的途径^①。

在 1978 年中美建交谈判过程中，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主要思想形成了。后来中美于 1979 年 1 月 1 日正式建交，美国解除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离美国在台湾的军事人员，这样，长达近 14 年的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的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当时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召开不久，这次会议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这个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决定和影响中国内政外交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转变。关于台湾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在 12 月 22 日的公报中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在这种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下，用哪种方式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对四个现代化建设有利？显然是用和平方式。用和平方式，有利于保持台湾和香港、澳门的稳定；有利于台湾和香港、澳门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作为我们社会主义主体经济的一种补充；有利于建立包括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这就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主要背景和根本原因。

^① 冷溶：《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来龙去脉》，《瞭望》周刊海外版 1992 年第 29 期。

在1978年下半年中美建交的谈判过程中，邓小平在一系列谈话中，把“一国两制”构想的主要思想表述出来了。如1978年10月8日会见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江藤淳的谈话；11月14日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的谈话；11月27日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的谈话等。邓小平提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不动，美国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但祖国要统一^①。这些谈话虽然没有明确为“一国两制”的提法，但已经把“一国两制”的意思表示得很清楚了。

二、具体化阶段

1979年元旦，在中美建交的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通商、通航、通邮和进行经济、科学、文化、体育交流的“三通”“四流”建议。《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邮通航，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我们相互之间完全应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②《告台湾同胞书》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

^① 冷溶：《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来龙去脉》，《瞭望》周刊海外版1992年第29期。

^② 《人民日报》1979年1月1日。

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1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代表团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①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主要内容是：（1）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2）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3）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4）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5）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6）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7）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8）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9）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

^① 《人民日报》1979年2月1日。

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事^①。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九条方针，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已明确“一国两制”的含义。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在与美籍华人学者杨力宇的谈话中，在“九条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六点办法”：“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②也就是说，我们用“一国两制”来实现统一。一国两制，即台湾不同于大陆的其他省份，是在一个中国下的特别行政区，比内地自治区的自治权还要大，实行不同于大陆的社会制度，你实行你的三民主义，我实行我的社会主义，互不干预。台湾还可以保留部分军队，大陆不派人去台湾参加政权管理。相反，我们欢迎台湾派人来大陆参加中央政府^③。

以上“三通”“四流”建议、“九条方针”、“六点办法”这些具体的方针政策，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具体化，只是还没有使用“一国两制”来表述。

三、实践和理论化阶段

① 《人民日报》1981年9月30日。

②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8页。

③ 《杨尚昆主席论祖国统一》，《人民日报》1990年11月10日。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中国准备用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提出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收回香港后，香港仍将是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留。邓小平后来说，解决香港问题的重大原则就是那次谈话中定下来的。不久，中英两国政府开始谈判解决香港问题。解决香港问题的具体实践，使邓小平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即中国提出的解决台湾、香港问题的“三不变”、“九条方针”、“六点办法”等方针政策，其核心就是在一个统一的中国中，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1983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杨力宇时，把这个意思用简洁明晰的语言表述出来了。他说：“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①在这之后，“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提法即将呼之欲出了。

关于邓小平第一次使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提法的时间，有一种说法，认为1982年1月邓小平在接见一位海外朋友时，就使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法了。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在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第一次使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的。但这两种说法都未得到公开文献的证实。从现在看到的文献看，邓小平首次公开正式使用这个提法是在1984年2月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7页。

22日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的谈话中。他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①同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在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的谈话中，又进一步使用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法。他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10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②“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较之“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提法更具有普遍意义。这一提法的变化，反映了邓小平把这个构想延伸到解决国际争端上的思考。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法更概括地称为“一国两制”^③。

自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定下解决香港问题的重大原则之后，中英两国政府就开始进行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到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年的谈判，主要是解决三个基本方面的问题：一是主权问题；二是解决1997年以后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问题；三是如何

^{①②③}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8、46、72页。

使香港从 1984 年起到 1997 年间的 13 年过渡时期不出现大的波动，保证协议的执行和顺利交接。谈判实际上是以“一国两制”原则应用于解决香港问题，这就是：（一）主权必须收回，祖国必须统一；（二）在 1997 年我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50 年内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三）香港的国防、外交权属于中央。这些“一国两制”构想的主要原则精神，都体现在中英联合声明中。香港、澳门问题与台湾问题是不同的，前者是收回主权问题，后者是内政问题，但“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精神，是同样适用于台湾的。所以，1982 年到 1984 年这两年，是我国政府把“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与香港问题相结合，用“一国两制”这个思想和政策指导解决香港问题的实践的时期，同时也是邓小平通过香港问题而把“一国两制”加以理论化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邓小平继续多次就“一国两制”问题发表谈话。如 1984 年 2 月 22 日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的谈话；4 月 28 日会见美国总统里根的谈话；4 月 18 日和 7 月 31 日两次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谈话；5 月 25 日会见港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谈话；6 月 22 日、23 日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的谈话等。这些谈话，连同邓小平 1978 年下半年以来的谈话，构成了“一国两制”思想的全面阐述。1984 年 10 月 15 日出版的《瞭望》周刊第 42 期发表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构想——邓小平同志谈“一个国家、两种

制度”》的文章，集中报道了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构想的精辟论述。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并非权宜之计。他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一国两制”的定义、性质、背景、条件、依据、前景和意义等，把各方面的具体方针政策上升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理论高度来加以认识。该文章的发表标志着邓小平自1978年下半年以来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经过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到1984年下半年，已经系统化和理论化了。这时，有关中国和平统一的方针，就成了有理论、有政策措施和切实可行的构想了。可以说，1984年下半年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形成和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

随着“一国两制”构想自1982年9月开始在香港问题上付诸实施，“一国两制”在我国的法律中也体现出来。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在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中国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向全体代表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并获得了会议通过。这就使“一国两制”成为一种国策而具有法律效力。

198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1985年5月27日生效。1990年4月4日，七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定于1997年7月1日正式施行。澳门问题，在上述期间亦按“一国两制”构想获得解决。1986年6月，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开始进行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1987年4月13日，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1988年1月15日生效。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行使对澳门的主权。1993年3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定于1999年12月20日起实施。

台湾问题，自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方针以来，台湾当局受到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动员响应，逐步跟进。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台湾海峡两岸的局势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两岸关系由紧张对峙到逐步缓和，由长期隔绝到相互交往，正在朝着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方向发展。这些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人员往来大量增加，各种交流活动日益频繁。1979年前，两岸隔海对峙，互不往来。1979年后，进入大陆的台胞逐年增多。1987年11月台湾当局被迫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之后，到1988年底，进入大陆的台胞达45万人次，比1987年增长12.4倍。同时，变单向为双向，台湾于1988年11月开始受理大陆同胞赴台奔丧、探病及留学生到台参观访问。两岸科技、文化、学术方面的交流也在不断扩大。到1990年11月止，来大陆的台胞已超过160万人次。到

1992年上半年，两岸的人员往来更加频繁，1至5月前来大陆探亲旅行的台胞人数达60万人次，预计全年可望突破150万人次。尤其令人振奋的是，两岸著名科学家实现了互访。1979年以来，台湾记者到过大陆的已有两千多人次。到1992年9月5日，隔绝40余年的海峡两岸新闻双向交流也终于打开了大门，由18名记者组成的大陆新闻采访团踏上了台湾大地。

二是经贸合作迅速发展。1979年，海峡两岸的转口贸易是0.7亿美元，1988年达25亿美元，1988年底台湾厂商到大陆投资的项目有400多个，资金达6亿美元。到大陆考察投资环境、洽谈业务、实际营业者越来越多。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发表后，台商新的一波“大陆投资热”沛然而至，仅第一季度大陆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528个，协议金额3.2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1.1亿美元。1至4月，海峡两岸经香港的间接贸易已近21亿美元，比1991年同期增长34.56%。资料表明，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台湾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两岸往来还没有实现直接“三通”和公平的双向交流。比如，我们主张直接通商通航通邮，但台湾当局现在还没有做到。两岸间接贸易已进行十余年，但总额达200多亿元的贸易都是经香港中转的。台湾企业投资大陆已数千家，但大量原料和产品需要经第三地转运。近年到大陆探亲旅游的台胞上百万，常常因为转航机位难求而滞留香港。两岸通信、通汇、通讯已难以数计，但因为

需通过香港等第三地区和国家中转而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又如，到1990年11月为止，台湾2000万人中已有160多万人次来过大陆，我们对台湾来的人没有限制，公务人员、国民党的高层人士到大陆来，我们都是欢迎的。但台湾对大陆去台人员搞限制，大陆11亿人却只去了几千人，这就不公平，不对等。事实表明，“三不通”已成为两岸往来的严重障碍，尽快实现直接“三通”势在必行。不仅台湾企业界千呼万唤早日“三通”，就连台湾的一些高层人士也发出了呼声。台湾当局出台的《国家统一纲领》，虽然仍提出了一些不合情理的条件，但也不得不表示同意逐步“开放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推动两岸高层人士互访”，表示今后两岸将在和平、互惠的前提下，经过竭诚交流合作，达到祖国和平统一。

自从香港、澳门问题相继按“一国两制”构想解决之后，台湾问题已进一步摆上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中英、中葡双方已就解决香港、澳门问题达成协议。我们还要按照这个原则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1990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说：“九十年代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进一步充实完善有关对台政策。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综观十几年来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总

的形势是在朝着有利于和平统一的方向迈进。祖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它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一国两制”的重要现实意义

一、“一国两制”构想提出了解决不同制度下的国家统一问题的新途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一国两制”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毛泽东历来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当前的国际形势、中国国情和台、港、澳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新构想。它肯定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个统一的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的国家内部，可以实行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内的不同社会制度的相互并存和平共处，灵活运用并发展了和平共处的思想。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针对当时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而并存的客观现实，首先提出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思想。在1919年12月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以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使自己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把生活、运输和

社会管理工作纳入轨道。”^①列宁这个和平共处的思想是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关系上讲的，这一思想在我国的对外关系中得到坚持并发展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在1953年底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4年我国政府同印度政府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先付诸实践。同年4月，周恩来在亚非万隆会议上再次重申了这些原则，并为会议所接受，在会议公报提出的十项国际关系原则中，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行之有效的方式。邓小平进一步把它扩大应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不同制度的地区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国两制”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它的提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列宁在1916年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②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在大陆已经建立了几十年，得到了巩固并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因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第35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3页。

历史原因而遗留有台湾、香港、澳门问题，这三个地区还保持着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一个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从书本上寻找现成的答案来解决新情况和新问题，而只能从实际出发，寻找解决办法。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一国两制”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好办法。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里，实行“一国两制”政策，让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长期并存，和平共处，这样做，对单一制国家结构模式来说，是一个新的突破，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政治体制建设观念的重大变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是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的一大创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又一突出表现。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的存在。”“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

^①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① 自从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把“一国两制”作为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由此圆满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归还问题，推动了台湾海峡局势的和平发展，“一国两制”的可行性，也得到了实践的检验。

二、“一国两制”构想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与国家之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是中国对人类和平、进步、发展的又一个杰出贡献。

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之后，邓小平在1984年7月指出：“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行得通的。这件事情（指香港问题的解决）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映，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② 事实确实如此，“一国两制”构想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当时联合国秘书

^① 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1362、1363页。

^②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7—58页。

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指出，基于“一国两制”构想而达成的中、英协议，既尊重了中国对香港的主权，同时尊重了香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正是联合国要大力提倡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石桥政嗣认为，中英香港协议是“一国两制”的伟大实验，这不仅对台湾回归中国和南北朝鲜实现统一产生良好影响，而且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发展，会受到世界爱好和平的一切人的高度评价。当事国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夫人和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也认为，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想法很明智，是有远见的、富有想象力的构想。杰弗里·豪并且表示，这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可以“为全世界树立合作的榜样”。不少欧美学者认为，“一国两制”思想“可以为未来的政治哲学开一新纪元”，还“足以开创未来世界的新局面”^①。

三、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极大帮助，它是对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社会主义”战略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运用。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考虑怎样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时指出：“当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极其薄弱的时候，怎样才能加快经济发展呢？那

^① 梁厚甫：《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香港《明报》1984年6月15日。

就是要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①“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②“一国两制”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进一步的、更加充分的利用，即大陆引进和利用台湾、香港、澳门三个地区的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而另一方面这三个地区又需要大陆的大力支持。大陆与这三个地区在经济上存在着一种互助互利、共同发展的关系。按照“一国两制”办法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既有利于保持这三个地区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又有利于加强大陆同这三个地区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台、港、澳的资本主义经济目前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这三个地区发展经济有很多有利条件。但它们也有很多不利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缺少资源和市场，以及人心浮动，资金和人才外流。这些不利条件，在实行“一国两制”后将得到克服。因为祖国大陆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既可以保证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的一切资源，又可以提供一个有10亿人口的广阔市场，并且随着和平统一的实现，三个地区的人心浮动、资金和人才外流问题随之解决，经济发展的前景是无限的。另一方面，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于是在一个底子薄、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里进行的，建设资金不足，技术和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9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6页。

经营管理方法比较落后。台、港、澳地区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保持繁荣和稳定，有利于大陆实行对外开放，大陆可以通过香港等地区进行广泛的对外经济联系，直接间接地引进大量外资、侨资，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设备和科学经营管理方法，并且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从而加速大陆的现代化进程。总之，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在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分别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共同进行和平建设，促进这三个地区和大陆在资源利用、贸易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各方面的合作，这对于振兴中华是极为有利的。一个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的中国，一个由于实现统一而加速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将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更快的速度在经济上接近或者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的行列。

四、“一国两制”把统一战线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于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丰富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

统一战线理论有一个重要的策略原则——求同存异。正确处理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同”和“异”的关系，是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关键。“一国两制”构想坚持了求同存异原则，并且运用得更加灵活，更富有创造性。它认准一个目标——统一祖国；把握一条原则——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同”之下，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生活方式等等的“异”，都允许存在。在这里，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它给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指明了任

务和方向。邓小平说：“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广大骨肉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所面临的一项光荣的神圣任务。”^①他又指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是最大的统一战线。“一国两制”也给海外统战工作指明了做统战对象工作的宗旨，即高举爱国统一的旗帜，求爱国和祖国统一之同，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异；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以及一切热爱中华民族的人们，为改革开放、建设四个现代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一国两制”也使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空前广泛，进一步明确和扩大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邓小平指出：“爱国者范围是很宽广的，包括蒋经国在内，只要台湾回归祖国，他就做了爱国的事。”^②“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③“一国两制”的提出和实施，是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两个范围的联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两个范围的联盟是：（一）大陆范围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在这个联盟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二）大陆范围外以爱国和拥

①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第 166 页。

②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第 158 页。

③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49—50 页。

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联盟。在这个联盟里，求爱国和祖国统一之同，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异。这两个范围的联盟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整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在“一国两制”构想提出之前，我国统一战线主要是大陆范围内的统一战线，它虽然包括了对台、港、澳和华侨的工作，但没有构成一个与大陆范围内的统一战线并列的有机的整体。邓小平曾经深刻地指出，统一战线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统一战线宜宽不宜窄^①。江泽民指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大业，没有一个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②。“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为实行最广泛的团结，建立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我们坚信，按照“一国两制”这个原则，必将最终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①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59页。

② 江泽民：《努力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魏 新 生

70年代末期，在中国思想政治领域内就真理标准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它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在思想意识上最终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藩篱，跨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一、是“两个凡是” 还是实事求是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物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消失，标志着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华大地上又一次出现了1949年金秋十月曾经有过的喜庆场面。然而，一度沉浸于欢乐之中的人们不久便发现还不能笑得太舒畅，因为那场未放一枪一弹就使“四人帮”束手就擒的漂亮行动并没有给“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划上一个句号。相反，“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还在党内居于支配地位，当时存在着是坚持、维护左倾错误还是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回到正确道路上来的两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

在举国欢庆胜利、揭批“四人帮”之际，先是部分较早觉醒的有识之士，尔后是越来越多的各界群众强烈要求

进行拨乱反正。这种要求在政治方面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要求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再次打倒的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二是要求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实际上，这两个要求有着更深刻的含义：前者代表着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的正义呼声，后者反映了要求为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强烈愿望。显然，这些问题不是仅仅揭批“四人帮”就能解决的，它涉及到在当时还颇为敏感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牵扯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党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这是摆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层面前的严重问题。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步调一致的领导人在认识和处理上述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及其他几位领导人允许、鼓励人们揭批“四人帮”，但却不允许人们触及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1976年10月26日，在听取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汇报时，华国锋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1977年1月，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华大地上再次出现了花圈、诗词和标语。它不仅表达了人们对周总理的怀念，也反映着要求拨乱反正的呼声。然而，中央某

些负责人的态度却与此格格不入。当《人民日报》负责人就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问题请示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时，得到的回答是，只准发四五篇纪念文章，不准老同志用个人名义写回忆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此同时，当《红旗》杂志负责人就批判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文请示中央时，得到的回答是只能“不点名”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理由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

同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名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社论明确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有名的“两个凡是”。

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14日，华国锋在会上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其中谈到邓小平同志问题时，他一方面说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

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但另一方面又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在粉碎“四人帮”后决定继续提批邓口号是中央经过反复考虑的。关于天安门事件，他在讲话中首先肯定，“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接着又说：“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华国锋在讲话中，还重申“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并再次要求全党，“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说明他思想的主导方面还是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的。

与这种错误的态度相反，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支持人民群众关于拨乱反正的要求，对为进行这项工作设置障碍的“两个凡是”的方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在1977年3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发言中说，为了中国革命、中国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同时，他提出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的诡计。王震发言时指出，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与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

是替“四人帮”辩护。他们的发言，得到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实际上揭开了中央内部拨乱反正的序幕。

“两个凡是”的实质是打着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文化大革命”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针对这一要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强调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

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封信于5月3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党，实际上成为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5月24日，在同中央两位负责人的谈话中，邓小平直率而系统地批评了“两个凡是”。他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

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在这次全会的闭幕词中，邓小平再次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说：“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在这次讲话中，他还着重强调：“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号召一定要把这些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起来，发扬光大。

尔后，聂荣臻在《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题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文章，提出要坚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指出：“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基本原理当作行动指南，坚决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词句当作脱离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教条。”他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实践论》的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践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际经验的检验。”

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

问题。”他总结了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经验，说明“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系列论述，开始推动着许多重要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并取得了可贵的进展。譬如，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关于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问题，关于又红又专问题，关于军队的正规化训练问题，关于物质奖励问题，关于按劳分配问题，关于为数众多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提出了重要意见，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党内外人士的理解、赞成和支持。

尽管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起步并取得局部性进展，但是“两个凡是”的观点和思想影响依然存在，严重阻碍着拨乱反正工作的顺利进行。

1977年8月，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虽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却认为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报告虽然对“四人帮”的不少谬论和倒行逆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揭露和批判，但却仍然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中的许

多左倾观点；报告仍然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和实践。这说明当时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还深深陷在左倾错误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与此同时，在“文革”中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由于思想路线没有端正，仍严重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历史越来越明确地提醒人们，党和国家要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跨入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就必须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正确而深刻的反思，首要的是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而作为这一切的前提，是人们的思想方法，党的思想路线要发生根本的变化，要摆脱“左”的思维方式，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

历史的发展也为问题的解决创造着条件。邓小平的复出和老干部的陆续解放从组织上增强了党的正确领导的力量，人民群众可以公开听到老一辈革命家的正确声音了；拨乱反正工作的进展及遇到的阻力都在促使越来越多的人的思索和觉醒。在这个思索和觉醒的过程中，理论界又一次走在了前面。

二、是理论问题 更是政治问题

如果说1977年到1978年的中国面临着一场思想政治方面的大讨论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话，那么，《光明日报》则充当了正式引发这场讨论的“导火索”的角色。

1978年5月11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这篇文章进一步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该文是经过半年多的反复酝酿、多次讨论修改才定稿的。谈到文章的由来，还得从中央党校中、高级干部的理论研讨说起。

1977年冬，1000多名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高级干部在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及有关党的历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在当时视为“难题”的问题。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认为，对此应该研究讨论。他明确提出了研究讨论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央党校这所庄严的马克思主义殿堂出现了气氛活跃、思想开放的局面，并创办了一份《理论动态》作为学习、交流的园地。根据学习、讨论的情况，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酝酿着就真理的检验标准等问题撰写文章，进行宣传。

1977年10月，《光明日报》收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两篇来稿。这是此前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光明日报》的约稿。其中一篇是阐述真理标准问题，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理论部的编辑对其进行了修改加工，征得作者同意后，准备在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发表。

1978年4月初，这篇文章的大样被送到了《光明日报》总编辑手中审定。这位新任总编辑刚从中央党校学习

结业，他深切感受到了中央党校的活跃气氛，也知道党校理论研究室正在酝酿准备的文章。面对手中的大样，他敏锐地感到了真理标准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政治界的分量，于是决定，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然后放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

恰在这时，原作者胡福明来北京参加理论讨论会，报社便请他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一起讨论修改问题，并由胡福明执笔写出了修改稿。这个稿子经报社编辑再次加工后，又送中央党校再加修改、润色。就这样，这篇文章先后 10 易其稿，历时 7 个月，始成定稿。

经过胡耀邦的亲自审定，这篇文章于 1978 年 5 月 10 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载，《光明日报》于次日发表，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5 月 1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不少省市报纸也随之予以转载。

这篇文章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并用事实说明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说明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联系到当时思想政治领域内的情况，文章强调指出：“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

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说：“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减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人们发现，《光明日报》的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以下简称《实》文），其基本内容主要是复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有些还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在当时的中国发表，其倾向性和针对性却是再明显不过了。因此，它一发表就立即在党内外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引起了人们和各界的不同反响。

《实》文首先引来的，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的批评和责难。

5月12日，即《人民日报》转载《实》文的当天，报社一负责人即接到一个电话，指责《实》文“犯了方向性

的错误”，说该文有的观点是“片面的”，有“严重的理论错误”。照此宣传，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坏的反应”。

次日，《红旗》杂志负责人打电话给新华社负责人，说新华社转发《实》文是错误的，该文“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

5月17日，中央一位领导人在一个小会上点名批评了《实》文和《人民日报》5月5日发表的《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说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表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要求中宣部“把好关”。

5月18日，当时的中宣部负责人在一个会议上要求大家对《实》文“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

6月15日，中央一位领导人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对《实》文和其它几篇文章再次进行指责，说：“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他认为“宣传上的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当《实》文受到责难、讨论受到压制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则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

5月30日，在同几位负责人的谈话中，邓小平强调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

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并且批评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尔后，在同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谈话中，邓小平说：“《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2日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7月21日，邓小平在同中宣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表示了支持。他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问题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

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

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他说：“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强调，“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写了一篇回忆毛泽东当年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文章送到，编辑们发现，文中除了回忆历史外，还讲了现实，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这显然与《红旗》“不卷入”的态度相悖，而作者又不愿删改。只好报送中央常委裁决。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看后同意《红旗》发表谭文。邓小平、李先念还在批语中对《红旗》提出了批评。邓小平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批道：“我看了这篇

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当中央高层围绕《实》文的发表对真理标准的问题展开争论的时候，作为这场讨论的主体，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并没有坐等观望。他们从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支持中受到鼓舞，顶住种种压力，继续写文章，召开讨论会，将业已开始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实》文及此前《人民日报》的思想评论《标准只有一个》发表以后，多数人表示支持，但也有一些同志对实践是不是“唯一标准”的问题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实践固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在当时是一个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的思想认识问题。针对这种状况，应《人民日报》之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于6月1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专门对上述疑问给予答复。该文认为，主张实践和马克思主义都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一些同志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也当作真理的标准，从认识上讲是混淆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两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是正如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来证明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实践来证明。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作为检验别的真理的标准”。一些同志的另一种混淆，是“把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实践的指针，混同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这是两个不同的

问题”。“从哲学上讲，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于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就是承认理论认识对于实践的反作用，承认这种反作用，决不能否认实践所起的根本的决定作用，不能用这种反作用来代替实践是真理的标准问题”。该文强调，“有人认为，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似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侮辱。其实这不是什么侮辱，而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面对有些同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的种种责难，理论工作者不是避之躲之，而是给予有说服力的回答。其中，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论证了理论和实践的正确关系，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澄清了林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造成的混乱，并针对当时的实际和对实践标准的种种责难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分析和批驳。文章明确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整个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不能违反；但基本原理也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也是向前发展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原理、个别结论、个别口号，则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人之所以要坚持某些旧口号、旧提法，“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针对有些同志发出的若把实

实践摆在第一位、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位置的责难，文章写道：“对于说这种糊涂话的人，除了上面所说的可供他们思考以外，这里，只需再反问他们一句：毛主席说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把毛主席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

这篇长达万余字的文章说理充分，针对性强，有人称之为《实》文的姐妹篇。它是在胡耀邦及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关心、支持下产生并发表的。文章成稿后，《解放军报》社曾送请罗瑞卿阅，罗瑞卿先后细看了3遍，亲自打了5次电话，并亲自查阅有关著作，提了不少修改意见。这位由于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而高位截肢的将军在去联邦德国治病之前，还特地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50大板”。对不久便辞世的这位将军来说，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心和支持，是他的最后一次政治活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在自然科学领域本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当这场讨论开始后，自然科学家们还是感受到了它的分量，旗帜鲜明地投入进来。早在5月中旬，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党组即在方毅主持下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有关文章，并作出决定：支持这场讨论。7月5日，由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中国自然辩证

法研究会出面组织的“理论与实践关系讨论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一些著名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会上发了言。科学家们用自然科学史上的大量事例说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同新的科学实验事实发生冲突时，科学是如何突破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同时又在实验中得到证实的。他们提供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据对于这场思想政治领域的大讨论发挥了特殊的支持作用。

7月17日到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校、大专院校、研究机关、新闻单位的部分理论工作者160多人举行讨论会，探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与会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它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也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与会者在讨论中联系实际，充分肯定了这场讨论的现实意义。这次讨论会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的高潮之一，它使这场讨论在全国范围内更广泛地展开。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发挥着先锋和引导的作用。根据讨论开展的情况及出现的主要思想问题，它们总是给予积极的、富有说服力的分析和回答。9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此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题为《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一切主

观的东西都要受实践的检验》、《天才论和实践论的斗争》等特约评论员文章。此外，这两家报纸还发表了为数不少的署名文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78年下半年，全国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等都积极投身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专文就达650篇之多。此后，随着讨论的继续，文章也还在陆续发表，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

在这场讨论热潮中，有一种现象尤其引人注目，这就是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展，全国大多数的省级党政领导机关、大军区领导机构都相继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了讨论，许多省委及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公开撰文或发表讲话，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高度评价这场讨论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在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省、市、自治区及大军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对一个理论问题的讨论如此关注，主动作出鲜明的表态，并见诸报端，还是不多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的。这说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确实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关心的重大政治问题，表明实践标准的正确观点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共鸣和越来越多的高级干部的有力支持。

由于包括上述因素在内的种种原因，中共中央领导层围绕“两个凡是”及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已开始向正确方

面倾斜。这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和按劳分配问题，认为《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论述这两个问题的两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好的。11月14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在那场事件中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邓小平重新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这说明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群众提出的最迫切的两大要求已基本实现。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作为这场讨论和争论的最后一个回合，从而使其结局最终明朗化，是经过1978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场讨论。

三、是结局 也是开端

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订议题是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商定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李先念在1978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会议前夕，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在讨论上述议题之前，首先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并把它作为会议的中心思想。但是，会议开始后，与会代表提出了范围更广的问题。11月12日，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中央应给予考虑和决定的6个问题后，会议的气氛更加活跃。特别是11

月 27 日一位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后，立即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真理标准问题顿时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这对似乎已近尾声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很大影响：

其一，它将真理标准问题集中地摆到了与会的 200 多名中共高级干部的面前，使此前对这场讨论曾予以关注及还未曾重视的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及中央、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又一次交流和探讨了这一既有理论意义又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其中绝大多数同志对实践标准的观点及其讨论给予坚决支持，对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提出了尖锐批评。这种情况一方面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结局发挥了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也使这场讨论的影响和作用更为深刻和广泛。

其二，在与会人员的要求下，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有关当事人说明了一些情况，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

1978 年 12 月 13 日，华国锋在这次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讲了话。关于“两个凡是”问题，他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在去年 3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

讲清楚。”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到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受其思想影响，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说：“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在谈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华国锋简要说明了5月11日《实》文发表后的有关情况。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其中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这样的评价：“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

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随着思想路线的端正，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提出和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社会主义建设由此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时期。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的事情初看起来显得轰轰烈烈，但最终不过是浪花一闪，逐渐为人们所淡忘；有的事情也许本身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但却余味无穷，不断地给人们以新的认识和启迪。这其中的因素固然众多，但主要的恐怕还在于事物的内在价值不同，前者可能只是历史发展的副产品，而后者却化作了历史发展的血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中，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一个政治转折，一座思想桥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无疑应该属于后者。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为历史所证明。

国际友人在延安

袁武振 梁月兰

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国际上许多有识之士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影响下，在共产国际和国际援华组织及盟国政府的支持、帮助下，纷纷来到红色中国的中心——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那里采访、参观、考察、学习、工作、战斗，不同程度地受到红色中国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的感染、熏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外国记者和作家报道红色中国真相

在延安和陕甘宁根据地活动最频繁、影响最大的国际友人是外国新闻记者和作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打破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将中国共产党号召全民族抗战的一片赤诚宣之于世，告之于民，进行了多方努力，但都收效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这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记下和发表事实的真相^①。1936年春，中共中央密电上海地下党组织，嘱托邀请一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一位医生到陕北苏区访问。

^① 《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来信》，《新闻战线》1980年第1期。

与此同时，急于探索中国苏区奥秘、刻意追求“东方魅力”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专程到达上海向宋庆龄表达了访问陕北的愿望。在宋庆龄的安排和美国《纽约太阳报》、英国《每日先驱报》的全力支助下，斯诺终于成为冒险进入陕北苏区访问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从1936年7月到10月，斯诺在红色中国首都保安和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访问，全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质、社会基础、对日益迫近的中日战争的见解和红军战士的军事政治素质及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并饶有兴趣地重点考察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及其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采访归来后，斯诺写下了有史以来介绍中国革命的第一本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第一次把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真相介绍给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长达10年的新闻封锁，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威望。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还另外有一个中国啊！”^①斯诺也因此而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公开转达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西方信使。

在斯诺的影响和带动下，到陕甘宁根据地访问的外国记者和作家、学者越来越多。1937年初，美国著名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到达延安，访问了许多红军干部战士，并准备为朱德总司令撰写传记。4月底到9月初，斯诺当时

^① [美]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序》，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的夫人海伦·斯诺到达延安，访问了斯诺未及访问的中国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目睹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参加抗日战争的历史性变迁，写下了《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和《延安采访录》等著作。同年6月，美国学者托马斯·彼森（中国名字毕恩来）访问延安，就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及其对中国前途的设想、国共合作等问题，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交谈。彼森认为，中共领袖“考虑的是：民族的事业，最重大的任务是赶走日本侵略者”；“他们全部谈话的中心思想是：为了用中国的全部力量对付日本而全民族团结起来。”^①此外，德国女学者安娜利泽（王安娜）博士、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博士和美国记者维克托·盖、厄尔·列夫、哈里森·福尔曼等人也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访问了延安和陕甘宁根据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访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外国记者主要有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美国记者白修德（英文名西奥多·怀特），以及有美、英、苏等国记者参加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于1939年9月重访陕北。绝大多数外国记者访问后，都能客观真实地向外界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业绩。贝特兰是1937年

^① [美] T·A·彼森：《一九三七年的延安：同中共领导人的几次谈话》，见《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2期。

10月访问延安的，就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将采取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等重大问题采访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对这次谈话非常重视，整理后予以公开发表，并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汉斯·希伯是德国共产党员，他于1938年春访问延安，在与毛泽东谈话后深受启发，决心到抗日前线进行战地采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正义斗争多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1941年11月，希伯在山东根据地反“扫荡”斗争中壮烈牺牲。白修德是美国《时代》杂志驻远东首席记者，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研究生。1944年底，为了解那些“即将掌握中国命运的人”，他到达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彭真等中共领导人，与贾安娜合作完成了《中国的惊雷》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延安“是一个思想工厂”，“是一所巨型的实验室”，“毛泽东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他认为：延安人是一支正在壮大着的力量，“他们能够打败日本人，并治理好这个国家”^①。

1944年夏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影响更大，被誉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在记者团访延以前，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进行了长达5年的军事包围和新闻封锁，“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发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人民

^① [美] 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译本，第254—273页。

自由往来。总之，只许国民党的诋毁、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理稍许透露于世。”^① 这种形势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1944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② 记者团的来访，就“把一座被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射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象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③ 记者团中的外国记者，写下了许多介绍敌后解放区的文章和书籍，如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红色中国的报道》（即《北行漫记》）、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美国记者莫里斯·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等，都如实地介绍了他们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爱泼斯坦以后还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并加入中国国籍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中国建设》杂志总编辑、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爱泼斯坦认为，延安之行对他走上革命道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回忆访延时的情景说，一到延安他就“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从而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会在

^①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4页。

^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2日。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①。

解放战争开始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46年7月抵达延安采访。毛泽东主席会见她时，发表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斯特朗相信这一理论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经过她的报道，“纸老虎”的论断在全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美国记者斯蒂尔于同年9月在延安访问了10天后说：“我要是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将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了。”

二、外国医生在解放区救死扶伤

黎巴嫩血统的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是最早进入陕甘宁根据地的外国医生。1936年夏，他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时就已是一个革命者了。据他自己回忆，在他带到陕北的几箱药品的底层，藏有共产国际关于发展统一战线的绝密文件^②。他和斯诺在苏区进行了4个月的访问后认为：这里是中国领土上最先进的区域，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再也不愿离开这个圣洁的地方了，决心留在苏区参加红军。与此同时，他对根据地的医疗卫生状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写下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提出改进苏区医疗卫生办法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同年10月，乔治·海德姆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并改用中国名字马海德。从此，他用听

^① 《人民日报》1985年4月20日。

^② 刘力群主编：《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页。

诊器和手术刀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同时在根据地兼搞外事工作。仅从1944年到1949年，他就为边区军民看病4万余人次，占延安全城人口的2/3以上，根据地群众亲切地称他为“马大夫”。1937年2月，经吴亮平和张浩介绍，这位外国血统的红军医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加入中国国籍，担任国家卫生部顾问等职。去世前，他留下遗言将骨灰撒入延河里，以实现他“生在异国，魂归延安”的愿望。

抗日战争爆发后，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生、共产党员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率领一支“加美援华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1938年3月底，白求恩和医疗队护士琼·尤恩小姐带着三大卡车药品及医疗器械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会见了他们。白求恩告诉毛泽东，他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抢救重伤员。白求恩说：“如果立刻动手术，这类伤员中的75%，一定可以复原”。毛泽东请白求恩立刻组织八路军的第一支战地医疗队，并就土法藏血、国际形势、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持久战）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等问题，同白求恩交谈了3个小时。此后，尤恩小姐去了晋绥抗日前线，白求恩则和到陕北度假的加拿大青年医生查理·布朗转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工作了两年。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和责任心以及精湛的医疗技术，得到广大抗日军民的高度评价。1939年11月，白求恩在抗日前线以身殉职。朱德总司令通令全军举行哀悼，延

安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悼念文章《纪念白求恩》，号召解放区军民和全体共产党员学习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

1939年2月，由队长爱德、副队长卓克及队员柯棣、巴苏和木克等5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冲破国民党的阻拦，乘坐自己的救护车并携带63箱药品和器械到达延安，支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为了表示援华抗战的决心，他们一致决定在每个人的姓氏后再加一个“华”字。在延安参观访问后，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被派往拐峁八路军医院从事医疗工作，卓克华和木克华到八路军卫生学校从事教学工作。8个月之后，柯棣华和巴苏华去了山西前线。1940年10月，巴苏华返回延安，志愿留在中国，被任命为延安八路军医院五官科主任，并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到1943年3月才返回印度（在此以前，卓克华、木克华和爱德华因服务期满或因病先后从延安或晋东南回国）。留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柯棣华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兼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并于1942年7月经江一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12月，柯棣华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时年仅32岁。毛泽东在挽词中对其作了高度的评价：“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近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

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①

1942年到达延安的苏联医生安德烈·阿洛夫，热情为边区军民治病，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医务工作者，延安《解放日报》曾多次报道他的先进事迹。任桐年率领的英国公谊救护队于1946年到达延安，他们赠送的药品和器械可为边区装备一个急救医院。国民党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公谊救护队还随人民解放军转战陕北。此外，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奥地利医生傅莱、罗生特，朝鲜医生方禹镛，美国军医梅尔文·卡斯伯格、护士玛格丽特·斯坦莉等人也曾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作过。米勒和傅莱还参加了八路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国籍，至今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三、盟国官员考察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埃文斯·卡尔逊上尉，是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参赞、罗斯福总统派驻中国的秘密观察员。1937年夏他奉派来华之时，罗斯福请他将在中国所看到的一切连同他本人的见解，直接写信报告总统^②。同年8月，卡尔逊到达上海，观察了正面战场的淞沪抗战。此后，在埃德加·斯诺的鼓励下，卡尔逊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两次巡游中国北方，在八路军从敌人手里夺回的地区纵横走访了好几个月，足迹遍及陕西、内蒙、山西、河北、山东五省，行程不下三四

^① 《解放日报》1942年12月31日。

^② 〔美〕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译本，第149页。

千公里，全面考察了八路军在华北初创的所有根据地以及八路军抗战、民众动员和国共合作等情况。1938年4月底，卡尔逊以美军观察员身分到达延安，拜访了毛泽东、张闻天、肖劲光等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观看了延安军民的军事训练，访问了一些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拍摄了许多照片。从延安和华北敌后根据地访问归来之后，卡尔逊怀着无限激情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在各种场合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呼吁国民党政府和国际社会给八路军以实际的援助。1940年，他在美国出版了《中国的双星》、《中国陆军》两本书，真实地记录了他在中国各战场的考察情况。他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新中国的试管”^①，在国外引起很大震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采用他从八路军那里学到的民主管理方式，注重以道德培养和教育士兵，训练了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战兵队伍。1942年8月，他率领这支部队成功地攻占了日军海上补给站马济岛，取得了美日开战以后美军的第一次胜利。

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有史以来访问延安地区的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驻延安的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访问。中缅

^① [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新华出版社1987年译本，第138、184页。

印战区美军司令部给观察组的任务是：搜集敌伪军方面的情报，考察共产党的政治情况和军事实力及其战争能力的潜在贡献，提出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加其战斗力价值最有效的办法，并为海空军作战提供气象资料^①。观察组组长是时任战区情报官员的戴维·包瑞德上校，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约翰·谢伟思、雷蒙德·卢登、约翰·戴维斯任观察组政治顾问，他们都是著名的“中国通”。成员中有步兵、信号兵、航空兵、军医等，前后共30余人，分属于美国陆军、空军、海军、战略情报局各系统，多数人有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验。中共中央对美军观察组的来访非常重视，认为这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②毛泽东亲自修改了194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社论，在原稿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特意加上了“战友们”三个字，并在社论中指出：观察组的到来“是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分别多次接见了观察组成员，向他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实行人民战争的生动事实及各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

^① [美]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译本，第31—32页。

^② 1944年8月18日《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573页。

情形，阐述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表达了积极与美军合作抗日的愿望。除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活动外，观察组成员还分批到华北各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亨利·惠特尔赛中尉 1945 年春在太行山根据地考察时，与敌遭遇，壮烈牺牲。观察组成员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以及在敌后遇难又被营救而护送到延安的美军飞行员所提供的情报，陆续写成大量的军事政治报告，上报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仅在头两个月（截至 9 月 27 日）发送和准备发送的报告就达 112 份。谢伟思一人在 1944 年 7 月至 10 月就写了 51 份报告。1945 年 2 月至 4 月又写了 26 份。在这些报告中，观察组确信“共产党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他们自己的”^①，他们认为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是一支年轻的、经过战斗锻炼、受过良好训练、伙食、服装都不错的志愿军队，素质极好，情报水平很高，士气旺盛”^②，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包瑞德上校曾多次建议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立即向中国军队提供援助，并说明这是观察组成员们的“强烈愿望”。谢伟思、戴维斯还建议美国政府全面支持国共两党，推动中国政治潮流向达成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③。观察组的上述活动和见

^① [美]约瑟夫·伊谢瑞克编：《在中国失落的机会》，1974 年纽约版，第 253、182 页。

^② 包瑞德 9 月 30 日的报告，原件存美国国家档案馆。

^③ 《在中国失落的机会》，第 324 页。

解，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的企图，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世界学联代表团于1938年6月29日至7月4日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各界的热情接待。代表团团长柯乐曼是英国人，团员有加拿大人雷克南、英国人傅雷德和美国人雅德（女）。他们都是世界学联的著名领袖，表示回国后要作好三件事：热情地做好宣传，如实地讲解见闻，为八路军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此外，荷兰驻香港总领事范伍登、荷印（荷属南洋群岛）政府外交部东亚事务司中国事务科科长欧福廷博士、国联防疫大队代表南道尔也在抗战初期访问过延安，南道尔还向陕甘宁边区捐献了1万美元医药款。英国妇女领袖、统一援华基金会会长克利浦斯夫人应周恩来的邀请，在解放战争爆发后的1946年10月底访问延安。她在介绍访华观感时认为：“渠如不来延安，终将感觉此行是不满足的。”^①

四、外国专家支援边区建设

班威廉（英文名威廉·班德）是英国物理学家，1930年携夫人克兰尔来华，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班威廉夫妇冒险冲过日军封锁线投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军区主办的无线电技术培训班讲授高等物理、数学和理论电磁学等课程，为八路军培养无线电技术人才。在近两年多的教学中，他们还留心考察、记录了

^① 《解放日报》1946年10月27日。

根据地的重大活动和各方面的建设成就。1943年9月，班威廉夫妇抵达延安，受到热情接待。1944年元旦，毛泽东登门向他们拜年问好。1944年初，班威廉夫妇离开了延安准备取道重庆回国，但受到国民党特务和政客的包围和监视而不得不滞留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返回英国。1948年，他们夫妇在英国出版了《与中共相处两年》（中译名《新西行漫记》）一书，不仅记述了他们两年中在中国解放区看到的茁壮成长的新型力量和新气象，也展现了国民党统治腐朽败落的景象。

英国学者林迈克（英文名迈克·林赛）1937年12月来华，任燕京大学经济学、逻辑学和科学方法的讲师、教授，是无线电爱好者。1944年5月，林迈克应邀到达延安，被聘为八路军通讯部技术顾问和新华社英文部顾问。他曾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造了一台可以发射到美国旧金山和南印度洋的发射机，为改进八路军通讯技术，打通中共与外界联系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林迈克一家才取道重庆回国。他所著的《抗战的中共》（中译本又名《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书，对中共部队高效率的指挥、通讯、情报及后勤供应系统等作了详实的记载。

新西兰友人、“工合”技术专家路易·艾黎，1939年至1941年三次奔赴延安，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创办了“延安工合事务所”，为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军用和民用工业费尽了心血。毛泽东和叶挺曾分别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高度赞扬工业合作社运动对我国抗战作出的贡献。英国青年

乔治·何克 1938 年 6 月访问延安后深受鼓舞，和艾黎一起在甘肃山丹创办“工合”培黎工艺学校并任校长，为“工合”运动培养专业技术人才。1945 年 7 月，何克不幸染破伤风去世，为“工合”运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美国青年李敦白 1946 年抵达延安，在新华广播电台从事电讯技术和英语播音工作。美国畜牧专家阳早、寒春夫妇分别于 1946 年 10 月和 1949 年 2 月到达延安，先后在延安光华农场、陕北三边农场工作，为陕甘宁边区的畜牧业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人们亲切而自豪地称他俩是“咱们的美国老乡”。

五、外国革命者和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

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随中央红军长征于 1935 年 10 月到达陕北，任中央军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兼编委会主任，并先后在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任教，主讲战役学，直到 1939 年夏离开延安返回苏联。越南革命者洪水（原名武元博）也是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先在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到五台山根据地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抗日战争爆发后，朝鲜作曲家郑律成 1937 年 10 月到达延安工作，先后为《八路军进行曲》、《延水谣》等歌词谱曲。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化名胡光）于 1938 年底结束在苏联的学习，经新疆、西安到达延安，参加八路军，和中国人民一起并肩战斗。不久，他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离开

延安，到衡阳、桂林、柳州一带进行抗日活动。1942年5月，苏联外交官彼得·拉基米洛夫（中国名字孙平）以塔斯社军事记者的公开身分到达延安，任共产国际、苏联驻中共的联络员，直到1945年9月回国，其间出席了中共七大。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即冈野进，中国名字林哲、村田）在共产国际工作9年之后，于1940年4月秘密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他对《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时说：“我来到延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和中国人民紧密地握手，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部而战。”^①野坂参三在延安协助八路军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返回日本。其间，他发起组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和森健等人创办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并担任校长，从事日本战俘的思想改造工作，培养了900多名反法西斯战士。1945年春，野坂参三出席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此外，朝鲜革命者武亭、郑振光、金昌华（中国名字陈光华）、印尼共产党人黄庆光（化名王大才）等人也曾在延安工作过，武亭还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金昌华1942年5月在太行山根据地反“扫荡”斗争中壮烈牺牲。

1941年10月26日至31日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是东方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一次盛会，“在全世界是一个具

^① 《解放日报》1943年5月31日。

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①。来自中外 18 个民族的 130 余位代表参加了大会，延安党政军学各界代表 1000 多人也出席了大会。会议推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冈野进、毛泽东、朱德等组成名誉主席团，朱德、林伯渠、阿里阿罕、巴苏华、原清志、森健、武亭等组成主席团，荷印职业革命家阿里阿罕为主席团主席。阿里阿罕、武亭分别致开幕词和闭幕词，朱德作总报告。日本代表森健、日本女代表原清志、朝鲜代表武亭、荷印代表毕德文（以西班牙国际纵队队员资格）、越南代表黄振光、泰国代表马纳、犹太族代表叶华、桑柏格尔德等人先后发言，一致表示东方各民族一定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坚决打死德、日、意这三只吃人的老虎而不息战斗。日本工农学校的 35 名学员在会上宣誓参加八路军，受到朱德总司令的热烈欢迎。会议决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总部设在中国延安，由朱德、林伯渠、吴玉章、高岗、罗迈、阿里阿罕、巴苏华、原清志、森健、乌兰夫、武亭、桑柏格尔德、马纳等 37 人组成联盟执行委员会，并在各地设立分盟。联盟的宗旨是：“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援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日、意法西斯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② 该联盟是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

① 《解放日报》1941 年 10 月 27 日。

② 《解放日报》1941 年 11 月 1 日。

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联盟的成立，有利于加强对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斗争的领导和援助，从组织上为推动东方各民族人民反法西斯运动走向高潮奠定了基础，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勇气和信心。毛泽东在会上称赞说：“各民族都能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是很好的现象”^①。

国际友人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活动，打破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封锁，向国内外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业绩，壮大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进程。这是中国共产党执行国际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

^①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31日。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王 秀 鑫

一、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促进了 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一开始就说：自从1934年1月在江西开过第五次中央全会以来，差不多五个年头了。因为各中央委员分散工作于国内外各种不同的环境，使我们不能聚集一块，此次则除了几个同志之外，最大多数的中央委员都到了，而且到了全国各地许多领导工作的同志，使我们的这次中央全会，成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人数到得最多的一次。本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在本年召开的，因为战争紧张的缘故，不得不把七大推迟，而当前时局向我们提出了许多的问题，必须作明确的解决，以便争取抗战的胜利，所以召集了这次扩大的中央全会。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

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5个月，日本侵略者在1年多的

时间中，虽然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但由于其战线延长，兵力不足，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后方造成极大的威胁，将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15个月抗战的经验证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的而不是速决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悲观论者是毫无根据的，王明的一套主张是错误的，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在实践中已经取得巨大胜利。

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促进了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1937年11月，王明离莫斯科回国后，由在苏联养病的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的经常工作，是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反映中国共产党内、中国国内的形势，并说明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独立自主原则。1938年春夏，任弼时到莫斯科汇报中共中央关于中国抗战的路线、方针和工作期间，王稼祥协助任弼时作了许多工作。1938年7月，王稼祥离莫斯科回国。行前，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任弼时也在场。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在六届六中全会的准备工作中，王稼祥于1938年9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国际指示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国际对中共党的路线的估计；（2）关于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问

题；(3) 关于国际援华运动；(4) 关于中共七次大会问题；(5) 关于党内的团结问题。《报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日寇特别要很巧妙的挑拨破坏党内的团结”，“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

由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经洛川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对统一全党认识，尤其是对加强中央领导机关的指导思想的一致，起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决定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为：(1) 张闻天主持开幕式；(2) 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3) 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所以，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在1938年夏秋对中国问题的正确指示，无疑成为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的一个重要条件。后来，毛泽东于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上作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

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二、六届六中全会概况

六届六中全会正式出席人员共 53 人。

(一) 政治局委员：1、毛泽东、2、朱德、3、周恩来、4、王明、5、张闻天、6、项英、7、博古、8、康生、9、王稼祥、10 彭德怀、11、刘少奇、12、陈云。

(二) 中央委员：13、关向应、14、张浩、15、杨尚昆、16、李富春、17、罗迈。

(三) 各方面负责人：18、贺龙、19、邓小平、20、罗荣桓、21、彭真、22、潘汉年、23、徐特立、24、曾山、25、吴玉章、26、张文彬、27、朱理治、28、贾托夫、29、林伯渠、30、谢觉哉、31、冯文彬、32、李昌、33、林彪、34、罗瑞卿、35、滕代远、36、萧劲光、37、谭政、38、郭述申、39、高自立、40、高岗、41、成仿吾、42、高文华、43、柯庆施、44、孟庆树、45、曹轶欧、46、萧克、47、杜里卿、48、徐海东、49、宋一平、50、谭余保、51、涂振农、52、李六如、53、程子华。

此外，陈刚、杨松也参加了全会。全会的秘书长为李富春；秘书为王首道、陈刚。

全会选举的主席团成员是：毛泽东、王稼祥、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张闻天、陈云、王

明、项英。

9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开幕，张闻天致开幕词。他说：五中全会至现在，是中共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五年。这次全会的任务，是如何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为此，要讨论：（一）一年三个月抗战的经验教训；（二）目前抗战的形势；（三）如何使共产党成为抗战的核心与领导者；（四）七大的准备。接着，王稼祥在会上作《国际指示报告》，又一次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

9月30日上午，项英作关于新四军工作报告，讲了新四军组成的经过和组成后到全会召开前夕的情况。下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周恩来详细叙述了六届五中全会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了抗战中国国民党政策的矛盾性；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坚持统一战线的任务。

10月2日至3日，朱德作八路军工作报告。他总结了一年多来抗战的经验；回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坚持持久战的情况；阐明了怎样认识和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汇报了八路军的状况；提出了今后抗战的任务。朱德说：“我们党的任务，是继续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坚持根据地，争取友军，巩固本身。巩固本身，是中心问题。”

10月4日，贺龙作关于晋西北工作的报告。

10月7日，罗荣桓作关于晋西工作报告。

10月8日，杨尚昆作关于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以及晋西南工作的报告。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分8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在全国炮火连天，全世界战争危机紧迫的环境中，来开我们的六中全会扩大会，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呢？我们的目的何在呢？我们一定要同全中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永远的团结起来，克服新的困难，动员新的力量，在目前，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实行我之进攻，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之目的，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也就是我的报告的总方向。”

10月15日，张闻天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报告》讲了18个问题：（一）组织工作的一般原则；（二）党在组织工作中的任务、成绩和弱点；（三）统一战线的特点和工作；（四）不同地区，党的任务和工作应有所不同；（五）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

(六) 党在军队中的工作；(七) 党在政府中的工作；(八) 党在群众中的工作；(九) 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十) 巩固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十一) 关于干部问题；(十二) 关于宣传教育工作；(十三) 关于领导中间的问题；(十四) 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十五) 发展党的组织；(十六) 提高党的警觉性；(十七) 发展党内民主，巩固铁的纪律；(十八) 全党的团结。他在《报告》最后结论中说：“要求组织强大的统一战线。要求组织强大的党。怎样使党成为强大的条件呢？(一) 要有坚定的正确的政治立场；(二) 灵活运用党的策略；(三) 要求艰苦奋斗的精神；(四) 大众民主的工作作风。”

10月19日，全会发出《为追悼鲁迅逝世二周年致许广平女士的慰问电》。

10月19日至29日，先后在全会上发言的有：林伯渠、朱德、吴玉章、王明、徐特立、朱理治、贾托夫、曾山、涂振农、彭德怀、张文彬、郭述申、潘汉年、谢觉哉、宋一平、李昌、谭余保、高文华、孟庆树、李维汉、李富春、冯文彬、杜里卿、张浩、彭真、刘少奇、萧克、高自立。他们都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王稼祥的《国际指示报告》。有的同志还结合自己的具体工作，论述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和执行的指导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10月29日，全会通过关于修改决议案委员会。成员

有：王稼祥、张闻天、刘少奇、毛泽东，由王稼祥负责。

10月31日，陈云作关于讨论青年工作问题的结论。他指出：“青年问题，从先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现在都得到一致。”“青年有他的好处，如勇于任事、敢说话，但另一方面青年容易发生好胜与不服气，所以大家应注意冷静、忍耐、不要过于刺激人。”接着，张闻天作关于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的结论。他说：“讨论中，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这以后团结在中央周围已有保证。”

11月1日，康生作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

11月5日，全会通过《致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电》和《致蒋委员长电》，决定交主席团作文字审查后发出。在《致蒋委员长电》中说：“中共同人深信，我国目前正外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过渡时期”，“我们相信伟大的中华民族曾经经历过艰巨斗争的磨炼，定能举国一致，精诚团结，渡过抗战难关，争取最后胜利。”

11月5日至6日，毛泽东作全会的总结。他的总结分为5个部分：（一）会议的成功；（二）武汉、广州失陷后的形势；（三）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四）战争与战略问题；（五）其他问题。毛泽东指出：“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会进入相持阶段。”“相持阶段主要战争形式是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我们要把游击战分成两大区域，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在谈到党的团结问题时，毛泽东强调：“过去干部政策上所作的错误，我同意予以平反。”

11月6日，通过以下文件：（一）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二）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三）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四）全会致各国共产党电；（五）致西班牙共产党电；（六）致日本共产党电；（七）致八路军新四军电；（八）致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

11月6日，刘少奇作党规党法的报告。通过：（一）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二）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三）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

11月6日，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致闭幕词。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胜利结束。

三、六届六中全会解决的主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把中国抗日战争和民主事业，极大地推向前进。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并为实现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全会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一）全会总结了抗日战争的经验，指出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新阶段的任务。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全面地总结了15个月以来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深刻地分析了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阐明

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

毛泽东指出：“十五个月抗战的经验给了我们以什么呢？我以为主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证明了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因而抗战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第二，证明了中国的抗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悲观论者是没有根据。第三，证明了支持长期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与依靠民众，借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不是其他。”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正向着一个新阶段发展，新阶段中有许多新任务。”“新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更加困难，一方面更加进步。更加困难表现在：（1）由于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在地域上被敌人分割了；（2）财政经济异常困难；（3）英、日某种程度的妥协倾向；（4）如果敌攻占广州，中国主要的海道交通有被割断之虞，国际援助将暂时的部分的减弱；（5）全国性伪政权有形成的可能及其对于抗日阵线的影响；（6）抗日阵线中部分叛变的可能，妥协空气的增长；（7）悲观情绪的生长，意见分歧的现象的增加，等等。”“相持阶段，是中国准备反攻的阶段。其时间长短，依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及国际环境如何而定。但我们应该准备长期战争，熬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

毛泽东指出：“在新阶段中，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是什么？总的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

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之目的。”毛泽东提出了15条具体任务：（1）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情绪，反对妥协企图。为此目的，一是宣传民族革命典型；二是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消极因素；三是将敌人的残暴罪行向全国公布，向世界控诉。（2）拥护国共合作，反对分歧与分裂，反对任何汉奸政府。（3）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停止敌人进攻。（4）广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和巩固我之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5）提高军事技术，创立机械化兵团，准备反攻实力。（6）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能力。（7）扩大统一的民众运动，全力援助战争。（8）改良民众生活，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9）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渡过战争难关。（10）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11）力争国际援助，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2）建立中国与日本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3）团结中华民族，一致对日。（14）厉行锄奸运动，巩固前线与后方。（15）发展国共两党及各抗日党派的团结，强固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战争。

（二）全会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非常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和神圣职责。他说：“中国共产

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伟大的斗争需要伟大的力量，团结全民族，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进入这个斗争中去，是我们确定了方针，而要达到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有决定作用，是最基本的条件。”

如何实现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呢？全会认为党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中国共产党必须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在各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指出：“对于我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密切结合着。”“理由是：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出全民族于水火，只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解放，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为此理由，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革命战争的战场，拿每一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不容有任何消极。”“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与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八路军与新四军，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与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与友党友军发生关系中，应该坚持统一团结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要傲慢态度，诚心诚意地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

(2) 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毛泽东指出：“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共产党必须扩大其组织，向着真诚革命，而又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与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变为伟大的带群众性的党。在这里，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但同时，对于奸细混入的警觉性也决不可少。”“不可因为怕奸细而把自己的党关起门来，大胆的发展党是我们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又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与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这就是我们发展党的总方针。”同时，要扩大党的组织，必须关心干部，善于识别干部，使用干部和爱护干部，有计划地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3) 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作行动的指南。“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

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在全会上，张闻天在作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结论时，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说：“我们党的十七年，最大的进步是学会了运用马列主义，从抽象的教条的了解，到更具体更深刻更生动的了解马列主义，这是十七年革命实践所得的结果。”在哪些地方学会运用马列主义呢？他指出：（1）懂得了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一定要从书本上学习，但并不是会背这些原则，就了解了马列主义。我们应该根据这些原则分析当时当地情况，对马列主义边学边用。使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就是把马列主义方法运用在中国具体情况中间，并以之来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等。（2）我们了解了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把握阶级斗争规律，依靠这些来规定我们的政治方向和工作方针。过去，我们在工作中公式主义太厉害，吃过许多亏，由此不知流了多少血，牺牲了多少生命。现在我们不要怕抛弃马列主义中某些不适合中国情况的原则。（3）我们党今天更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的分析来决定我们的方针、战略、策略口号。（4）客观情况，一次是认识不清的，不能一次就完全认识，我们必须在斗争

实践中不断补充我们的认识。因此，在决定了方针策略后，应在实践中考验与审查其是否正确，在实践中补充与发展，错的改正，蛮干不能建立党的威信。马列主义指导实践，而实践又发展马列主义。

在全会上，徐特立在发言中也说：“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我们的理论从具体实际情形得来，我们的决策，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

由于六届六中全会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特别是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口号，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并为共产党正确领导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三）全会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既统一又独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毛泽东在全会的政治报告和总结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全民族，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各个阶层一切生动力量，这是独一无二的方针。”“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国共合作，顺利执行当前紧急任务，渡过战争难关，是有重要意义的。”“由于中国的历史原因，使得今天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于任何外国的统一战线，如人民阵线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线，如第一次国共合作等，有它今天的中国的特点。认识这些特点，对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非常严重的

意义。”“这些特点是什么呢？归结起来，共有八个。即是：全民族抗日的；长期性的；不平衡的；有军队的；有15年经验的；大多数民众尚无组织的；三民主义的；处于新的国际环境的。”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所谓“有15年经验”，即“1924年至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四年，1927年至1936年国共分裂的九年，现在国共重新合作又有两年。这十五年中，合作——分裂——又合作的经验是：只应合作，不应分裂。”

毛泽东又指出，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他说：“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拿两个以上的阶级与党派之存在作前提的。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的坚持，这是确定了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否认独立性，只讲统一性，这是背弃民权主义的思想，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对的东西。不这样做，就不算坚持统一战线，就要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同时，决不能抹煞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思想上也好，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煞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一战线。”“我

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党派的长期合作，毛泽东提出，应该有合作的组织形式。他说：“为了保证长期合作，还必须解决合作的组织问题。”“统一战线可能有三种组织形式：第一种，国民党本身变成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第二种，共同组织民族联盟，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着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第三种，就是现在的办法，没有成文，不要固定形式，遇事协商，解决两党的问题。我们极力赞成有一种统一的形式，使之利于长期合作。”

毛泽东还从理论上科学地说明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他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入侵的情况下，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紧紧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民族的利益，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和坚持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中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个最主要的敌人。因此，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日的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但是，决不能借口民族斗争而否认阶级斗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

如何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呢？毛泽东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另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是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既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再具体地说，有些事情可先得国民党同意后再做，这叫作“先奏后斩”；有些事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这叫作“先斩后奏”；有些事估计它一时不会同意，则暂时“斩而不奏”；有些事做了可能妨碍大局，则“不斩不奏”。

统一战线中，要不要让步？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不变地向着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国的方向走去，谁要是违背了这种立场，这个方向，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但共产党员又必须有互助互让的精神，必须有尊重友党及和友党同志用谦和商量的态度解决问题的精神，一切有友党同志的地方，都应和他们商量解决有关事项，不应独断。”“统一战线中的各党各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列主义所许可的。“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

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

总之，六中全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便放手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更好地进行民族斗争。

毛泽东在系统阐明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深刻地批评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口号。他说：“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还指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

（四）全会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作了部署。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论述了敌后抗战在中国的特殊意义。他说：“敌人占领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

后，敌据城市以对我，我据乡村以对敌。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吗？答复：有困难，但是能够的。”“今天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的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今天，却产生了这种可能。这里明显的是三个三位一体的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条件。在半殖民地，城市虽然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第二是大国的条件。失去一部，还有一部。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方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贵、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领；而且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地盘，例如华北、华中、华南等地，使敌无法全占。第三是今日的条件。如果数十年前中国被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占，例如英占印度那样，那是难免亡国的。今天则不同，今天主要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总之，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好的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前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后恢复城市。”“在内战的条件下，极小部分的乡村，支持了长期反对城市的

战争，还当帝国主义各国一致反共的时期。谁能说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又当帝国主义阵营分裂之时，中国以极大部分的乡村，不能支持长期战争去反对城市敌人呢？毫无疑问，是能够的。”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开展敌后抗日战争，实际上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在全会上重申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他指出，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将变为主要的形式。没有这种游击战争，便不能牵制大量的敌军，停止敌人的进攻；便不能使敌人占领区限制于一定地带；便不能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并准备将来的战略反攻。因此，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在一切敌人后方地带，必须广泛地建立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毛泽东说：“一般说来，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是比较前一阶段要困难得多。我们必须预先看到这种困难，承认这种困难，可不因为前一阶段的发展容易而冲昏了头脑，因为敌人一定要转过去进攻游击战争。然而能够坚持的，一切敌后工作的领导人们，必须要有这种自信心。”

关于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部署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现在，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

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困难。”六届六中全会经过讨论，决定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之后，党在敌后武装斗争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王明于1938年10月20日在全会上作的《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中，虽然同意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但仍然坚持其右倾投降主义。他认为，俄国革命是依靠城市反对乡村的敌人，中国抗战要依靠乡村争取胜利是困难的，因此，要尽一切可能保卫武汉。对此，彭德怀立即给予了批判。彭德怀在发言中说：“王明认为乡村反对城市更加困难，我认为中国的城市还不能统治乡村经济，中国抗战不完全决定于城市。如果不了解中国这个特点，结果便会强调城市的重要，只有拼命去保卫城市；另一方面，城市失掉了便会认为中国抗战没有胜利的可能。同时，强调城市的作用，便忽视游击战争的作用。”

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也是配合战争的，只能也只应服从前线的要求。一句话，全党都要注意战争，学习军事，准备

打仗。毛泽东还强调说：“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毛泽东回答了王明对乡村能否战胜城市的怀疑，再次科学地论述了中国必须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五）全会确定在中国共产党内，扩大民主和加强纪律，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处于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积极性。为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既要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不要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鉴于张国焘、王明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强调，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这个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彭真在全会的发言中也说：“实现党的团结中，地方党与军队党要亲密团结，党的青委不要建立独立的系统。”

六届六中全会为了扩大党内民主和加强党的纪律，通过了《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这些《决定》规定：“各级党委的重要文件决议须经多数委员或常委之同意，才能发表，各级党委负责人的重要文章及谈话，在可能时须经其他委员同意后发

表。”“各级党的委员会、代表会及党员大会所通过的决定文件，凡未经决定发表者，除向上级党委报告外，各委员、各代表及到会的党员，均不得向会外任何人泄露。”“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这些重要决定，是加强党的建设的经验总结。刘少奇在作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中说：作出关于党规党法的决定，是为了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除政治思想的统一外，条文上亦应规定，以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并以此党规党法教育同志。几个文件的通过，也是党组织的建设，保证民主集中制的实施。

六届六中全会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决定撤消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刘少奇兼任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南方局由周恩来、董必武等组成，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大后方蒋管区党的工作。

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许多同志以亲身的经历，说明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者，是经过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张闻天在会上说：“能否成为党的领袖，决定于他的聪明能力、对党的忠实及其实际工作，在最困难的时期最能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有了这些条件，则不但党内承认，民众也承认为革命领袖。”彭德怀在会上说：

“党有了群众信仰的领袖。在我所知道的十年中，毛泽东同志基本上是正确的。”“领袖的培养，是在坚决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由正确的领导而取得的。领袖不能委任，领袖也不是抢来的，领袖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我们党要经常把握正确的方向，党的领袖很重要。”刘少奇在会上说：“领袖不是自称的、委任的，而要拥护。要使委任的领袖而为真正群众所拥护的领袖。”陈云在会上说：“我感到中央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到现在，无什么大的错误，这主要是由于中央有远见，起了把舵的作用。党的团结，首先要思想上的一致，要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看问题方法差不多，研究思想方法的一致。”李富春在会上说：“党的成功有：1、党的统一与团结；2、保存广泛干部；3、党的组织路线之正确。……最主要是中央路线的正确，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谢觉哉在会上说：“我党朱（德）毛（泽东）领袖，都是了解中国古今实际情况，是能中国化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了党内民主，加强了党的纪律，并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就巩固了遵义会议以来形成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正确的核心领导，从而实现了党的坚强团结，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迅猛发展。

四、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

很重要的会议。关于这次全会的意义，王稼祥在全会的闭幕词中讲得非常明确。他说：“这次得到了大的成绩，大的进步。大会中所估计所想的问题，在大会结束时已变成事实。此次会表示我们已掌握马列主义，以之分析具体的复杂的环境，定出正确的政策与方针。此次大会表示了党的团结与一致。此次会在党史中占重要地位，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定出了工作，将会完成光荣的任务。此次会在中华民族史上亦有重大意义，推动抗日战争走向最后胜利。”后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说：“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①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是党史上的第二次遵义会议。如果说，遵义会议开始纠正了党内错误的指导思想，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那末，六届六中全会就是维护了党内的正确思想，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使党能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航程中，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复杂的环境中，及时克服了王明为代表的“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澄清王明推行共产国际指示造成的混乱，坚持了洛川会议制定的独立自主领导抗日战争的基

^①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七大会上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

本路线和政策。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所作的这场斗争，有着重要意义。后来，毛泽东在1947年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进一步总结抗日战争初期党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时，又指出：这场斗争“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从洛川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领导抗日战争的过程，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党敢于反对教条主义，坚持真理，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实事求是。这一过程表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认识的，共产国际是不了解或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中国革命的；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认识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飞跃，从认识的必然王国到达了自由王国，这是中国共产党高度、完全成熟的重要标志。

关于东南局、中原局 合并扩大为华中局时间考

谢 辉

中共中央东南局（简称东南局）与中共中央中原局（简称中原局）何时合并？中共中央华中局（简称华中局）究竟何时成立？军史界、党史界众说纷纭：一说，“皖南事变后”“东南局自行结束”，1941年1月“东南局并入中原局”，5月20日，“中原局正式改称华中局”^①。另一说，“1941年5月，中共中央东南局中共中央中原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②。还有一说，1941年4月2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建议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改称华中局”^③。有的档案、党史工作者也认为，中原局改华中局的时间“定为1941年4月27日较为妥当”^④。笔者认为，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扩大为华中局的时间应在1940年11月17日为妥。理由如下：

一、从当时往来的电报内容上确定。

① 陈廉编写：《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第395页。

② 盛平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第220、222、252页。

③ 王辅一主编：《新四军事事件人物录》，第517页。

④ 《党史研究》1986年第2期。

1940年11月14日，中原局根据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已成立和新四军军部将要北移、项英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后赴延安等情况，为统一华中地区党的领导起见，从“就策略领导之便利，工作配制之需要，交通联络之可能”等实际出发，向中共中央“建议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领导华中（包括长江南北各沦陷区）地方党，而在闽浙边建立东南局或分局，领导国民党后方地方党（包括闽浙赣、皖南），如此，则曾山参加华中局，而专负苏南党的工作，小姚（饶漱石）去闽浙主持工作”^①。3天后，即1940年11月17日，中央书记处复电中原局并致东南局，称：“同意将东南局、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的建议”；“同意小姚去闽浙赣和曾山去苏南之提议”。该电对华中局的领导区域作了规定：“华中局领导华中及江南敌后武装斗争区域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为了使华中局能专力于领导战争区域的工作，中央书记处还在该电中设想：“闽浙赣边可建立一中央局或分局，如能建立好电台联络，可由中央直接领导”^②。

在此以后的中共中央指示文电中，以项英为书记的东南局已不再出现，也未曾发现以原东南局名义给中共中央的文电。所出现的都是已撤消原东南局或准备在上海成立的新的东南局。如，1941年2月20日，《中央书记处在关于沪设东南局管理东南国民党区工作致胡服电》中第一条

^{①②} 《抗战时期新四军电报汇集》第7卷，第129、133页。

说，“因敌区及东南国民党区工作与根据地工作性质不同”，“故中央内定在沪设东南局”，管理“国民党区工作”^①。此处的中央内定在上海设立东南局说明，以项英为书记的东南局已经撤消。又如，1941年3月8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沪成立东南局由梁模、曾山负责致刘晓等电》中说，“决定在上海成立东南局，由中央直接管理。以梁、曾二人组织之，梁为书记”，“东南局仍管原属东南局所辖国民党区之工作”^②。此电清楚地表明，以项英为书记的东南局已经撤消，以梁模为书记的新的东南局已经成立。中央书记处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经重新考虑后，于同月20日作出决定，“小饶、曾山去苏北”，“上次电中的指示东南局取消”^③。上次电，是指1941年3月8日电，这里取消的是以梁模为书记的东南局。

从以上文电中看出，东南局并不是皖南事变后自行撤消，也不是1941年5月与中原局合并，而是在1940年11月17日，中央书记处已有批准同意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扩大为华中局字样。从上述文电中还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东南局的两位副书记曾山、饶漱石在1940年11月17日已作出妥当安排。而对东南局书记项英的安排，还要更早一些，即在1940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任命叶挺、陈毅、刘少奇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正副指挥及政委的决定中，就对项英作了安排，“关于项英同志，在皖南

①②③ 《抗战时期新四军电报汇集》第15卷，第37、40、47页。

部队移动事宜就绪”，“来延安参加七大”^①。从中共中央的人事安排上，也同样说明，在1940年11月17日，东南局已与中原局合并。至于曾山当时为什么没有去苏南，饶漱石当时为什么没有去闽浙赣，而是同项英一起随军北移，这里尚有说不清的原因，有待史学工作者进一步探讨。

二、从华中局所谓的延续及中央在一次电文批注的口气上来确定。

上文已提到，1940年11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扩大为华中局。从此以后，中原局下达的文电，有时也称华中局。如，1941年1月中旬，在彭德怀亲属被湖南地主军警逮捕与枪杀时，华中局向华中各地方党、各军政首长及政治机关下发了《反对杀害抗日将领家属及口号》的电文^②。又如，1941年1月27日，华中局下发了《关于打破反共军的进攻与敌寇“扫荡”的指示》^③。再如，1941年2月26日，《刘少奇关于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及对浙西党的今后任务的指示》，第一条就是“东南局已并入中原局，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④。此电中说的已并入时间，当指中央书记处1940年11月17日电。1941年5月，当刘少奇再次要求使用华中局名义时，同月19日，中央即在该电报上批注：“上述问题早已电复，现将

① 《新四军·文献》(1)，第70页。

② 《1941年华中局电报抄本》第145号，存中央档案馆。

③ 王辅一主编：《新四军事事件人物录》，第515页。

④ 《抗战时期新四军电报汇集》第23卷，第67页。

该电再拍发一次”^①。此处说的早已电复，是指中央书记处第一次“同意”电，即1940年11月17日复中原局并致东南局电；此处说的再拍发一次，是指中央书记处第二次复电，即1941年5月20日致华中局电，“中原局改为华中局”。中央书记处两次批复电，何者为准？不论是从华中局称谓的延续上看，还是从中共中央1941年5月19日在刘少奇电报上的批注口气上看，都应把中央书记处第一次批准“同意”东南局、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的时间，定为华中局成立的时间。

既然在1940年11月17日东南局与中原局已合并扩大为华中局，那末，为什么在中央与中央局、中央局与新四军各师的往来文电中，还多使用中原局这一称谓？为什么到了1941年5月1日，陈毅、刘少奇等还致电中央“中原局改华中局”，请“中央批准”？对这一问题，作何解释？笔者认为：

一是没有及时提出华中局人员组成名单。中央书记处在1940年11月17日复中原局并致东南局电中，曾提出华中局名单由“中原局与东南局共同拟定，电中央审查批准”。而此时的中原局领导者认为，中共中央对东南局书记、副书记都已分别作了适当安排，新四军的参谋长张云逸早已加入中原局，1940年11月10日已提议原东南局委员陈毅加入中原局，在中共中央决定放弃皖南，多次电催新四

^① 刘平雪、史略：《中共华中局究竟何时成立？》。

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的情形下，东南局实际上已并入了中原局，中原局就等于华中局，华中局其实就是中原局。基于此种动因，中原局也没有进一步主动提出华中局人员组成名单。而这时的东南局主要领导者，对中共中央决定放弃皖南，收紧拳头，确保华中和华北，坚决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部署认识不清，对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尚存种种疑虑，对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持保留态度，因而不可能提出两局合并后的华中局人员组成名单。所以，关于华中局人员组成，也就没有中共中央的审查批准。

二是照顾了心理承受能力和传统习惯。在中央批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扩大为华中局后，还习惯性地叫中原局，在一定程度上是照顾了当时皖南一部分同志的心理承受能力。如，1941年1月9日，新四军军部在奉命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8万余人的围攻，项英及袁国平、周子昆离开指挥岗位，使江南党和军部领导顿失中心。这时，刘少奇致电叶挺、饶漱石等北移新四军纵队以上干部，传达中央书记处1940年11月17日电示精神，“党中央11日[月]电，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江南所有战争区域之党与部队工作统一归中原局领导。”^①此时应说统一归华中局领导，但这里却说“统一归中原局领导”，说明刘少奇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皖南部队指挥员的心理承受能力。在以后的

^① 《1941年华中局电报抄本》第142号，存中央档案馆。

上呈下达的文电中，仍多沿用中原局这一称谓，也有传统习惯上的原因。

三是“5月1日电”含有请中央进一步追认的意思，并不能作为华中局尚未成立的依据。1941年4月27日，华中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时，针对华中地区中央局称谓不统一等情况，曾作一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据当时华中局会议记录：“关于讨论问题”，“名称问题，决定还是叫华中局”。为此，陈毅、刘少奇等在5月1日致中央的电文中申明，“中原局改华中局，前已公布，现各处均已用华中局名义，群众上有影响，我们意见仍用华中局名义”，“请中央批准”^①。从申明的理由表明，显然是请中共中央进一步追认的意思，以便名称统一。虽有“请中央批准”字样，但不能作为华中局尚未成立的依据。

^① 《新四军·文献》(2)，第371页。